

黄河入海流

——地缘变局下的文化大革命

華豐巫師

版本：1.201306

黄河入海流 —— 地缘变局下的文化大革命

华夏巫师¹

（写作时间：2012.7.28-2012.12.31）

版本：1.201306 2013 年 6 月

欢迎就此文与作者联系讨论。

本文相关网址：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cnsorcerer>

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1598953214>

天涯博客：<http://cnsorcerer.blog.tianya.cn/>

天涯煮酒论史讨论网址，并可在此处索取本文最新 PDF 电子文本：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42552-1.shtml>

¹曹泽新，沈阳航空航天大学，caozx@sau.edu.cn

本文不能正式出版，这里做成电子版供大家参阅。本文还有由开拓者网友整理的另一个版本《黄河入海流》，开拓者在其中收录了本人的其它一些文字，还做了大量精心的标注，欢迎朋友阅读。

摘 要

本文主要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定位，分别就古代中国的社会形态、礼教的性质、中国革命史给予全新的论述，以此构成华夏史观。并由此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及其文明意义，并进一步阐述文化大革命对世界人文观念的沿袭，同时揭示文化大革命对于未来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和民权运动的来临。

古代中国社会一直是家族公有制形态，即家天下，可分为封土建邦时期和中央集权时期，并且封土建邦是中央集权的开始，而不是中央集权的对立。华夏文明这种家族公有制形态，主要是为了适应黄河岸边的农耕游牧冲突性地缘结构。这也解释了华夏文明的起源问题，阐明了华夏文明是黄河文明的原因。礼法制度是古代中国家族公有制形态的所有权理论和公权力组织构架，是华夏族群用以制约精英阶层的权力行使规范。“礼”正是华夏文明家族公有制形态的权力行使法则，“礼法”就是循礼行权，法究其责。正是“礼”保持了华夏族群魂灵层面的深刻组织性和常态化的军事动员张力，是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基本文明内核，是华夏族群强健自信的不绝源泉。

礼教是礼法的道德化流变。精英阶层把最初约束他们的礼法，篡改成为吮血吸髓的礼教。这一点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解读流变中就可以看出。精英阶层通过一步步篡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从礼的祭祀军政行权规范的等级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三纲五常，再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把制约他们的礼法篡改成礼教这一僵尸文化。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介绍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及其文明历史背景。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华夏族群从黄河岸边到海岸边的地缘文明迁徙史，即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华夏族群所面临的文明地缘变局，是从黄河岸边的农牧冲突性地缘结构，到海岸边的陆权和海权地带的冲突性地缘结构的地缘变迁。这一文明迁徙过程，也就是华夏文明的维新历程。在新的地缘环境下，以民权为基的公有信仰和贯彻公有信仰的观念体系及其组织构架，是华夏族群地缘生存的文明依据。

在这样一种地缘变局的条件下，文化大革命成为华夏族群文明维新的必要环节。根据以往经验，文明革命过程是一个漫长而血腥的反复更替过程。要避免这种文明演进中的灾难，根本的办法就是进行自觉主动的文化革命，及早肃清旧文化势力，培育新文化，这一文化革命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就是：“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文革正是通过这种批斗，让旧文化毒瘤寄宿关系土崩瓦解，消灭旧文化的政治基础，从而阻断族群地缘迁徙的灾难性演进过程，让文明维新行进在存续的康庄大道上。

文化大革命通过发动群众批斗文化政治精英，还从文明层面上实现了君授民权的授权仪式。这是华夏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政治和文明步骤，是华夏族群文明维新不可或缺的民权环节，是民权的法理授印。

从文明地缘迁徙过程来看，毛泽东是成功引领华夏族群从黄河岸边来到海岸边的族群最高首

领，并通过文化大革命，从魂灵层面告别炎黄时代，开创海岸纪元。以此，毛泽东是海岸边华夏族群的文明始祖，毛泽东思想就是华夏祖灵、礼魂。

今天，精英铁幕的人文倒退，正在激发起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民权运动。本文最后部分主要通过给出原始集权系统和选举系统的缺陷，解释了专制铁幕和资本铁幕的起因，并给出民权集中系统的政治构架。并阐明中国社会正在迈入民权运动阶段，阐述了民权运动是新时代下毛泽东思想的显在，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铁幕文化和民权文化将在民权运动阶段激烈较量，这是华夏族群有史以来，最激荡澎湃的民权变革时代。这一时代所通往的民权纪元，即是毛泽东思想所指向的观念世界。

目录

摘要	ii
引言	1
第 1 章 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相关知识背景	3
1.1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文明地缘变局	3
1.2 华夏文明的公有制形态以及对礼的解读	4
1.3 礼的道德化流变和礼教	6
1.4 地缘变迁格局下华夏族群的文明维新	9
1.5 左和右	10
第 2 章 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实际作用	11
2.1 文化大革命的法源和纲领	11
2.2 毛泽东思想简史及其间的政治斗争	14
2.3 文革何以必要	16
2.3.1 阻断文明革命自发性血腥进程	16
2.3.2 摧毁了新政权的红色专制路线	18
2.3.3 移风易俗的文革和华夏族群新貌	19
2.3.4 相关文化谱系的比较	25
2.4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	35
第 3 章 文革若干问题辨析	38
3.1 文革中的批斗迫害问题	38
3.2 左翼的文革观点	40
3.3 四人帮的性质	42

3.4	文官集团的文革立场	43
3.5	没有毛派的问题	44
3.6	文革是不是成本过高，会不会再来	44
3.7	精英的皈依	45
3.8	本文中的华夏史观	46
第 4 章	观念变革中的未来世界	48
4.1	观念变革中的未来世界	48
4.1.1	科技领域的观念变革及所张开世界的历史演变	48
4.1.2	海权的兴起及其观念世界的物现	51
4.1.3	文化大革命的地缘历史背景及其张开的观念世界	51
4.1.4	观念变革中的保守阻力	54
4.1.5	继续壮大并深化的民权运动	55
4.2	民权纪元部分简介	56
4.3	以罢免权下放为基础的民权集中制	57
4.3.1	集权系统不可能自我消除腐败	58
4.3.2	中国特色的政治方案及其实践	59
4.3.3	现存的政治系统和精英铁幕成因	60
4.3.4	以罢免权下放为基础的民权集中制	64
	本文结语	66
	后记：桑田沧海觉为了	68
附录 A	相关交流记录（尚未整理）	70
附录 B	古代中国——光辉的公有制历程	71
B.1	前言	71
B.2	古代中国——家族模式的公有制社会	73
B.2.1	公有制形态	73

B.2.2	家庭的分析	75
B.2.3	国家的形成	77
B.2.4	古代中国的所有权形态及其理论 (1)	78
B.2.5	古代中国的所有权形态及其理论 (2)	81
B.3	古代中国历史简述	83
B.3.1	华夏文明的起源	83
B.3.2	华夏文明的成长与成熟	85
B.3.3	华夏文明的巩固与发展	89
B.4	古代中国的社会特征	92
B.4.1	文官科举制度和平民政治	92
B.4.2	古代中国的社会等级	94
B.4.3	强大的社会功能和国家对外关系	97
B.5	若干重要专题	100
B.5.1	西方所有权观念简述	100
B.5.2	游牧民族与华夏文明	102
B.5.3	儒家社会中的农民起义	103
B.5.4	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	105
B.5.5	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演变	108
B.6	结语	109
附录 C	罢免权下放的相关论述	112
C.1	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建议	112
C.2	罢免权下放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出路	120
C.3	以罢免权下放为基础的民权集中制若干说明	123
附录 D	毛泽东是海岸边华夏族群的文明始祖	128

附录 E 文化大革命资料	132
E.1 十六条	132

引 言

一直以来，中国左右两翼长期对峙和民权运动亟待破题的局面没有突破或者变动的迹象，这和中国目前处在政治理念上剧烈交锋，没有一方取得足够的优势有某大关系。要突破当前的这种困境启动民权运动，就需要在中国社会引入新的视角，整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力量，在思想观念上达成共识，奠定民权运动的思想之基。而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重新梳理中国近百年来的演化过程，辨析和重估其中的价值。其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直以来，是左右交锋争论的战略焦点和热点。因此，如果左右两翼无法在文革这一历史问题上形成观点上的统一或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民权运动就不可能启动起来，民权社会也就不会来临。也就是说，对文革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中国社会没有达成共识，构成了民权运动的最大障碍。

经过两个三十年的建设，中国社会取得空前的进步，同时也形成了左右两大阵营的思潮集结。这两阵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观点交锋。一个真实的现状则是两翼都没有取得优势地位，左翼在文革后被基本否定，右翼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则在二十三年前遭到摧毁性打击。没有了左翼，文官集团失去信仰的导引；没有右翼，文官集团就缺少监督的制约。从而两者都失去了对文官集团的监理作用，结果文官集团居其用，当其体，导致文官集团及其衍生势力派系的极速自我膨胀，同时，在文官系统和共产党组织内部，信仰群体也倍受抑制。

在这种情况下，要突破僵局，唤醒民权运动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打通左右，形成左右两翼在民权运动上一致的政治基础，以启动民权运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回到左右分裂的起点，找出分歧的基本原因，才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左右共识。因此重新理解和评估文革，就成为奠定民权运动思想之基的必要环节。

但理解文革并达成共识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对右翼来说，文革就是左翼造设的人间地狱，对左翼来说，文革距离人间天堂只有一步之遥，两者水火不容。但如果不能深入辨析文革对于我们这个族群的意义以及各方立场的问题，中国的民权社会依旧是个梦。就文革本身而言，不仅要梳理其来龙去脉，还要直面关于文革中的人道主义罪恶等沉重话题，更有与华夏传统文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近现代史等多方面的东西需要交待，才可能触动我们在文革立场上的固执。

民权运动要冲破左右僵局和文官集团的政治封锁，文革的价值重估就是其楔入点和战略突破口。不能从文明与文化层面为文革正名，从法理层面瓦解文官系统的独大，则文官集团贪腐群体中的每一贪腐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为局部和支节问题，都可以推脱得干干净净，民权运动就无以撼动以民族主义为依托的文官集团维护其垄断地位的价值主干。但是随着文官集团的极度自我膨胀，其中的贪腐势力不断侵害民众权益，其侵害手段凶残歹毒，既昭示了中国社会民权没有丝毫保障

的残酷现状，又在刺激着民权运动的暗潮涌动，还提示了民权社会前夜，中国民权运动政治空间的广阔态势。民权一日不实现，民权运动就愈加暴烈。

第一章 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相关知识背景

要理解文化大革命，需要了解其所处的历史与文明背景，对文革所处时代毁灭与新生激荡交织的背景感知越敏锐，对文革的理解也将越深刻。而如果对这些一无所知，能看到的只是文革中人斗人的现场，剩下的也就只有干扁贫瘠的道德评价，如果这种评价真的有益于族群生存，那么整个华夏就不至于一再沦丧于异族，也就不用到了非要文革不可的地步。

只有从文明变革意义上观察，才能理解文革的文明维新地位，文革是华夏文明地缘迁徙的魂灵涅槃，是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华夏文明最为暴烈的文化反动，是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回马一枪，是共产主义国际运动的扬弃升华。要理解文革，就有必要重新回顾其中与文革相关内容。

§ 1.1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文明地缘变局

图1.1显示的就是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以来，所经受的文明地缘变迁，也正是洋务运动主导人李鸿章所说的“亘古未有之变局”¹。其中黄色地带，为传统华夏文明所处的地缘冲突地带，华夏族群主要依托黄河，和地缘敌人游牧民交锋，发展出我们一直称谓的黄色文明，而地缘迁徙的原因之一，这些游牧敌人作为一种地缘政治势力，在火器时代出现后，就消失了。地缘迁徙的原因之一，所有船坚炮利的敌人，都从海上而来，图1.1中的蓝色地带，也就是华夏文明所需适应的新地缘冲突地带，其冲突面积远大于黄河流域，纵穿多个温带，为变局的落脚点，华夏族群所要面对的新地缘势力是一个海权世界。

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内容，都以华夏族群从桑田到沧海的地缘变迁为基本依据，否则我们无从认识中国革命史是一部族群地缘迁徙变革史。从鸦片战争以来，所有道路都终究要走到文明层面的变革道路上来，所以必须要从政治地缘上升到文明地缘的高度来理解这一变局，百年史就是地缘变局下的文明维新历程。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节内容背后的巨象，是本文全部的背景和依据。由于篇幅问题，这里不再展开论述，有兴趣的，可参阅一下巫师早年写的两篇帖子：《古代中国 — 光辉的公有制历程》和《从鸦片战争到大争论》，其中有相关的观点和论述。

¹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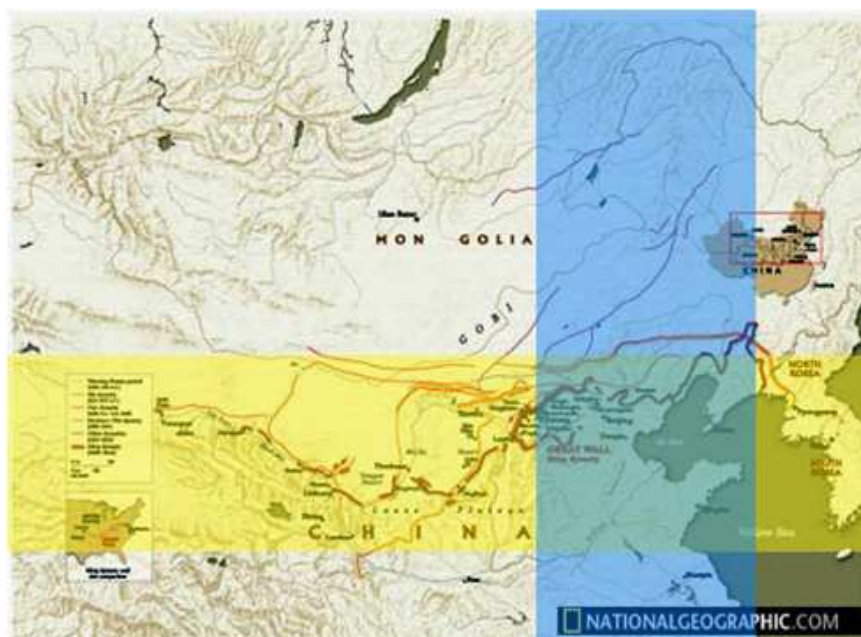


图 1.1 从农牧地缘冲突地带 (黄色) 迁徙到海陆地缘冲突地带 (蓝色) 的文明地缘变局

§ 1.2 华夏文明的公有制形态以及对礼的解读

什么是礼？今天中国人对礼的解读，甚至到了什么礼貌用语等都摆上台面的地步，真是可叹了我们这个所谓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

要理解礼的本质，就需要辨识华夏文明的文明形态。但是传统华夏文明的社会形态，一直以来，都被定位为私有制的封建社会，而实际上，传统华夏文明超出了马克思关于欧洲社会发展史的论断，是一种家族模式的公有制形态，即所谓的家天下。这里不仅涉及传统文明的重新定义，还涉及到公有制形态的不同解读。相关论述在《古代中国——光辉的公有制历程》有比较详细的交待，这里从三个方面再总结一下。

很多人以为现代公有制单位为国有企业，其实存在最长久并最普遍的基本公有单位是家庭。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始公有制的原始部落是什么，看看自己的家庭就可以了。家庭就是原始部落在生产力相对发达条件下的宗法部落不断分家，公有单位不断缩小的结果，家庭就是最后和最小的公有部落。要考察公有制，应该从家庭开始，这是其一。

其二，儒家典籍中所概括的理想社会，也正是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公有制社会。如《礼记》中，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儒家的终极理想社会，公有制大同世界景象。《礼记》中概括现实社会模式则是，“大道之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如有不如此者，在执

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小康社会，就是家族模式的公有制形态。从这里可以看出，早期的儒家理论正是传统文明的家族模式公有制形态理论，这些在《公有制历程》中也有交待。

其三，传统文明的公有制社会形态得以建立和保持，和华夏文明所处的农牧冲突地缘特点紧密关联。远古时期马匹被驯化以后，游牧民很早就栖息在黄河以北的草原上，那时候起华夏族群已经面临这样一种农牧地缘冲突格局。由于所处的地带经常遭受游牧民冲击，导致农耕文明不断迁徙，并且伴随着长期的战争，统治阶层也一茬接一茬地更换。在这种过程中，祭祀系统中所有非实用色彩的东西，都会被淘汰掉。

礼法制度，就是在游牧民不断侵袭下，为抗击地缘压力，华夏族群在游牧民冲击中动荡迁徙中，不断整合祭祀信仰系统、军事系统和行政系统，形成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内部权力规范构架。“礼”这种行权构架同时拥有祭祀、行政和军事的信息，可以看成是政教合一的典范。

华夏原始群落中礼的诞生，我们觉得过于遥远，显得很神秘难以考证，那么今天正在重现礼的伟大诞生过程，我们就身在其中。袁世凯称帝就类似国君逾礼，孙中山就是祭祀信仰型领袖，蒋介石就是军政首领，国民党信仰散乱，无法组织严密地贯彻到其军政系统，所以在其领导下，军阀混战，族群生存危机不断，而毛泽东的党指挥枪，以信仰统领组织华夏族群救亡图存，就是礼的源头，就是礼的实质形式与功能，以此我们才走到今天。只是拜礼教所赐，当礼之大者——最原始最纯正的礼迎面而来时，巫师的族人已浑然不识。

礼法制度就是家族公有制形态下的统治阶层的权力行使规范。礼法为统治阶层的每一级权力，都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权力规范，稍稍超越其行权范围即为逾礼。“礼法”绝不停留在所谓“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这种个人修为或者“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这种应答等礼仪层面，而是皇子诸侯等不得擅出封地、“故国有患，君死社稷”等森严的行权规范与制约。一旦国内出现逾礼或者失礼等现象，就可以看成是政治动乱的预警与前兆进行应对。

如上所述，“礼”正是华夏文明家族公有制形态的权力行使法则，“礼法”就是循礼行权，法究其责。正是“礼”保持了华夏族群魂灵层面的深刻组织性和常态化的军事动员张力，是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基本文明内核，是华夏族群强健自信的不绝源泉。

“礼”确实一直由统治者主导，封土建邦时期，庶人的地位也确实不高，这正是导致礼在后世发生扭曲的主要缺陷。但礼的真正功用是在游牧地缘压力下，确保华夏族群的地缘生存，在生产力高度落后，又缺少长城这种防御工程的情况下，“礼”是华夏族群在持续剧烈的农牧地缘冲突中生存下来的心理组织依据。

不幸的是，在以后的历史中，“礼”发生了道德化流变，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了戕害我们族群的礼教。

§ 1.3 礼的道德化流变和礼教

讲礼教之前，先介绍一下礼教文化中的裹脚一项。裹脚和束胸对女性的戕害，对生产力的束缚，对族群健康繁衍的损害，这里都按下不表。但是裹脚对华夏族群自我防御能力的毁灭性破坏，这里不能不提及。裹脚对个人行动能力的破坏，可见这里的裹脚图片图1.2，裹脚导致女性足弓破坏，并失去脚掌，这给女性带来什么呢。现在人们很少能看见裹脚女人走路了，有点类似踩高跷，由于足弓被破坏，失去弹跳力，不能弹跳奔跑，爬不了山，骑不了马，没有脚掌，导致重心不稳，所以走路颤颤巍巍的。



图 1.2 裹脚后的畸形脚和正常脚的比对（图片收集自网络，下同）

如果仅是一个个体，裹脚所带来的只是身体伤害和行动能力丧失，然而，当家庭中只要有一个这样走路都困难的成员拖累，整体家庭都失去最基本的机动迁徙能力，遇到饥荒灾害，小脚长距离走路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奔跑，而游牧民或者其他侵略者跨马扬刀，来得他们跟前，他们连跑都跑不了，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家子都被屠宰，我们这个族群在那一刻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宋代以后，礼教盛行的中国被蛮夷屡屡入侵屠城成为常态。

今天，还是有人不从族群安全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认为裹脚只是和高跟鞋丰胸一样的女性时尚，或者把裹脚传统归咎到个别发起者的头上，极力为礼教文化维护，替这种霸占民族主义话语权的文化毒瘤招魂，还反过来控诉文革的伤害。那么可以问他们的是，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面对这种恶毒的裹脚文化，这些文官集团和精英阶层又干了什么？他们在其中不仅没有起到警醒阻止的作用，反而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让裹脚恶习盛行于中国，导致华夏族群群体失去起码的安全机动能力，以硕大帝国一再亡于极少数蛮夷之手。此种毫无自省意识和能力，一面大搞文字狱，又一面不停呼喊仁义道德的精英阶层及其文化体系，一次又一次把华夏族群领入亡国灭种的境地。

裹脚只是礼教荼毒族群的冰山一角，全豹一斑。那么，最初的礼，怎么演变成礼教的呢？这离



图 1.3 小脚大户遇到灾患的命运——一个也活不了

不开对地缘生存完全盲视的文化精英千年不懈的持续努力。为了了解这种努力的效果，我们先看看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解读是怎么流变的。

作为公权力行权规范，礼告知各个管理角色的权力范围，与刑不同，刑是下限，刑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去做，即使不合理；礼则不然，礼没有认可的，没有纳入礼的范围的，即使看起来合理的，都不能去做，做就是逾礼或失礼，公有权力系统就会失序。这其中特别是礼明确禁止的，会是整个社会共同的森严禁忌。而刑不上大夫中的“刑”，在祭祀社会中，是针对没有公职的庶人制定的刑律，绝不意味着礼里面没有惩罚措施的意思。礼，就是礼法，礼本身就包含对逾礼失礼的惩治礼律，其中所含有的惩戒律条，较之刑律只可能更为峻酷，并有很多是政治层面的，罢爵赐死株族灭国夺封地去宗庙之类，刑律根本就不能触及与涵盖。

也就是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原有之意是族群对行使公有权力的精英阶层有着高度严格的要求，礼的要求要超过现在国法、党纪、行政条例制约等的总和。远古的祭祀型公有制社会孕育而生的礼，出自族群公有信仰，要求权责对应，怎么可能存在照顾士大夫这种恬不知耻的要求。甚至，为了体现和维持礼的神圣性，他们会是古老祭坛上牺牲的主要来源，除了场所不一样，这一点和毛泽东对共产党的要求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国民党至少在立党原则上也并不例外。

礼为什么不下庶人呢，礼下庶人不是更好吗？庶人不是低士大夫一等，而是没有承担公共权力的族人，无权者无责，也就不存在用礼来规范制约庶人行权的问题。所以规范公共权力行使的礼，是不能施加到庶人的。

礼教精英，又是怎么一步步篡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话的含义呢？

流变从孔子就开始了。孔子的礼，已经偏礼废法，照顾起士大夫的颜面，这在孔子反刑鼎的理

由以及孔子家语中可以体现出来。到了汉代，如贾谊《治安策》等，礼已被解释为对士官阶层的礼遇，到了以礼拘庶人的礼教阶段，君临天下“治吏不治民”的基本定则，被篡改成“与士大夫治天下”，礼就成了族群主体的枷锁，而精英阶层则通过把“刑不上大夫”打造成自己的免死金牌，用“礼不下庶人”把自己镀成金身，又偷来法家的东西把礼改造为礼教，用道德化的礼教拘役庶人，成为盘踞在华夏族群头上吮血吸髓的致命毒瘤。

从礼的祭祀军政行权规范的等级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三纲五常，再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文化精英完成了礼法到礼制到礼教的流变，到今天，文化精英吐出的每一句话都饱含致命的文化毒素。就连今天的孝顺一词，照原有之意也大为扭曲。什么是礼教，礼下庶人就是礼教，礼教就是文化精英和优势阶层利用他们的文化等一切优势，把族人摆弄成僵尸，把族群变成死地。礼教是一切无良优势阶层谋害族人的文化毒源，礼教文化，就是文字地狱，就是僵尸文化。

就这样，文化精英利用其文化优势地位，对华夏文明原本规范他们行权的礼文化极尽扭曲，进而获得政治、经济和道德垄断地位，让本阶层占据族群内的绝对优势地位，这就是软刀子杀人不觉死。而对族群带来的唯一结果却是瓦解了族群文化心防工程和军事上的防御能力，留给这个族群主体的，只有裹脚和礼教奴役。所以非常不奇怪，只要这些文化精英走到华夏文明舞台的中央，主导民族主义，接踵而来的便是，处极少数的游牧异族大规模入侵中原，大肆杀戮族人，并几番血腥残暴地统治中国。如魏晋风骨的文人雅士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闪亮登场，五十年不到，五胡乱华接踵而至；宋朝忧国忧民的才子佳人填词作画，辽金蒙闻着书卷气就前赴后继地奔过来；明代东林党人文章道德、气节忠贞，后金以几万骑兵就轻松席卷吞并整个中国；到了晚清，仁义廉耻的辫子道学除了化为革命党人头上的屠刀之外，丝毫无助于沦丧的国运。



图 1.4 这就是尼玛的儒教大宗师？

别急，“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孔子发出夷夏之防的感叹，到了忽必烈正忙于屠城，诛戮我们族人的时候，孔府一路迎着跪请这个屠夫出任“儒教大宗师”，礼教文化精英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创意，你永远都不知道极限和底线在哪里。可迟至今日，他们居然又要搬出孔子像，觊觎着国教的位置¹。

今天，礼教文化想诈尸，得对这些史实有个彻彻底底的交待，并有铁的保障不依靠精英们的自觉，也有办法在精英自己身上落实孔儒，诈尸或堪一睹。我们需要清楚，中国史观的深刻变革，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对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清算还远远没有开始，都是迫切的文化任务。在此之前，只要民权一天没有落实，礼教这一毒瘤就很有可能以一种时髦的面目，借尸还魂。

§ 1.4 地缘变迁格局下华夏族群的文明维新

近代中国地缘格局的变迁，对华夏族群的意义，深远重大之极，它不仅要求华夏族群进行从黄河岸边到海岸边的迁徙，还会带来华夏文明底蕴及形态的变革重组，整个过程就是华夏文明的维新历程。这一维新历程不仅包括持续一百多年的整个中国革命史，还将有较长时间的演进，维新的最艰难岁月刚刚过去，但文明维新的高潮和海陆两栖有机结合的华夏文明成熟期还并未到来。

在地缘变迁之前，华夏族群所处的是文明地缘环境是以黄河为分界线的农牧地缘性冲突的政治地理环境，地缘性对抗势力是游牧民，并受到生产力条件的限制，华夏文明能够唤醒的力量相对有限，以此发展出家族模式公有制社会形态。

今天中国所处的是海陆地缘性冲突格局，所面对的地缘敌对抗势力是基于个体权力的海权世界。这种挑战前所未有，除了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压力外，海权世界在思想文化等领域，也有其高度先进的一面，因此这种地缘冲突是一种文明层面的挑战。海权文明基于个体，分工精细，这种文明有自己的缺点，但这样的文明，其创新能力几无止境，以此为基础的海权大国，文明攻势刀锋凌厉硕果累累，到目前为止，只剩下一个中国，解决了中国，资本铁幕下的单极世界指日可待。

因此，华夏族群的根本命题就是，在海岸边，我们如何才能存续下去，也就是新地缘环境下文明的维新如何进行。

面对这样一群又一群船坚炮利的海盗，留给我们这个族群的现有生存选项都是陷阱。礼教让中国连黄河这一防线都守不住，更不用说满清的近代地缘表现了，如果继续选择礼教，最好的结果先是板块性瓦解，然后就是成为殖民地或如日本韩国台湾等这样的亚殖民地；海岸线也修筑不了长城，只能比黄河更开放，保守绝无可能生存。其它的，斯大林模式已是反面标本，西方配制的政治药方，前苏联已经吃成俄罗斯了。我们前方是一片绝境，无路可走。

¹关于孔家店，有兴趣者可参阅一篇网络好文：左右逢源永远不倒的中国第一贵府。

当族群智慧面临生存绝境之时，公有信仰就挣脱一切束缚，从族人内心升起，驱动族人魂灵的动员集结，前仆后继地迎接个体的牺牲和族群的新生。信仰是什么，信仰是祖灵的集结召唤，信仰是无中造有，信仰是绝处逢生，信仰是我们这个族群最深的烙印，信仰是海岸边最初的曙光。因为公有信仰，我们这个族群才有了一线生机。

信仰启动了华夏族群的维新历程，以此，我们理解了从五四运动以来文化变革的重大意义——为华夏族群的地缘生存开辟族群信仰的文化基础。五四运动就是文化革新的起点，文化大革命则是文化革命高潮。五四运动从窒息的礼教黑屋上开了个窗户，文革则毁了困住华夏族群魂灵的整个礼教黑屋。没有文革，窗户早就关上了，五四运动的文化成果会只剩下空洞的躯壳，解剖开来，里面必将还是那个毒瘤。

华夏族群怎样才能在海岸边栖息下来，傲立东方？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变革给了我们唯一的答案：**以民权为基的公有信仰和贯彻公有信仰的观念体系及其组织构架，是我们地缘生存的文明依据**。民权是对海权观念体系的有机吸收和消化，保证与海权列强竞争时，唤醒族群每个个体身上的力量；华夏公有礼法模式会组织起这些饱满的个体，集结成协作统一的整体，确保文明的竞争优势，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根本诠释。但我们距离那里还有一段路程，在通往这种海陆两栖文明的维新之路上，我们解剖自己的手术刀，还要继续砥砺，我们要继续面朝大海，敞开胸怀。

§ 1.5 左和右

中国民权的惨痛现状，和左右纷争恶斗有直接关系，这一问题不解决，民权的状况很难改观。但左右的概念中掺杂太多，而且都被污名化了。大多数情况，极左被视为全部的左，极右被当作全部的右，前者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被彻底否定，后者在二十三年前已钉上卖国标签。也正是左右的这点边角料，成了文官集团独裁的借口。因此厘清左右概念，还左右以原貌，意义自然非凡。

对于华夏文明，左右实体，不仅不应相互斗争敌视，反而正应是族群的左膀右臂，共济华夏。目前的左翼，其概念体系大多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概念老旧，结构僵化，确需进行重大改造；而右翼囿于西方的理念和出路，不清楚民权是其落脚点，存在导向性问题，自然少不了刀斧之工。两者距离和衷共济，护祐华夏，还有万里之遥。

什么是左，又什么是右？巫师于此首开先声，正朔左右。左，不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华夏文明公有观念与形态；右，不是曾广为流行的自由主义，而是海洋文明的民权观念体系。左就是华夏，右就是海洋。左即公有，右为民权，此两者才是奠定华夏族群生存之基的左右两极。**华夏文明的未来之路，即是基于民权，达至公有**。其余皆为焦芽败种，异鬼他灵。

现在，可以探讨文革的相关话题了。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实际作用

§ 2.1 文化大革命的法源和纲领

开国不久，毛泽东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批判武训身上的礼教符号，已经传达了他犀利深刻的文化立场。而毛泽东发表该社论的时间，是 1951 年 5 月 20 日，很少有人会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当时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热战正酣，在这样的炮火声中发表此文，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毛泽东心头如海如潮的文化革新能量。没有这股能量，文革固然不会发生，但共产党组织和新中国也同样建立不起来。还会有人难以理解毛泽东何以亲自操刀批判武训，但如果明白武训在国际上的另一化身是印度的甘地，再“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结合印度现状，或能理解一二。是的，武训武圣人就是那个圣雄甘地，而今天的印度正在等着成为下一轮殖民地。如果有遍地的武训，华夏就不会沦亡？不，沦亡会来得更快更彻底，武训就是沦亡。

从这里看，文革的伏笔早就埋下了，不仅如此，文革的源头更深更远，正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革新的源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撰写的宣言最后写道：“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这个宣言本身还是其次，更重要的还是毛泽东对这一宣言的激赏态度：“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称陈独秀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并在胡适高度赞扬的著作《民众大联合》中，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很早就提及民众大联合的“能力”和“练习”问题了。

此后，《新民主主义论》更是明确画出了文化革新的五四分界线，并且给出文化革命主题和宗旨：“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以后的历史说明，在文化领域的革命，这里所说的“我们共产党人”，其实只是毛泽东一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重述五四运动为革命文艺运动的起点，同时给文艺创作提出了政治标准。在这一点上，《武训讨论》中用政治批判解决文化和思想问题所谓不好的先例，在《延安文艺讲话》里口子已经开了。此后，毛泽东已经实际成为五四运动为发端的文化革新舵手，

而文革正是文化和政治精英垄断文艺创作，却不能符合其政治标准这一状况，舵手毛泽东发动的绝地反击。在武训事件和文革之间，还发生多次与文化精英有关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这些规模并不算小的事件，就有一定的文革预演性质。这些事件表明，文化革命实际一直在展开，从中也可以看出把文革理解为权力斗争的浅薄。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线索，都是那个推动文化变革的钢铁意志。

以此，文革的法源性文件，要从《新民主主义论》算起。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则是针对《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两个文件。特别是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集中体现文化大革命真实意图和基本精神的核心文件，是对《延安讲话》的升华扬弃，恐怕也是在如此正式严肃的政治文件中唯一提及灵魂一词的文件，也是理解毛泽东要戮力推行这场革命的关键。其后的所有运动和相关文件，都没有离开这一宗旨。不从这一文件出发，对文件大革命的一切算计之心和妄自揣度都是无知可笑的。

从任何角度来讲，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中实际存在的所谓政治问题，即使有刘少奇的背景，也远没有《五一六通知》中所批驳的那样严重，它最大的不幸是刚好堵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枪口上。对文艺创作提出严格的政治标准、在《武训讨论》中首开政治批判先河的毛泽东，其高度敏锐的文化感知能力，是这些戎马一生的老红军几辈子都无法企及的，自然就更谈不上理解，否则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之间也不会有如此深刻的矛盾。文化对毛泽东来说，是一生的系缚，是信仰；而对于这些战友来说，文化和政治权力比起来，问题太小了，几颗子弹就能搞定。面对这样一群在文化领域脑中完全是空白的权力继承者，文革就不那么奇怪了，因为旗子的颜色和旗子换没换，他们恐怕永远也分辨不清楚，也根本无所谓，而且还不妨碍他们解释为正宗的红色。王震遗言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其实这不是早晚的问题，而是有无的差别，没有毛泽东，他连早看这一想法都不会有。

《十六条》是怎么回事？《十六条》这么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十六条》究竟在说什么，我们只有上溯到五四运动时期，显露毛泽东最初文化理想的《民众大联合》以及《新民主主义论》，才能感受其初衷。简而言之，文化大革命正是以政治方式开展破旧立新的灵魂革命，批当权派，就是破旧，就是蜕壳，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是立新。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正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权运动。

毛泽东不可能让任一个人或者势力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并要达到灵魂革命的全面性和彻底性，所以老红军们很快就痛苦地认识到一点——他们都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而是成为他们自己都

懵懂的“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的一员。并且《十六条》还给出了让他们梦魇一生的处理方式：“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一时间，冤孽四起，几十年的老革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不乏其人，然而华夏族群脱胎换骨的新生，也在其中。

与文革有关的历史文件太多了，以下是巫师认为能基本反映文革历史线索的一部分文件：

1. 五四运动及其《北京宣言》，这个宣言本身还是其次，更重要的还是毛泽东对这一宣言的激赏态度。
2. 《民众大联合》，1919年7月，受五四运动触发的愤青毛泽东的社会思想起点。
3. 《新民主主义论》，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940年1月），是文革的法源，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实际也是延安整风的思想准备。
4.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法源性文件之一，今天在形式上被继续继承，但在《十六条》中已经扬弃升华。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今天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讲话》，一个是《十六条》。
5.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官方认为这是对文艺创作进行政治干预的不好先例，实际则是政治性文化改革的信号弹。
6.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7.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8. 《二月提纲》，彭真等人给《海瑞罢官》批判运动消火所制定的指导方针，成了挡在毛泽东要全面推动的文化革命前面的一个重型靶标。
9. 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继续为文革铺垫。
10. 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许改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通过对《二月提纲》的批判，全面拉开文革大幕。
11. 1966年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正如标题一样，炮打司令部，思想文革为自己竖起政治敌人。
12.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966年8月8日，文革的纲领。
13. 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1967年1月28日。

14. 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十条），1967年4月6日。
15.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其中，文革被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 2.2 毛泽东思想简史及其间的政治斗争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树的是旗子，康生拿的就是鞭子。旗子竖不竖，毛泽东在，早晚的事，没有鞭子，共产党早散了。历史将会证明，系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最光辉的一页。但康生在信仰系统中，扮演的正是护法和清道夫，康生说“我是整人的”，说明他对他的这个角色认识很到位，护法打的就是人，护的正是信仰组织，这是信仰系统必然的要求。为什么共产党内部斗争要远比国民党激烈甚至冷酷，但是不仅没有斗垮，反而越斗越有凝聚力，越斗越有信念和力量，原因就在这里。恨毒康生的人当然很多，不然怎么可能死后还开除党籍。但是没有康生所扮演的这种峻酷角色，毛泽东思想就是另一个三民主义，中共就是派系林立，信仰散乱的国民党，那么从信仰中诞生的新中国就只能是个泡影。这一点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以为人的性命多么可贵，冤枉了如何了不得，这种观点对人民群众来说是适合的，但对共产党员来说，就是对信仰的无知。他们不知道纯粹的信仰者是多么期待信仰的考验，甚至有时是多么渴望牺牲的那一刻。对于信仰者而言，那些所谓迫害冤枉就是来自信仰的洗礼，不仅应该坦然接受，其中还有精神质的升华。经过这些洗礼的信仰者，离信仰更近，其意志力量和创造能力都有质的提升。比较一下就能体会点信仰的价值，和烈火时代的共产党员相比，今天多数的共产党员早已告别信仰，不过是些腐败分子和腐败预备队而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激活了华夏族群体内救亡图存的信仰力量，也就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是非常厚重的。“中国”显示这一信仰系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区分，“共产党”显示信仰系统救亡图存的奋斗方向。前者，表明这一力量不得不与前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拉开距离并最终分裂，后者，也意味着这一力量不可能得到西方阵营的支持，所以这支力量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旗帜。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旗帜，是信仰统一的自然结果。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失败，就成为美国的一个傀儡；革命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至多也只是苏维埃联邦的一个联邦或者属国。王明们就是前苏联的中国红色代理，以这些代理的理论水平，中共这时候没有独立的思想支撑，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主要就是从根子上摆脱苏联，但谈何容易，就连毛泽东身上，苏联模式

的影响也是深厚的；党外斗争，最后都指向美国。中共与苏联的这种分庭抗礼，在斯大林之后，中共和苏联的文斗中非常鲜明地展开，这是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思想从产生到自立的一个里程碑。而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线索来看，很有可能关系到中共关于国际战略的重大决策，个人推断为刘少奇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支点。而中共国际战略的重大决策，很可能在党内形成异常激烈而最终没有解决的矛盾。简而言之，毛泽东很可能要公开自立山头，而刘少奇等绝大多数领导人，在国内形势只能算喘过气来，国际上抗美援朝战争在即，国家多方面有求于人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很难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迈出这一步，而且包括林彪在内，中共高层和苏联的渊源极深，这种转变遭遇党内阻力一定是异常激烈的。注意，这时候从党内看来，毛泽东国内和国际两条战线都非常孤立，比决策朝鲜战争时的局面还要困难得多。想想看，看着满目疮痍、饭都吃不饱、周边两强进逼、打狗棒也没有一根的中国这副还已经被别人看穿的烂牌，再看看这么有信心的老大，小弟们的内心又怎么可能没有点想法。

但毛泽东就是走通了。有了1964年和1967年两弹试验，以及1966年导弹核试验的成功作为基础，1969年的珍宝岛战争，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走的关键一步，也是铁心要三分天下给世界打出的信号弹。之后一段时间内和两霸同时叫板的中国处境最为险恶，但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三分天下的国际战略获得巨大成功，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其潜在国际战略空间前所未有。到1974年，三个世界的国际地盘划分，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中三分天下的世界战略基本成形，而今天中国在其中继承的遗产主要就是独立自主。这时，毛泽东思想就和最初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道扬镳了，或者说，夺了旗子，毛泽东思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指导思想。

三分天下的力量从哪里来？毛泽东自己的答案是人民群众。毛泽东的国内建设和国际斗争，其力量源泉和奋斗理想都在这里。

革命阶段，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一致的，文化主要服从和服务于革命需要，文化战线上党内没有矛盾。建国后，从武训等事件开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文化路线上的深刻矛盾以及衍生出来的政治矛盾，越来越明显。建国后，毛泽东关于人民头上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概念，有一个较长的酝酿形成过程。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并没有把文化革命的线索和刘少奇联系起来，但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巨大的观念鸿沟，最终还是让这两者结合起来，例如《修养》一眼就能看出是儒家正心修身的翻版，相当于另一个《弟子规》，这和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坚定信仰是很不同的；再有白区工作经历，让他从组织和心理上对人民群众的监督有一种他自己可能都觉察不到的排斥感；还有他在经济建设和国际战略上和毛泽东的分歧带来的政治斗争公开化等，这一切，就都和毛泽东心中的走资派形象对应起来了。而这样的刘少奇看那个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文革终究还是和刘少奇栓在了一起，否则文化大革命的争议可能和延安整风的规模差不多，可以巩固的政治成果也会多得多。

最后，文革以政治失败收场，还和毛泽东在文革上所面临的政治局面有很大关系。首先林彪支持的是毛泽东，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对文革一点都不感冒，看不到文革的任何文化意义，只是把

文革看成另一场政治斗争而已，这自然为二人之间埋下分裂种子，同时，在国际战略上，两人应该也有不小的分歧。而毛泽东政治上又特别需要林彪的支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出现了妥协，文革没有真正在军队中展开，在军委八条和军委十条的多次改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让步和纠结。清算文革，恰恰军方是主要和关键的支持力量。所以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两个看似矛盾的罪状，一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二是文革集团成员，都有实际基础。但临了为了性命否定自己一生，不会是那个林彪。

说来说去，党内和军内，还是无人理解毛泽东暮击晨钟的无奈与悲凉。

§ 2.3 文革何以必要

2.3.1 阻断文明革命自发性血腥进程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所有理想，都随着其地位的改变而烟消云散，甚至一瞬间就从被压迫者朝压迫者换脸，整个社会只是犁过一遍，其它一切照旧，只有毛泽东矢志不改初衷。

文革之前，文明层面上主动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从未发生过，胡牧骑射只能算作推行习俗政改，春秋战国到秦领天下，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制度革命，这其中也有文化革命的成分；而拓跋汉化，要纳入到整个游牧民冲击导致的南北朝背景中，属于游牧民适应新地缘环境的文明接纳过程，并且冯太后和拓跋宏推动的汉化，也谈不上最终意义上的成功，但从五胡乱华到唐领天下，也可以看成是一场文明适应性革命。

欧洲的文艺复兴，可以看作是自发的文化革命过程，而这是一个宗教的、贵族的、国家的、资本的等各种新旧势力几百年间互相清洗的过程，文艺复兴进程是血的进程，不仅如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革命运动等，都可以看成它的继续和延伸。其中确实有社会文明之进步，但每一股思潮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政治力量，这些力量在求存本能的驱使下会企图消灭所有对手，以至城头不停变换大王旗。这种自发的文化革命过程，血流得太多太多了。

华夏文明的诞生过程，是一个最早的文化革命过程。在黄河流域这一农牧地缘冲突地带，骑着刚刚驯化的裸马，手中拿着绑着石头的木棍，游牧先民一群接一群趟过黄河，不断游掠农耕居民，刺激黄河流域从部落朝集权观念的国家形态演化以及礼的诞生。而这一文明革命过程，将来考古或可证明，其持续时间更长，更加血腥野蛮残暴，尸体可以填满一条又一条黄河，礼就是这些亡者的魂灵铸就。

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正是文明革命过程在新地缘环境下的重演，以往的黄河流域的农牧地缘冲突，换成东亚大半岛的海陆地缘冲突格局。根据以往的文明演进情况，动乱至少还要再

持续二百到五百年，才可能完成文明形态的调整过程，而且中国是文明迁徙，破旧立新，过程会更为漫长。海岸边的中国如果重复这种模式的文明演进，中国能不能存在都是一个问题，海岸线也只能是红色的。

要避免这种文明演进中反复带来的灾难，根本的办法就是进行自觉主动的文化革命，及早肃清旧势力，才能达到止血效果。但是新旧势力交替，肃清礼教、红色专制等异旧势力谈何容易，看看那百年里革新和保守势力频繁地血腥更替就知道了。怎么办？答案就是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所有的文化要想寄宿到一个群体身上，主导者和受众都不可或缺，尤其是受众，是文化的最终载体，并且可以自发完成主导者的复制工作，缺个族长、主教或阿訇，受众会很快复制出一个来，所以靠肉体消灭主导者改变不了文化性质——受众会很快克隆一个新的，一切照旧。

文革就打在礼教等所有文化毒瘤的死穴上。文革并没有象以往的文化革命中，从肉体上消灭旧的文化势力，而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通过发动群众，让受众批斗主导者，“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主导者的优势文化地位一夜之间消失了，而且再也无法恢复。另一方面，受众也出现彻底改变，眼前的这个主导者曾被自己踩在脚下，关系倒置，也就不再企图克隆另一个主导者，批斗中也就解放了自己——毒瘤寄宿关系土崩瓦解，文化旧势力已无立锥之地，政治基础没有了，文革基本扫荡了所有旧文化。



图 2.1 让旧文化残余风声鹤唳的大学生红卫兵毕业照

正是文革发动群众打倒一切精英铁幕的立场，因此也不可避免的，所有旧文化势力残余，不论它们曾经怎样的你死我活，在倒扑文革的行动和主张上，立场惊人地一致。所以今天大学生们的一张红卫兵毕业照，都足以让他们如此心悸胆颤，歇斯底里。这种恐惧还有一种真实的来源：如果有一天他们做好全部的经济和政治准备，彻底政变，哪怕有一人振臂一呼，发动文革，这种政变就会立即被扫地出门，逐个清算。

文革正是通过文革的方式，扫荡掉旧文化势力继续寄生的政治基础，阻断华夏族群地缘迁徙的灾难性演进过程，让族群行进在存续的康庄大道上。

需要强调的是，《决议》对文革的否定，不是已经连根拔起的旧势力的反扑，因为邓小平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与旧势力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结盟。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怀疑炮火中走过来的战士对这个族群的忠诚，这种否定只是来自摸石头过河的思维对文化革命的无知，在这一点上是不能误判的。其次，文革的社会成果已经产生，特别是对官吏、知识分子和民众深巨的心理影响，已经彻底改变历史走向，任何决议都无法撼动。诚然这个否定为今天的精英再次自我集结开了一个后门，但文革启动的势不可挡的族群文化和政治能量也随之暗潮涌动，《决议》之后，一切都没有结束。

2.3.2 摧毁了新政权的红色专制路线

文革另一个更切实的功用，就是让中国和红色专制路线分道扬镳。文革不仅彻底断送传统保守势力，一样送走了极左今天所倡导的红色专制路线，即便红色复古也不可得。

按照前苏联，东欧，朝鲜，古巴等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毫无例外的惯例，中共的红色集团，如果没有来自文革的冲击，必然又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精英铁幕，一个君权神授的变种，一个必将崩溃的权力怪胎。在国际性大范围血的事实面前，任何文字性的辩解都是苍白的，只能是这一论断的补证。

文革阻断了红色势力的极权导向，让中国避免了前苏联那种最终崩溃的红色道路。文革在这方面的作用，一是代表人物都遭到冲击和批判，全军覆没；二是代表人物在批判后对其占统治地位的红色理论体系的语境纠结。红色集团对这个红色语境系统很纠结，说它对，上面有个说自己错了的超级红色巨头毛泽东，自己坐在被告席上；说它错吧，又坐实了文革中的批判，还是坐在被告席上。上面压着毛泽东，下面顶着文革，老红军郁卒已经很久了。文革之后，红色集团缺少为自己辩护的系统政治理论，当初看家的理论现在对他们来说，出现深刻裂痕，似好非好，似对非对，动弹不得，连朝鲜金家三胖都比他们强，他们的金家主体思想挤满了社会每个角落。最后，只好被邓小平牵着鼻子，老老实实地走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

从老红军们的郁卒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文革，红色路线和红色权贵就是铁板一块，一个崭新的精英铁幕，红色政权要么全然不可动摇，要么彻底瓦解，而中国，要么是崩溃前的前苏联，要么是崩溃后的俄罗斯，不可能是今天的中国。文革通过批判苏联模式和批斗整肃其支持力量，堵死了苏联模式及其两种结局，为改革开放开辟了国内政治基础。改革开放摆脱红色铁幕的控制，模式和路线都来自文革，正因为如此，缺少文革，中国就不会从红色灾难中被救赎。控诉文革的人，又会无视前面的论述和中国当下的民权惨状，拿中国人的觉悟能力做例子，会说没有文革，中国在共产党或者国民党或者礼教精英的领导下，不仅也会变革，还会变革得更好。巫师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们，这种更好，只会停留在他们的臆想中，千年礼教和印度种姓制度亘古不变的架式表明，没有毛

泽东这把铁扫帚，那些脏东西即使再过一千年，一粒尘埃也不会掉，只会越积越厚。

文革之后，文官集团得势丢理，精英铁幕上的裂缝是焊接不起来了，充其量也就蒙上一块黑布。所以今天的越来越深越来越广的腐败集结，找不到可以为之辩护的理论。所谓的三个代表理论，不像当初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远没有真正意义上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2.3.3 移风易俗的文革和华夏族群新貌

本节是精英角度观察研究文革时，不可克服的视觉盲点，基本在所有文革史料中也极难看到。因为这些文革史，目光聚焦的都是主要是政治和文化精英，这也是精英以为文化大革命完全错误或者彻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种论断其实很滑稽，五四运动甚至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革命，文革充其量只是其间的高潮，广义的文化革命，其实正是文明革新，什么时候停止过自己的脚步。



(a) 皮囊僵尸

(b) 礼教的畸形傀儡

图 2.2 晚清女性标本

在准备写这一节时，巫师从网络上查找了晚清以来，中国各个时期的老百姓生活照片，有一个印象极为深刻地浮现眼前，那就是普通人面部表情的时代特征特别明显。因女性的心性更容易流露，文化的变革在女性身上往往会有更直观的显现，这里主要用女性图片反映这种文化层面的变化。如图2.2，晚清中国人绝大多数时候没有表情，没有笑容，一副僵尸模样，相当恐怖（巫师并没有贴出更让人窒息的礼教施虐图片）。

到了民国，西风东渐，城市精英女性开始有一些变化，多了一些笑容，但普通女性依然照旧，特别是所有女性都没有大喊大叫大笑和愤怒等稍微夸张一点的表情，完全没有，一张照片都没找到。其原因，是人们所有的动作和表情，都要经过礼教严格过滤。甚至到了文革前的 1964——1965 年，照片反映出普通人的表情还是不够丰富，非常压抑沉闷，有点象今天朝鲜普通人的表情。



(a) 放足后身体恢复，表情还是呆滞



(b) 空洞的眼神，一无余物

图 2.3 发懵的民国女性



(a) 1964 年照片



(b) 1965 年照片

图 2.4 文革前后女性表情的划时代变化是惊悚的

到了文革中的照片图2.5—2.9，情况彻底改观，普通人的表情变得自然丰富，带有笑容以及更夸张鲜活的表情越来越多，而且更多自信坚毅的脸显现出来。这种脸非常鲜明，你把世界所有黄种人、所有时期的照片放在一起，也很容易地把这种表情挑出来，有些表情仅为那个时代的中国所独有。这些表情，现代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模仿出来，因为我们体内的文化能量被抽走，表面丰富的文化在某些方面出现断层性缺失。图2.9中，就是一种典型的时代表情，这种表情带着坚韧，有一种饱满的生命力的流露，既不象红色专制下的表情，缺乏生命力和自信，或者木讷呆滞，显得凶气而僵硬，也不象今天中国的表情，多了些焦虑和懈怠。



(a) 回归原生自然朴素的人

(b) 历史上根本找不到的天然神韵

图 2.5 文革时期照片——自然



(a) 如花绽放的现代笑容

(b) 告别礼教的激情宣泄，子教三娘的资本

图 2.6 文革时期照片——花样绽放



(a) 捍卫家园的稚嫩心灵



(b) 你呐喊过吗？

图 2.7 文革时期照片——怒目金刚式



(a) 感受一下图中的惊世骇俗



(b) 苍山如海、红旗如血的人间胜景

图 2.8 文革时期照片——浪漫革新



图 2.9 文革时期照片——文攻武卫

当看到图2.10中这位姑娘贴大字报，脸上显露出那种不受拘束，自然而专注的淡定神情时，巫师确信，困死族人魂灵的礼教这一恶咒终被驱净了，这姑娘脸上绽放的就是族群的新生，华夏族群的魂灵摆脱了所有束缚，自信地伫立于海岸边。



图 2.10 终于显现的自然面孔，千年礼教后的无声霹雳

看到上面这组照片比对，继续把文革理解为罪恶的精英灾难，已经毫无意义。这组图片所显示的，不仅不是精英灾难，反而是华夏文明桑田沧海的变迁中，文革对华夏族群魂灵移山倒海的改造之功。

那么，展现在照片中的普通民众的精神风貌，在文革中何以发生如此彻底的变化呢？网络关于

文革的相关叙述，记载了其中普通人的文革心路。

在文革之前，普通人对于干部有着一种本能的畏惧，见到干部就全身发软，象老鼠见猫一样（实际不同，老鼠会跑，普通人则是酥软，丝毫没有反抗和逃避意识），腿肚子发颤，说话或者做动作，身体就是不听自己使唤，脑袋发懵。这种感觉，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由来已久，现在还有很多人，可以从自己的领导那里，找到一点这种感觉，但程度上和当时的人们完全不能比拟，现在人们至多是一种工作机会层面上的紧张，而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礼教下“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予取予夺的生杀大权。这种感受很难向现在的人们解释，文革前的普通人见到干部，心理感受在程度上类似杀人疑犯被人证俱获，丢魂落魄的情形。



图 2.11 礼教下和谐的官民常态

可是经过文革中的批斗以后，即使那些只是跟随大众颤栗着喊喊口号，自己没有主动批斗过干部的普通人，看着干部在台上被批斗的样子，对干部的畏惧也一夜之间颠覆。平时和干部见面说话，一般还会维持表面上的礼貌和客套，但内心的畏惧却没了，有一种头风治愈的爽利，个人的感觉如同隔世为人。这种转变对于华夏族群极其重要——头上的礼教恶咒被文革解掉了。人不再象以前那样浑浑噩噩的，变精神了，全身充满了力量，眼睛里也就开始有了文革照片中的那种神采。当族群的绝大多数主体都由此从礼教等铁幕下解脱时，族群的魂灵也就得到新生和自由。文化大革命也因此深刻影响着华夏族群文明维新的未来走向。

文革就是毛泽东手把手教民众思想造反，《毛主席语录》就是魂灵革命 DIY 指南，冲击精英撕裂铁幕的批斗场，就是华夏族群魂灵浴火重生的祭坛。如图2.12所示，正是通过文革，毛泽东把他那缔造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心灵能量，倒灌到华夏族群的肌体内，启动了华夏族群的能量循环，结合批斗场面，这一能量强流开始了对精英铁幕的冲击。

华夏族群如果没有这种心灵能量，会很快被礼教、红色专制等各种类型的铁幕意识形态所奴



图 2.12 君授民权的现场，公有对民权的文化能量倒灌

役，之后也不会有足够的心灵能量摆脱控制和自我解放，华夏大地会再被铁幕包裹，暗无天日。

2.3.4 相关文化谱系的比较

要进一步直观感受文化大革命的不世之功，有必要和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洗礼的各国各地区的文化谱系进行比较。中国当前民众的思想开放和观念革新程度，其实可以和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比较，这里只挑一些意识形态或者文化脉络上比较相关的这些地方进行比较。通过这些比较，文革极其深刻的那一面，或可稍稍浮出水面。大多社会变革方案，在这里都能找到它的现实注解，尤其是没有文革的开放中国，下面就有明确的标本。通过这些文化谱系的比较，回答了没有文革的中国，其真实发生的发展途径。

台湾

中西结合有一万种，台湾的政治模式是极其糟糕的一种，之所以没有定为最糟糕的，前面有北洋政府，后面还有香港等地。中国台湾政府也算有五四运动的血脉，那么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又采用西方所谓先进的选举政治制度，有这样一种中西结合的背景，按照正常道理，应该足以完成国民性格的塑造。实际的情况则是一塌糊涂，构成其民众心理的文化要素多是垃圾。从图2.13到图2.15这些刺目的图片以铁的事实说明，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五四运动的文化成果不可能巩固，族群的文化心防就必然存在巨大漏洞。任何不那么偏执的人，都能从这里看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上的深刻意义。

台湾人从上到下，直接表现出最致命的两大文化缺点，一就是腐朽的礼教文化毒瘤从未根除，反而被光鲜继承，从扫大街的老太太到他们最高领导人，都到处烧香拜俑；二就是对西方制度和西



图 2.13 五四运动，你在哪里？

方社会价值模式的无条件接受和服从，这两点他们和中共都截然不同。这种群落，稍稍遭遇外界难以抗拒的威慑，民间迷信的对象，就会由儒释道的泥雕木偶嫁接为外侵者，整个社会就会快速完成从亚殖民形态到殖民地状态的转变，那就是香港。



图 2.14 代表台湾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台湾还是说明文明革命血腥演进的一个范例。首先台海危机多次上演，战争阴云从未消散，而台湾当前内部局势如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争斗的分裂状态，由于没有自觉的文化革命，台湾境内就存在各种地缘势力的影响，这些势力终究把台湾分裂成蓝绿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的恶性争斗曾经非常激烈，可以朝自己的肚皮上打子弹，暗杀和内战就不是没有可能。今天我们看不到台湾的暴力演化，不是台湾政治有多好，而是台海操控各方的政治均势没有打破而已。但从台湾的这种形态看，如果中国继续这种文化和政治分裂局面，文明血腥演进将会无法避免。



图 2.15 反攻大陆？台独？

写到这里，感觉还会有人不理解文明的血腥演进怎么可能在当下的中国发生，这里巫师就这一问题进一步说明。我们都知道，中国当下的思潮集结，主要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新右派。尽管有乌有之乡和华尔街革命等事件，让左右阵营都有些变故，但不改变阵营集结，不改变对峙态势。

这些阵营里的所有人，都以为自己的观点立场从自己的个人思想中产生，对社会现实理性思考的结果和选择。而实际这两个阵营则是文官集团据用当体的极度膨胀，导致华夏文明的维新之路和海陆二元地缘结构之间发生失调，在华夏族群中各有所偏的折射结果。所以新左派和新右派，表明他们并非其遥远的老前辈嫡出，也可看出文革打扫的一点成效。新左派乃从华夏之灵中逼出，就是保皇党；新右派则是华夏之体内幻生，正是造反派。随着文官集团膨胀加剧，社会腐化更深，左右争斗也会愈加激烈，如果他们不能集结在华夏祖灵之下，那么等到一天，一声枪响，灵体相互交伐，华夏上空乌云密布，下方血流成河，外有异鬼他灵，伺机毁灵灭体，裂解华夏，华夏的维新之路也就彻底终结。这就是蓝绿台湾这个麻雀标本给我们的地缘提示。

此外，中国大陆民众目前表现出的这种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关注度，台湾是没有的。蓝绿政治把自己变成目的，截断了台湾民众对外界信息的鲜活感知，台湾人更关注蓝绿，自然就逃脱不了岛民心态。

香港

香港是中西结合的流变谱系中更为落后的另一典型，实际上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和礼教文化的黑暗结合，这也再次提醒我们中西结合的范式问题。香港不仅没有经历五四运动洗礼，而且殖民者有意保留礼教的传统陋习，直到1971年香港纳妾、兼祧都是合法的，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中并行不悖地保留下来一样。

香港人的迷信是两岸三地最严重的，迷信渗透到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中；香港人的殖民精英意识，在两岸三地是最刻骨的。如图2.16，香港人的迷信恐怕整个东亚都是屈指可数的，不要说风水，求神拜佛算命、赌马彩票之类，就连房地产完工前，都要自己放火不大不小地烧上一把，叫做火烧旺地。迷信消耗掉族群主体全部心灵能量和无数的社会资源，也就消除了对精英铁幕的致命威胁，迷信就是贱民工厂。精英铁幕最恐惧的就是民众心灵能量有针对性的组织集结，那就是铁幕唯一的罩门和死穴。



图 2.16 港人求神拜佛的场景

而香港精英的文化意识，其实就是奴才文化的变种，尊殖民者为婆罗门，视底层民众为贱民，回归后则把自己打造为婆罗门。和印度一样，被殖民久了，对殖民者就完全接受，对生存危机缺乏危机感。所以尽管殖民者高高在上，却没有任何异己感，从来不以殖民地为耻，反而为西方反华反共势力提供一个前沿基地。没有中央的拯救，他们的财富早就在几次金融风暴中被他们的欧美主子席卷一空。而他们却反过来对大陆民众，却拥有殖民者的优越感，如香港的一些文化精英就以为自己似乎拥有某种文化上的优越性，喜欢对大陆说评头论足，却难得见到他们对香港恶劣的文化和政治环境有过激烈的批评抨击。

2005年香港立法会通过，2006年后，香港的亿万富豪们就不用再交一分钱遗产税了，估计这些帮闲文化精英至多有点腹谤吧。民主法治的香港，慈善的富豪，哦，还有崇高的公知。现在来看，香港人怀念港督时代，也未必全无道理。

两岸三地中，没有经历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香港，殖民系统所带来的破坏导致其传统文化



图 2.17 牢记捐款的香港人显然对历次金融危机忘得很快

的优秀成分继承还不如更具规范的日韩，而和经历这些洗礼的大陆相比，文化血缘最远，离种姓制度最近。没有大陆持续的血液输送，脱离大陆的香港不会比种姓印度好多少。不知道上层被精英意识所笼罩，下层被迷信包围的香港，将来拿什么来保有这几十年赚大运截留的巨量财富。

韩国和日本

没有经过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洗礼的日韩，在传统儒家文化习俗的保留要比两岸三地还要多。韩国和日本等这些国家，按照巫师的定义，属于亚殖民地一类。亚殖民地不是以前所称的半殖民地，而是依靠某一大国，很难取得独立地位的地区。象这些国家，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国际政治地位，想一想中共摆脱苏联控制的困难程度就知道了。所以如果主子需要，这些国家会在一夜之间沦为新的殖民地。

很多人激赏日本人在细节上的精致，日本甚至从儿童就开始接受这种精致教育。日本人在细节上的过度关注和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从而缺少通变和逆反思维，其实正是日本文化最致命的地方。一旦外族降服其统治阶层，整个国家就不再反抗，这种国民特性的缺点所构成的族群安全巨大漏洞就显现无遗。巫师以为，日本缺少的就是砸烂所有秩序的人，现在缺少，将来还会继续缺少，因为精致的日本文化不可能孕育这样的国民和这样的思想家。这种文化，伍子胥也是不会有的。

《广场协议》的签署，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亚殖民地和独立自主，却带来日本经济泡沫急速膨胀，而日本人看不到背后的巨大危机，却洋洋自得地抛出《日本可以说不》，以为日本取得了某种形式上的独立，结果随之而来的是没有尽头的经济衰退，日本人的鼠目寸光可见一斑。而现在依靠爆过他们的美国来叫板中俄树地缘大敌，就完全是取死之道了。更神奇的是，这个渴望核能力的岛国，还在自己周围堆满常规导弹就可引爆，而且只能爆自己的原子弹。

二战以来，被《和平宪法》等去势的日本已经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以后也不会是，内部构造本来就很单一的和魂已经死了，汉才还是洋才，也就不会有用武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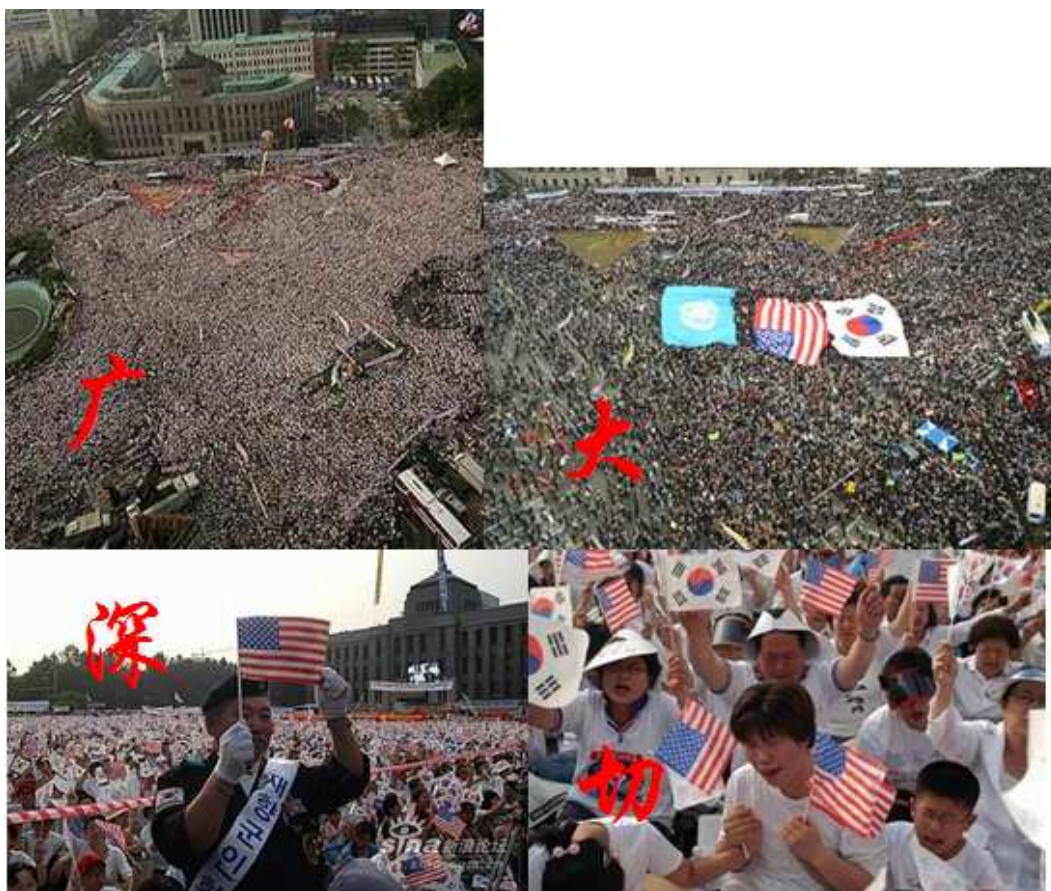


图 2.18 爱国如斯，卖国如斯

如果说日本成为亚殖民地还有不情愿的地方，那么韩国在接受亚殖民地的态度上就喜感多了。一般的小国迫于无奈接受外国保护，或多或少有点羞于启齿。传承优秀儒教文化的韩国人惊天动地、如丧考妣地挽留驻韩美军，民众所举行的游行展现的“广、大、深、切”壮观景象，多多少少让巫师颇感意外。标榜儒家文化根基的韩国人喜感一直都很逼人，所以那个美韩 FTA 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朝鲜和越南

一些左派把所有反对朝鲜的言论，都看成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那么为什么不去自己看看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到底都有些什么垃圾呢。如果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朝鲜这种货色，那么这个阵营散得越早越好。

所有的证据都指明，受中俄地缘保护的朝鲜是所谓社会主义阵营里得国最为不正，所以做贼心虚，铁幕包裹得最为严密的暴虐政权。不建议中共继续维持这样一种政权，除非能够敦促他们立刻变革。巴基斯坦已经证明，即便有风险，政权轮替，未必就会改变地缘政治结构，对朝鲜半岛来

说，这种风险只会更小，改变只会从更多方面巩固和加强对中国更为有利的地缘政治版图。但是，即便改革，也未必能够拯救朝鲜，改革路上，这位仁兄会以最快的腐败速度追赶难弟越南，出口新娘的越南就在前面的路口等着它。

越南这个至为关键的红色标本，对于研究文革和改革的关系极为重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以后或许还有开放的朝鲜继续印证两者之间无可辩驳的逻辑关系。

早期越南是红色谱系中离毛泽东思想最近的政治系统，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毛泽东思想幼年形态的延续样本，因为越南全部的军事思想基本都是毛泽东的，其国家意识形态和文革前的中国最为相类，除了没有进行文革外，它还亦步亦趋地随着中国走进改革开放，其实只有开放，没有改革，因为没有可以改革的工业对象。越南相当于 1965 年中国的延续标本，文化上和中国核心的区别就是缺少文化大革命这一环节，因此，也最能说明文化大革命对红色谱系的独特文化和政治影响。

中国和越南，都是半殖民地和礼教社会脱胎而来，也都经过漫长的独立解放战争；改革前，一个据说崩溃边缘，一个真正硝烟方尽；改革中，一个打头阵，一个跟着走。按照目前的逻辑，经济成果、社会的精神面貌，民众的民权意识等主要和改革开放有关，那么按同样道理，开放的越南，有前苏联和中国的援助，应该有更快速更长久的经济发展期，政府清廉度和中国也应该处在同一水平。而 2011 年越南的清廉指数排名 112 和人均 gdp 排名 138，均低于印度的 95 和 134，中国分别为 75 和 87。从进出口工业品种类来看，越南没有工业可言。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存在失败的危险，那么越南的改革开放失败已成定局。改革开放的越南，被外资和垄断企业控制，不可能走到日韩的经济水平。不论越南共产党用什么政治改革措施，都不会有实质性改变。任何人都可以从看出中越改革成果的巨大差异，已经不可能用细节上的分歧来解释。换句话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因素，之前就奠定了。

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文革对国家建设和民众的影响效果，在和越南的比较中就能体现出来。和中国大陆这种强势的民意集结不同，越南民众没有形成独立的议政思潮，这种思潮中的民众力量，一直被右翼解释为开放的结果，在开放的越南却踪迹全无。越南的国家领导人惩治腐败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决，甚至把腐败问题视为国难，大有准备 100 口棺材留一口给自己决一死战的架势。而数据告诉我们，共产党执政的越南，其腐败程度比印度更为严重，民意的反弹却鲜有所闻。而早被大陆民众抛弃的清官青天诉求在越南民众内心却得到极为强烈的共鸣——没有文革，民众和官僚都看不到民众身上的力量。因为没有毛泽东的文化能量倒灌，礼教和红教下的民众，就不可能有中国的这种维权意识和公众力量。和礼教社会一个鸟样，没有民权意识的被压榨者只能以这种青天诉求表达铁幕下的乌托邦渴望与绝望。

越南 1976 年统一，之后继续打战，尤其还和中国叫板。但到 1986 年，越南领导人国家意识也非常强烈，很快就调整国际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营造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并学习中国改革开放，而且他们的海岸线相对国土面积更长，更加有利于改革开放。很多人说文革十年对经济的破坏如

何惨重，那么没有文革会怎样呢？高飞猛进十年？越南就是世界提供给他们真正现实的答案——越南的改革开放不仅没有让他们建立起工业系统，而且还毁掉了建立工业系统的国家能力。对于数字不敏感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河内的卫星地图，比对国内二三流的城市，就一清二楚了。因此，越南就是没有十年文革的另一个中国版本，或者说回答了这一问题：没有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文革，改革开放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上面的数字和卫星地图还是很难具体形容越南的腐败程度，可以这么说，直到今天，越南的警察、医生、老师和政府所有部门的全部大小官吏，就没有一个不索贿的，而且愈演愈烈。索贿到什么程度呢，一毛钱都要，没有腐败文化，腐败就是文化。如果说朝鲜的专制除了金家三胖可以随便说话，所有人都不敢说真话，那么现实的越南，就是除了领导人说反腐败，同时把反腐变作政治斗争的手段，民众内心都痛恨腐败、实际都参与腐败并绝不公开反对腐败的腐烂国度。这是什么地方，这就是中国那些要撇开毛泽东的导游，领我们去的实际地方。

没有文化大革命，红色政权的经济计划无论怎样完美，顺应民意，不可能改变红色系统朝大野小、官有民无的政治权力分配和文化价值导向。中国民众对腐败的这种公开鲜明态度和官僚不敢明目张胆地索贿氛围，在越南就缺少必要的政治和文化环节给予支撑，这就表明**文化大革命这一君授民权的重大政治步骤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民权环节，是民权的法理授印**。缺少这一关键步骤的越南，在经济发展的过程，红色专制体系的每一个细胞会在系统的每一个环节甚至每一个动作中，没有任何民权阻力，以最快的速度把权力变现为金钱。那么，这样的国家，会象过去礼教的方式那样，公权里全是私欲，从骨子里腐败开来，权力变成了吞噬机体的毒瘤，原始积累和工业资本会被快速啃食干净，私有化之前就空了，最后什么也剩不下来。

我们一直嘲笑民主印度的现状，可是大概不会有人告诉我们，改革开放的越南各方面情况比它更差。而且越南共产党所有努力都会是徒劳的，引入西方民主制度更是加速沉沦，越南最终会彻底掉进国卑民贱的生存状态。政治上看上去是北越统一了越南，文化上，其实是南越统一了越南。结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十六条》，就能理解其中文化意味，这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消息。

红色谱系的这个案例，是对文革和改革关系最好的回应。对所有以为文革以及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拖累中国经济的论调，它是最现实最有力的反击。这一点，很值得研究和回味。反过来说明，华夏族群的文明维新之路何等凶险。它也告诉我们，如果继续否定文革，要么民权运动走向激化，要么越南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前苏联和俄罗斯

随便挑几个前苏联的政治冷笑话，就足以说明，红色的东西，就是一个理正君明臣贤民顺的宗教、礼教和种姓变种，来得还要更冷血残暴。没什么修正主义，所谓的修正主义，就是原始的马列主义最正常不过的发展。不要说马克思主义里没有意识形态革命这种东西，即便马克思主义里

有这种革命的整套方案，对于这些红色权贵来说，一旦意识形态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们会以任何代价扑灭这种革命的发生。



图 2.19 瓦解

作为红色铁幕的最大代表前苏联，在上世纪末解体，一个庞大的帝国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落幕，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同样是改革，中国回到相对稳定状态，前苏联问题出在哪里？实际上，全世界的苏维埃系统都存在致命问题，那就是让人窒息的红色精英铁幕早就违背其初衷，走到人民反面上，而且无法自我纠正。他们口口声声的“人民”正被他们踩在脚下无法呼吸，而反过来，他们也变成薄得一触即溃的纸铁皮，稍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个铁幕不用子弹就自行瓦解。还有所谓的左派继续为他们辩护，有什么可辩护的。这种红色铁幕，除非垮台，否则一万年也只会把一切公有之物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包括他们的人民所呼吸的空气。

而硬币翻过来的另一面就是俄罗斯，它的清廉指数排名为 143，无论普京口头上有怎样的大国抱负，强大的俄罗斯不会到来。因为现在的俄罗斯已经容不下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的强悍国家意志，很直观明显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民主模式已经重度摧毁其庞大的工业系统。俄罗斯从地缘上会慢慢地靠近欧洲，也就是独立自主地生存逐渐成为了一个问题。但俄罗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民族，和欧洲的海洋文化不同，俄罗斯文化中似乎充斥着大陆文明构架中浓郁的游牧气息，这一点似乎又让他们很难融入海权形态的欧洲。我们需要注意的主要有两点：一，西方政治模式，对其陆权观念形态无可挽回的破坏才刚刚开始，普京并不能真正改变俄罗斯的动荡态势，它很可能会继续分裂；二，随着中国的崛起，它未必不会成为围堵中国的巨大棋子。

印度

没有独立战争的雄武立国，没有土地革命的底层动员，没有文化革命瓦解种姓制度唤醒民众，只是表面靠一个所谓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实际却完全是英国、美国和前苏联等列强国际政治斗争的偶然结果，被英国人分裂走多块国土面积后的印度，获得了形式上的国家独立。不要以为采取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能给印度带来什么改变。这个国家，几百年的地缘冲突刺激，都不足以让它有所改变，因此不论它采取任何政治模式，都将继续它那令人窒息的种姓制度，继续溃烂下去。

印度种姓制度，是最顽固最窒息的精英铁幕。但反过来，这个精英铁幕又极其薄弱，婆罗门、刹帝利等高等种姓，仅占印度人口不到十分之一。每当外敌入侵，这种精英阶层对内无法动员低等种姓，因为对低等种姓和贱民来说，不存在情况更糟的问题。精英阶层会不会同仇敌忾，自我组织起来抵抗侵略呢？当然不会，高等种姓怎么可能为了低等种姓和贱民，牺牲自己，否则种姓制度怎么可能存在。所以，外敌侵入，不管这种入侵多么单薄，种姓制度下的精英阶层，唯一的办法就是接纳殖民者加入吸血队伍，继续维持种姓制度。

巫师一直以为印度是人类灵魂最深的低谷。如果有人还不能接受礼教是文化毒瘤，那不妨去印度感受一下贱民子孙后代“世代为奴，世代为娼”的现世十九层地狱。相比而言，有种姓血缘的西藏农奴制都小巫了。印度只有通过外族统治，才有可能得到拯救，当然这种外族统治必须是强力无私的，象毛泽东在西藏推行的民主改革。除非通过长期隔离并强化教育，否则很难改造印度这种社会，因为即使你发动贱民批斗婆罗门，最终的结果也不会是他们灵魂的自由，而是这些贱民们会把发动批斗者解释为一个新的高等种姓。巫师只能祈祷更多的教育、现代文明技术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能给印度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改变。

本节小结

除了这里所提及的国家和地区外，海权的败坏形态一样比比皆是，我们这个铁幕时代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缺陷。从上面这些红色系统和礼教的流变谱系来看，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洗礼，这些地区的文化要么畸形要么有重大缺陷，很多都是亚殖民地性质。其文化系统不足以构筑族群的心防工程，维护族群的安全，有些反而是侵略者用于殖民的奴役武器。这些文化系统下的家园，经济好就是刀俎上的鱼肉，经济差就是现世地狱，绝非什么王道乐土。一旦遭遇外族侵略，精英阶层会立即与外族结盟，继续其铁幕统治，家园就是另一个奴隶场，只有待宰的羔羊，不会有揭竿而起的陈涉吴广。

那么盘踞在中国人心里的传统文化势力会不会特别一点，自动消失呢，我们可以想起毛泽东点化的一句话：“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文革都过去四十多年了，印度的种姓制度亘古不变的架势，和中国铁幕精英的卷土重来，已经告诉我们答案。文革用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文化革命的成功。和这些地区比较，经文革洗礼的中国，从类似种姓印度的礼教社会，迈入一个全新的文化系

统。今天的中国民众，一边对文官系统发出从不妥协永不停止的民权监督要求，一边对其它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入侵在每个领域的每个角落进行毫不留情地顽强阻击，其民权走势也愈见强韧，无可阻挡，显示超越左右的中国民众正在成为华夏维新举世无匹的自在独立的基本力量，说明海权和陆权在中国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有机融合。普通中国人，其精神层面所显露出的现代高贵特质，已非上面所述这些地区的居民所能拥有，成为大国底蕴的有机构成。

§ 2.4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

相关资料显示，文革是毛泽东认为他值得一提的两件事之一，这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海岛上”，这里称之为建国；二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史实包含关于文革至关重要的信息，上文已指出，这一信息在《新民主主义论》甚至《民众大联合》里早有踪影。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是政治基础，文化决定政治形态，是文明形态层次的文化，而他的战友只把文化看成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对文化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文革一开始就超过其他所有人的认知范围，从历史上看，即使在战争的战略层面上，其他人都很难达到毛泽东的认知高度，更何况文革，这一硕大无朋的巨象更是摸石头过河的思维在高度上不可能企及的，所以他们只能看到他们在政治上的无辜，看不到自己在文化上的守旧。

文化是什么？文化，不是几个细人在那摆弄琴棋书画，无病呻吟，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族人都是用刀和火进行文化创作的。文化就是灵魂照影，文化也是族群生存繁衍的魂灵纽带。文化的基本内核应是族群主体的心灵整合，防范一切内外敌人侵害，确保族群存续的心防工程。而看似灿烂的礼教文化在这一基本点上完全是倒行逆施，从身体到心灵，拘禁奴役族人。

文革通过肃清礼教文化，干净彻底地送走了黄河岸的中国，同时，点燃民权，在华夏肌体中注入一剂文化疫苗，对族群在魂灵上提出信仰要求，开启海岸边华夏族群的文明源头，以此，文化大革命成为华夏文明的转承枢纽，我们就身处文明新纪元的首页开篇。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新的地缘变局前，华夏族群礼的复活。

有没有其它方式完成文明的转承，例如苏联模式或者西方选举制度？没有，选择文革，其一是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集权系统，毛泽东是要守住共产党，守住族群之灵，守住信仰；发动文革，发起民众对精英集团和精英文化的全力批判，毛泽东则是要拴住灵，护住体，护住民权，护住族群，预防灵自以为体，进而侵害族群。苏联模式或者西方选举制度，最后结果都只能是灵不附体。延安整风和文革，一个就是信仰整党，一个就是民权整党，以此，华夏族群才得以灵生体显。

文革不同于过往无产阶级专政道路，其原因是，文革通过授权民众对体制内精英的批斗，走进民权范畴，实质打通了通往海洋的民权道路，这条道路所通往的现代海权文明体系，完全超出了无

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也超出了陆地之王毛泽东毕生的经验和概念范围。所以华夏之子毛泽东把一切都归给了左，对毛泽东来说，民权就是左，左中之最，侵害民权就是右，右中之极。但毛泽东极其敏锐的文化直觉和深邃的政治远见，依然让他做出了英明的选择，从公有信仰的要求，一脚生生迈进民权领域。以此，左，毛泽东是至高旗帜，右，毛泽东是开路先锋。华夏的左右，毛泽东都是巨擘大纛，特别是右，毛泽东是当时中国的独步一人，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民权之父。

如果非要把毛泽东对华夏族群的功劳三七开，那么从文明的维新意义上来说，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工业体系建设，两弹一星、三分天下等等等等，都加起来，建国是三，文革是七，因为建国是存，文革是续；建国是路，文革是魂。就文革撬开精英铁幕，为海岸边华夏族群所凿拓的雄健宏阔的文明维新空间，毛泽东的华夏历史地位早已远迈秦皇汉武，比肩炎黄。

文革是什么？文革是刺穿精英铁幕的唯一匕首，达至公有的民权道路起点，华夏文明的维新肇始，未来世界的东方曙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思想，其他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器用。谁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海岸边华夏族群的文明始祖，毛泽东思想就是华夏祖灵，就是礼魂。**



图 2.20 雄哲浑成、君师合一的海岸边华夏始祖

第三章 文革若干问题辨析

§ 3.1 文革中的批斗迫害问题

多数反对和控诉文革的史料证据，巫师以为是真实的，换句话说，针对精英阶层的批斗甚至迫害确实发生。但巫师以为这是精英阶层对华夏族群最有价值的奉献和牺牲，也正是文革的意义所在。



图 3.1 我们不应只看到台上的批斗，却听不到台下魂灵枷锁碎裂的时空巨响

如果说今天的官员大多有贪腐倾向的话，那么，当时的走资派纯洁得有如天使，走资本主义道路恐怕连想都没想过。甚至很多人如果到了今天，可能是另一个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文革的争论焦点正在于此，被批斗迫害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我们的敌人，确实是我们这个族群的精英。这些无辜个体不仅从自我意识上无法认同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且从思想上可以说是完全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如果需要，这些人会把生命献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因此把这样的一群人打成走资派和反革命，于理不合，于情不符，以此，文革的合法性遭到全面质疑。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审视文革，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由，如同唐吉珂德的臆想，这也正是《决议》的结论。

然而，正如礼教中人一样，所有虔诚的卫道士，他们在这些本来应该高度敏感的领域集体无意识，以至成了外敌的帮凶，武训事件就是一例。尽管这些精英分子不是族群的敌人，但其身上所依附的社会关系是，所潜伏的文化毒瘤是。精英阶层的绝对优势地位对族群就是一个毒瘤，而其施加于整个族群主体的礼教，让族人丧失对一切优势包括敌对势力的反抗意识和能力。不通过文革中的批斗，剥离其身上所系缚的价值系统，也就无法颠覆这种社会关系和其上的社会价值观。前者成就文革的骂名，而后者孕育族群的新生。



图 3.2 华夏族群浴火重生的魂灵祭坛



(a) 何其壮哉

(b) 何其壮也

图 3.3 谁能在海岸边生存？

接受批斗就是精英对这个族群最有价值的祭献牺牲，华夏族群在其中魂灵得到洗礼，巨龙以此苏醒。批斗场就是族群的魂灵祭坛。我们不应只看到被批斗者身上的苦痛，看不到民众魂灵苏醒；只看见批斗现场和被批斗的个体，却听不到台下广大主体魂灵枷锁碎裂的时空巨响；我们还不应该偏解误读牺牲的实质精神，亵渎他们牺牲的独特价值，却看不到魂灵回归体魄后华夏昂起的巨大身影。

然而所有那些文革中逝去和被迫害的无辜生灵，无论生者还是亡者，皆为华夏族人，文革遭遇非其人罪孽深重至斯，其牺牲于华夏有不可替代之价值，华夏族群当深切悯恤之。巫师在此祷告：

愿所有祭坛牺牲放下文革伤痛，勿生怨怼；
为所生怨怼，反噬其身，腐蚀族群；
愿其生者魂灵安宁，愿其逝者超生彼岸。

§ 3.2 左翼的文革观点

除了偶尔为前三十年申冤，对后三十年抗议，迟至今日，中国的左翼还是象断了线的风筝，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拿着金饭碗，期待着别人的施舍与拯救。

左翼应该知道的是，前苏联早已沦陷，西方世界缺少信仰，只有他们的社会全面溃烂，信仰才会在其中升腾，所以你期盼的拯救者永远不会到来。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一刻开始，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那个虚无缥缈并被束之高阁的乌托邦，而是演变为实际的民权步骤。人类社会的下一步发展，就是沿着毛泽东指引的信仰方向，坚定不移地筑基民权。

因此，文革之后，中国就是世界的红色策源地延安，毛泽东思想就是全世界亿万贱民的圣经，而左翼原本应是中国安内济外的红色轴心力量，今天却在自我豢养中巴望别人赐以神圣。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无论是华尔街革命还是茉莉花革命，其背景都是铁幕阴影正在笼罩天下生灵。但今天的信息技术，已经可以让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在瞬间传遍全球。苏武毕生的事业，他乡族人的一个帖子就可以传递给整个中国，全球每一个热点，所有人都可以全面透视其结构乃至历史，也就是说，精英铁幕的信息垄断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铁幕的消融就在前方不远。这一切昭示一个全球的信仰共同体必将显现，也告知我们信仰和理想的无限政治空间，而左翼就是树起红旗撑起信仰的中坚力量。那些用心聆听的人应该知道，其中就有信仰之花的绚丽绽放，彪炳千秋的功勋业绩和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今天中国的左翼，则多数还在老旧理论体系里步履蹒跚，所以眼盲气堵、立场混乱，行动盲目，对现实缺乏起码的预见性和指导性，而且也没有多少自主独立性可言，并特别喜欢追随所谓的红色精英，居然想以此改变中国当前的政治导向。

左翼对文革的理解和辩护，大多是南辕北辙。文革中所谓的右派和走资派等，只是文化革新运动在无产阶级学说框架下一种扭曲的表达方式，逆向教化的借口。今天的左翼只知道保留其框架，而对文革精神实质的错误理解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主导思想大相径庭。对于文革中存在的迫害问题，左翼替文革辩护的方式就是回避，甚至从这一角度对文革进行辩护，继续给受害的无辜个体强加恶名。连毛泽东都说“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承认可能冤枉，给出平反的空间，甚至首开平反先河，完全符合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悲悯宗旨。而这些辩护者看似为了证明文革的正确性，实质是为了维护自己所

谓的道德正确地位，绝不肯让文革受害者翻身翻案，非要一棍子打死，甚至直到今天，还要继续罗织材料进行攻击。

他们对大饥荒的百般抵赖和推诿辩解也很奇怪，我只看到满天飞的数字，只看到责任的推卸，没看到一个检讨的。数字中故然有攻击的成份，那么不是一千万，不是五百万，二百万行不行，一百万行不行？多少才是你们良心的底限？直到矿难那样的数字？这个政权的中坚，在自己的权力位置前面，哪怕有丝毫的人性，也不可能有这种大规模的灾难，也不会有随之而来的文革。我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左翼，到底在恐惧什么，到底在维护什么。

左翼另一个荒谬的地方就是对传统红色道路的坚持，这就完全盲视毛泽东在文革中所指的方向，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除了理想看似纯粹以外，一无是处。文革是反右吗，文革实质冲击的正是红色集团的主要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哪个不左？文革从来不是什么反右，而是防止这个集团今天这样的自我集结。文革通过发动民众批斗红色集团，告别修正主义红色，实际也从法理层面否定所谓的红色道路。这种红色道路，实质就是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治国或者说精英治国或者说道德治国的老路。中国的左翼，完全看不到文革和红色道路的巨大鸿沟，还在幻想着回到那个按马列教条狭隘地理解的公有制道路上，不明白正是文革阻断了回归红色中国的道路。

所有政治势力都视自己为政治精英，无论他们如何真诚地担当道义，为民请命，他们也无无论如何，还是继续前文所批驳过的礼教精英路线，无论左中右，哪怕是那些持拥护文革立场的所谓极左翼。他们所谓的无产阶级路线，绝不是真的让人民自己走路，而是想通过精英路线，把人民领回他们自以为正确的道路上。社会主义道路上出现的一切问题，他们从未反省过自身的缺陷，一切都是别人和自由主义的错。他们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彻底反对选举，反对人民自己用选票表达意愿，可是又走不出理论困境，找不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只好用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导出的所谓错误路线灾难，规劝精英走上他们以为正确的路线。在这里他们就已经产生了两个错误，一是一厢情愿，精英靠不住，精英绝无可能上他们的道；二是过于自以为是，真理其实也靠不住，跟纸糊的一样，太脆弱了，否则他们何以解释社会主义庞大阵营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何以解释三个代表领导中国。所以说，和过去一样，他们还是那么不着调不靠谱。他们自以为是毛泽东的传承，他们却从未走在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上。

他们不明白的是，单靠所谓的精英，哪怕是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会象刚刚发生的那样，把一切断送掉，甚至会象红色高棉那样，把人民都断送掉。他们不明白，文革早已超出前人的理论框架，一切都要推倒重来。

文革是教人民思想革命，引导人民自由独立地思想。文革本身不是目的，人民自由独立地思想，懂得自我捍卫才是文革的目的地。文革之后，人民已经成为一个个独立的自由个体，人民这个概念，其实已经被文革消灭了。所以，时代正在变迁，左翼和所有代表狂，文革之后，就不要以人民的名义，代表人民了。

写到这里，巫师想说说那些左派中一些人看到这段文字的反应。那些左派看见这段文字时，第一反应不是以为他会错，而是立即要找一些理由和文字进行驳斥，因为他以为他是真理的一方，上面的批评肯定有问题，肯定能找出无可辩驳的理由来把这些批评驳倒，所以他会花大量的精力去寻找理由反驳甚至批判这些批评，而不会去自我反省，想想自己是不是确实有什么地方，存在自己没有觉察到的严重问题。左派在攻击走资派精英不走人民路线时，他完全看不到自己全身上下无处不在的精英影子。他们听不懂毛泽东说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的意思，这意思是他们上台也会蜕变成他们所批斗的精英，也同样需要接受这样的批斗。这就是左派的缺陷，缺少反省意识，信仰坚定但不究竟，所以有些只能从反省甚至忏悔中才能得到的知识，才能感悟的境界，他们无从领略体会，以致这些年来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我想他们从来没有这样问过问题，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如果大饥荒确实存在，确实造成大量人口损失，该如何面对？如果斯大林确实执行过血腥的大清洗，并且挖走外蒙，还要分裂中国，该如何面对，划分界限？如果红色高棉确实大规模灭绝自己的人民，并且确实以为自己朝着共产主义信仰忠诚地行走社会主义道路，该如何面对，再次划分界限？如果文革中确实大量存在对无辜者的迫害，该如何面对，无辜者不无辜或者都是坏分子的错？如果朝鲜确实是一个对自己的人民冷酷暴虐的政权，该如何面对？如果别人对你的攻击中，十成中有一成是铁的事实，你是不是继续敷衍地认错，让这一成一带而过，接着就用全部的力量反击那九成脏水？我知道你此刻气堵胸口，战斗意志直达大脑，已经料定巫师是混进左翼阵营的极右分子，正着手驳倒这些问题，但是，别急，如果，巫师说的是如果，过去、现在或者将来发生了这些如果，你确实准备面对吗？

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负重甚至身上沾满粪汁前行，精英不愿意，所以愿意花任何代价否定文革，因为文革有一丝正确，他们身上就多一分臭气。左派也不愿意，所以即便辗转沟壑也要维护自己伟光正的形象，而不肯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背后，共产主义红色体系存在难以弥补的重大缺陷这一残酷事实，不肯承认自己还带有礼教社会旧时代的深重残余习气这一基本认知。可真正的弘毅之路，正是反躬自省，正是面对自己的错误乃至罪孽，粪衣负重前行。

§ 3.3 四人帮的性质

所谓四人帮，如同古代代表皇权的历代宦官集团、武则天的告密机构和皇权下的钦差大臣等，实际都是文官集团坐大异化，君主不得不衍生出来贯彻君权的御用工具。四人帮正是毛泽东贯彻其文革目的的政治手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衣钵，否则毛泽东的接班人选不会看起来那么温和，文官集团在当时也不会有翻身的可能。

作为文官集团的天敌，君权工具的政治基础就是“君”，君一旦更替，这种君权工具必将落败收场。有史以来宦官集团的下场和四人帮的结局，都表明君权不足以制衡文官集团的抱团膨胀。但这

并不意味着这一工具没有意义，这一质量往往不高的工具还就是君主制约文官集团不可或缺的手段。如明末崇祯剿灭魏忠贤集团后，没过多久就清醒过来，又再次启用宦官制衡“人人可杀”的东林文官集团，然而为时已晚，不然李自成从京官家中抄来的 7000 万银两还揣在节义忠臣的腰包里。

和历史上的君权工具一样，毛泽东尸骨未寒，一个月不到四人帮就被新君清剿。但是，我们应该清楚，江青，张春桥贯彻执行的，正是毛泽东的文革思路。毛泽东就是通过启用这一看似极左的君权手段，倒灌族群心能，冲击精英铁幕。如果没有发动群众深度参与文革的内容，文革就只是没有任何新意的君臣政治斗争。但文革正是在这一点上，超出了历史范畴。也因为这一点，巫师断定，江青和张春桥必将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教师节那个恶毒日期必将更改。

§ 3.4 文官集团的文革立场

彻底否定文革，是文官集团的本能反应。文官集团不可能从文化层面思考这一问题，即使理解文革的要求，也断不会以这种牺牲来换取族群的新生，正因为如此，处少数位置的精英主体被批斗，是“子教三娘”这种逆向教化需要付出的代价。在这一点上，不理解传统文化以及文官准文官阶层的癌变对这个族群的致命性，以及千年堡垒的坚固程度，就不可能理解文革以及文革的必要性。

从历史上文人集团发展出礼教来看，他们不仅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甚至连民族主义道路最终也走不下去。私有化以来，中国优势阶层对财富的掠夺，对族群主体的态度，侵害民权的凶残程度，只表明一个事实：他们又在朝族群的毒瘤快速蜕变，最终会连民族主义也坚持不下去。正如礼教精英一边说精忠报国，一边肆无忌惮地侵害族群主体，领着族群沦亡，民族主义道路怎么可能走下去。没有人否定文官系统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这一系统失能或者膨胀才极为可怕。文官集团的独裁如果不能打破，其一，这个集团会继续腐败；其二，民权会继续被侵害，民权运动会继续激化；其三，前两者造成的内部动荡局面，让中国难以承受地缘政治压力，文明革新道路就可能遭遇挫败，华夏族群会再次陷入危亡境地。

文官集团否定文革的一项主要依据就是改革开放。文革对红色理论体系的彻底破坏以及红色集团的深度冲击，给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自由的政治环境，前文已经交代过。更重要的，前三十年还奠定了改革之基，甚至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国家工业体系的雄厚资本，改革就没有对象，改革开放就是成形的工业资本的自然更新过程；没有毛泽东奠定的国际地缘政治基础和完整的国家独立性，开放就没有政治基础，工业资本的自然更新就无法从政治上得到保证，改革开放的结局就是日本，开放就是卖国。没有这两点，改革开放就是洋务运动，国门一开，就是亚殖民地，想再关是关不上了。

而文官集团主导的《决议》，一面否定文革，一面把毛泽东思想解释为集体智慧的结晶，纯属顾头不顾腩的蹩脚实用主义。难道集体智慧的结果，就是最后拿锤子照自己脑壳一顿闷敲，十年后又觉得敲错了？这智慧真不是盖的，嗯，还是集体的。

否定文革，其实同时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法理地位，导致文官集团执政空间走薄，以致出现今天愈发孤悬的境地。同时，文官集团否定文革立场的理论依据和实际依据，也在走向反面，所以只能从经济、人权等层面否定文革，甚至这方面都有点力不从心了。近年来，文官集团的理论水平一直在不断下降，中国特色渐渐只剩下裸露出来的权力宣言。如果说否定文革，是对文化随地缘变迁的认识不够，那么抬出孔子，就是对近代革命史的极度无知了。

目前，逾礼的文官集团通过离间左右，通吃左右的全部政治经济资源，以致急速膨胀，所有针对他们的民权监督要求，他们要么说成是左，要么说成是右。不过硬币的另一面则是高风险——被醒过神来的左右从两翼包抄合围，了断后路。只要僭越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成为真正的民权机构，文官集团就会一点点丧失信仰上的支撑，又要面对民权要求越来越近的压迫，而内外敌对势力贴身近逼，伺机而动，只能渐渐走进步步惊心的境地。基于公权力野蛮的原始特性，所有集权系统的权力集中区，也毫无例外，都是从未改变的地狱斗兽场。

§ 3.5 没有毛派的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把支持建国后毛泽东，特别是拥护文革的一群人称为毛派，巫师显然是其中一员。巫师要说的是，以后不会有毛派的问题。毛泽东身上的领袖心能，已经通过文革倒灌到华夏族群体内。君授民权的文化大革命，将使中国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区别于世界所有其它国家。今后中国所有政治力量，都必然源于毛泽东，以毛泽东思想为宗，所有派别都是毛派，这一点在今后的民权运动中将更清晰地显现出来。文革将是中国一切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法源之地，甚至，是全球贱民的巴黎公社，世界文明秩序的重组起点。任何否定毛泽东，特别是否定文革的政治流派，在中国大地上都不可能存活。

§ 3.6 文革是不是成本过高，会不会再来

文革的成本是不是过高，这要和其它所有道路上所付出的官僚生命成本、社会成本、国家安全成本、民众奴役程度等诸多成本进行比较。

遇到朱元璋这种剥皮实草的主儿，朝不保夕的官僚，恐怕觉得批斗就是有人请客吃饭，文革就是天堂旅店，“要文斗，不要武斗”，那完全是君恩浩荡的御赐铁券。

前苏联为红色铁幕所支付的国家成本远大于文革，这个成本恐怕是那些文革中遭受批斗的人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希望中国承受的。朝鲜付出的则是民众成本，他们不得不在窒息的空气里饥饿生存。印度还在为其腐臭的种姓文化继续支付不可估量的代价，流血不止，无法自拔。更糟糕的是，透支的卡奴，谁都不知道哪里才是尽头。

有没有更温和的文化革命模式，有，即西方理念的不断融入，最终导致中国社会观念发生质的转变。但这条看似温和的道路上的风险，成本和周期都远大于文革，这就是文明革命的自发过程，其成本华夏族群根本无法承受。而今天中国飞快地走上精英独裁的死胡同，又让人们看见那种自发性回潮而来，坐实了毛泽东晚年迫切发动文革的必要性。

文革还会再来吗？从精英的层面，或许还需要一场文革帮助他们回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但从人民群众或者族群的层面，同样模式的文革不需要了。今天，经过文革洗礼的族人足以完成族群的此项政治任务，也就是说，虽然彻底清除礼教遗毒，销熔精英铁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文化层面的任务经过文革已经达到阶段性目标，接下来的可以通过民权运动在社会和政治层面逐步解决。民权运动也许持续时间非常长，将是深入社会每个角落的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继续，就是新环境下的文化大革命。

§ 3.7 精英的皈依

该谈谈精英了。对华夏族群来说，精英到底是什么呢。精英不是扎向族群体内的毒刺，不是族群里的吸血僵尸，不是鱼肉族人的刀俎。对华夏族群来说，精英是公有信仰的主导和执行者，是礼法规范所作用的对象群体。中国革命史，就是精英为华夏族群的生存祭献生命的历史。正是精英受到华夏族群生存信仰的召唤，前仆后继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赢得族群的生存。精英是族群繁衍绽放的绚丽花朵，是护佑族群的坚强守卫，是凿空新域的英杰勇士，是族群的自觉牺牲。族群的需要在哪里，族群的精英就出现在哪里，族群的笔尖就应该指向哪里，为族群提供思想、舆论和法理上的支持。

精英不怕牺牲，所以有苏武牧羊，张睢阳齿等无数忠烈故事，精英临死不屈，所以宁可慷慨就义，也怕被这个族群误解含冤受屈。精英无论怎样牺牲，总希望得到族群的价值承认，都要向族群索取这方面的精神价值，当这样的精神价值积累得太多时，结果却造成精英铁幕和族群精神能量的贫瘠。文革却让精英付出另一种的牺牲，让精英把千年来，向族群索取的所有精神价值，全部返还给族群。信仰者不可以从信仰中索取任何价值，那是败坏信仰的自利行为。对文革心生怨怼者，信仰不纯粹。只有返还信仰所有的价值，华夏族群的公有信仰才得以坚而全，才得以究竟圆满。在海岸边，没有究竟圆满的信仰，华夏族群就会有流之不尽的鲜血。

礼是什么？礼何以重要？巫师在此洞开通往远古的大门，恭迎聆听祖宗召唤的精英，走向族群祭坛的魂灵。华夏族群的公有信仰，衔接个人短暂的生命和族群的繁衍生存，是群己的纽带。而礼是贯彻公有信仰的观念体系及组织构架，礼就是华夏族群的信仰祭坛，精英就是族群信仰祭坛上的自觉牺牲。无论一腔热血还是皓首穷经，精英都应无畏无私、始终如一地接受礼的洗礼。公有信仰通过礼将精英身上全部的血液和生命能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夏体内，滋养着这个族群，哺育族群更多的璀璨之花，华夏族群才能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海岸边的华夏族群，尊毛泽东为祖，以毛泽东思想为宗，那些异鬼他灵的羔羊，是时候迷途知返，认祖归宗了。

§ 3.8 本文中的华夏史观

本文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与当下紧密关切的很多重大命题。理解本文的观点、立场和思路，需要重新认识五四以来，我们在文化领域，特别是华夏史观上的探索。一直以来，我们不具体分析华夏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巨大差异，直接拿前苏联的唯物史观套在中国历史头上，对华夏历史和文明的认识出现重大偏差。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不仅让我们对古代中国和近代史的认识，如同一团乱麻，很多问题不得不依靠具体局部的分析，来强加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认识偏差也是很多现实问题的根源。

本文所依据的华夏史观，在《古代中国——光辉的公有制历程》中有一定的阐述，但不全面，限于篇幅，这里主要列出这一史观中关于华夏文明的一些重要观点。从这一史观角度，分析和看待中国社会发展史，很多重大问题如同庖丁解牛，迎刃而解，甚至有些以前无法解释的问题现在不解自明，从而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史，可以得到全面系统的解释和直观认知。

1. 古代中国社会模式是家族公有制社会形态

华夏文明，从一开始就不是私有制形态，而是一种家族模式的公有制形态文明。所以这样发展，和华夏文明所处的地缘条件息息相关。华夏文明这种强烈的地缘特性，也暗示唯物史观需要重大补充和改造。

2. 华夏文明起源于东亚农牧地缘冲突

华夏文明并非起源于治水，外来说更是荒谬，华夏文明的起源和黄河流域的农牧二元地缘结构直接相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大的区别，在于黄河是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文明区域的地缘分界线。华夏文明也就起源于东亚的农牧地缘冲突性结构，是一种农牧两栖地缘文明。

3. 礼是家族公有制的组织模式和观念形态

描述公有制形态最早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华夏的礼文化。礼就是社会公有制形态的所有权理论和组织模式，因此真正要探索公有制形态，古代中国的研究价值要远大于前苏联等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系统。

4. 中国近代史是华夏族群的文明地缘迁徙史

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族群精英领导华夏族群从黄河岸边迁徙到海岸边的革命史。近代史与其它改朝换代都不同的原因，在于华夏族群所面临的文明地缘结构发生根本巨变。

5. 华夏文明维新的主要任务是适应新的海陆地缘结构

华夏族群的文明维新，或者说改革开放的落脚点，在于适应新的海陆两栖文明地缘结构。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的重大分歧，表明我们离真正适应这一地缘结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6. 文化大革命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维新环节

这是本文已经论述的结果。

7. 毛泽东是海岸边华夏族群的文明始祖

这是华夏史观的自然结论。

第四章 观念变革中的未来世界

§ 4.1 观念变革中的未来世界

本节讨论一个与本文看似不太相关的话题，就是观念变革对未来的影响。这一话题看似与本文其它内容关系不大，但对理解本文介绍的文革和文革所要张开的观念世界必不可少，同时，本节也是对文革是“未来世界的东方曙光”的一次呼应。

近现代文明的源头来自从意大利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这一点大多数人没有异议。欧洲的文艺复兴与通过《马可波罗游记》以及其它途径传播到欧洲的华夏文明有着极深的渊源，这一点中国知道的人不多。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兴起并非偶然，马可波罗就是意大利人，就是在意大利完成了他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是除了马粪以外，蒙古帝国送给欧洲的一项极重大贡献。这一游记中的人间天堂和异教徒，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思想观念上松动了天国的基本构架，在当时的欧洲，不异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且这个人间天国又那么触手可及，挠到欧洲人的痒处，从而启动了欧洲的观念变革。在那之后，观念变革就一直在欧洲酝酿，人类的欲望就一直在上帝围城中寻找自己的突破口，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来临。

所谓的文艺复兴就是人欲为了让人间天堂能够挤占天国上的一席之地，为这一观念变革创造自己的法源，并让整个欧洲雇佣起所有的文化、技术甚至信仰等全部社会力量，为此动员组织集结。我们比较文艺复兴以后的活力欧洲，和丧失目标后走向没落的西方世界，就知道人间天堂这第一因，对欧洲社会的推动作用是多么重要。而以文艺复兴为源头，所带来的观念变革，产生的科学技术革命、民主政治和海权文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要存在方式，或者说，我们今天的存在方式，多多少少，早在文艺复兴时代，已经基本规定下来。

4.1.1 科技领域的观念变革及所张开世界的历史演变

从这里我们看到，世界的演化以及今天世界的存在方式，都和最初观念变革有关，甚至由其决定。以至于当这种观念变革一旦发生，我们可以因此洞见历史可能演化的轨迹和未来世界的轮廓。这一点在科技领域表现得最为典型。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科技领域中的观念变革，及其历史逻辑中所张开的未来世界，以理解文革所启动观念变革的前因及后果。

说到科技领域的观念变革，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和建立相对论理论的爱因斯坦，巫师则以为，伽利略才是引发自然科学观念革命的第一人、现代自然科学的鼻祖。在牛顿给出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之前，伽利略已经通过理想实验，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力是运动之



图 4.1 海权时代前的草原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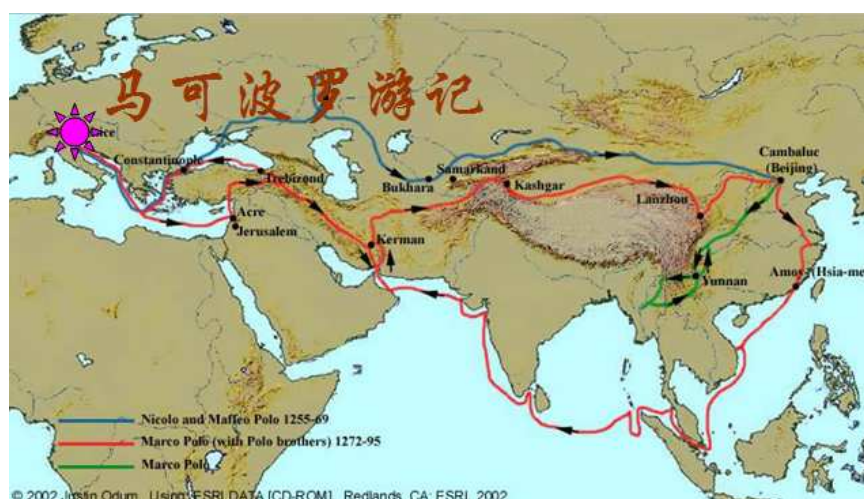


图 4.2 点燃文艺复兴的星星之火，马粪中绽放的文明之花

因”这一观念，指明“力是运动变化之因”，即非正式地给出了牛顿第一定律，并给出加速度概念和重力加速现象，由此引发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而作为这一观念变革中的内在逻辑结果，上个世纪初的量子论和相对论，又掀起一场新的观念变革，引发一场新的现代科技革命，这一科技革命已经产出的成果包括核能，汽车，计算机，信息网络，手机和现代医疗手段等等。

力是运动变化之因，没有力，物体的运动就保持不变，这就是牛顿第一定律，由此也就立即产生力和运动变化的量化关系，这就是牛顿第二定律。这时，苹果从树下掉下来，而不是飘浮在空中保持静止或作匀速直线运动飞走，以及行星围绕太阳作椭圆运动，而不是沿着直线跑掉，在这一新的观念之下，才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没有“力是运动变化之因”这一原理，我们就绝不可能把运动的变化和力联系到一起，无论有多少苹果，无论有怎样的智慧，牛顿都不可能发现万有引力，陨石砸到脑袋上也是白搭。

之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只是这一观念变革中内在逻辑动力推动的社会性自然过程，包括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发现。量子论和相对论再次启动的观念变革，扬弃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伽利略启动的观念变革中内在的逻辑伏笔。直到现在还有少数乡巴佬在无知可笑地想推翻狭义相对论，以为狭义相对论只是建立在光速不变基础上，仅仅得到迈克尔逊等少数实验验证的假说。他们不知道狭义相对论每时每刻都在被各种高能粒子加速装置所验证。这些装置中粒子的速度都接近光速，狭义相对论哪怕存在极小的修正，这些装置立刻无法运转。

量子论和相对论是伽利略启动的观念变革中，产生的经典理论不能解释其中形成的实验技术手段所发掘的现象，两者之间的矛盾产物。光速不变是麦克斯韦电磁方程组中的自然结论，这一点恰恰和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发生冲突，这一冲突中产生相对论。而量子论是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元素周期表，原子光谱的分立谱系等现象不断出现，经典理论无法解释的困境中产生。物质波地发现，由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德布罗意和薛定谔等人开创，时间跨度并不短，但这一切并没有终结，2012年物理学诺贝尔奖就与之有关。我们对物质波的认识，尽管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世界，但看起来才刚刚开了个头。

相对论和量子论对物质世界认识上观念的再次突破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革新，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大量应用。如我们正在观看此文的电脑或者手机屏幕上，仔细看，里面细细的点阵上每个闪亮的微小格点，就集成运用了大量的量子技术。这些革新的观念以及带来的技术突破改变着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已经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很小的村落。并且伽利略所启动的观念变革，其中蕴藏的未来世界，我们这个时代只能算刚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再过五百年，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从伽利略推动科技领域的观念变革起，新世界展开的轴承转动得越来越快，目前还看不到它会有停止的那一天。

当我们可以使用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强大，自然就不断被改造成我们希望的样子，我们就越来越生活在我们自己观念下的物质世界里。

4.1.2 海权的兴起及其观念世界的物现

文艺复兴引发的观念变革至为深远广阔，除了上面阐述伽利略开启的科技领域观念变革，世界文明地缘结构的改变，特别是海权的兴起，也涵盖其中。其中，还要再次强调东方文明的刺激作用。在刺激文艺复兴运动和从欧洲引发海权兴起中，华夏文明的号召力极为明显，是刺激海权发展的第一诱因和推动力。从时间顺序上，我们还能看出海权的突破对科技革新的深厚影响。

在这场观念变革中，上帝的世界从此被他欲望勃起的子民所怀疑，观念变革展现超越上帝的强大力量，1298年马可波罗递出了他颠覆天国的《马可波罗游记》，观念变革便在上帝之城开始酝酿，之后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新大陆，而哥白尼在20年之后提出日心说，发表时间要再晚30年，伽利略的科技观念变革，则在发现新大陆100年之后的1592年前后，从此，科技革命全面解构曾经的天国。最后，可以环球旅行的达尔文1858年给出进化论，完成了颠覆上帝之城的最后一击。观念革命的过程相当漫长，但有条不紊，所有步骤终会兑现。

而海权兴起的观念变革，带来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化。世界从此依照海权的方式进行重组，给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进步，并第一次把这个世界真正联系在一起。并且，海权还给世界带来民权观念，这一点，怎么强调其意义和价值都不过分。但同时，海权并不是象我们今天以为的那样斯文，恰恰相反，它以一种高度极权的史上最野蛮形态出现在世界的中心舞台，给地球带来的问题和罪恶和它引发的进步一样多。即便对他们自己的人民，也一样地冷酷无情，可以说，海权观念下的欧洲列强比成吉思汗大军更甚，待业海盗上岗之后的疯狂，有史以来最为残暴。

海权的暴虐终于激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海权膨胀导致其内部的一次反动，这次反动的动力最后嫁接到陆权的发展上，带来陆权的整合，并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海权和陆权板块之内和之间的剧烈冲突及其内部的深度摩擦。海权的兴起，还带来了从发现新大陆以来的所有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

海权世界中的资本确实带来技术的进步，但伴随这种进步的，却是人文上的极度野蛮。自由主义籍以攻击今天中国和左翼的多数人文成果，如选举权、民主政治、工会和福利等这些政治和经济权利，并非来自资本世界的博爱和仁慈，恰恰是其攻击对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政治斗争中，迫使资本铁幕作出的妥协与让步，确确实实是海权发展方向的一种反动成果。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就错认了祖宗。

4.1.3 文化大革命的地缘历史背景及其张开的观念世界

文化大革命涉及中外历史和地缘多个维度，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时空交汇点，封资修等一切精英铁幕的突破口。

文革在世界历史视野下的观念沿革传承

单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理解文革还是不够的，这不能揭示其中的文明意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也是在观念变革中催生的。文化大革命，其最深的渊源正是上文提到的《马可波罗游记》启动的欧洲观念变革，并以欧洲为发动机，进一步重塑了整个世界，而文化大革命也是其中的观念变革历史逻辑的一个里程碑。《游记》中产生了海权世界，而文化大革命将带来海权和陆权观念的融合，在这一点上，文革所掀起的新一轮观念变革，与《马可波罗游记》基本相同。科技领域可与之比较的，则是牛顿第一定律的发现以及物质波动性的提出。

而就文革动员了整个华夏族群，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了社会政治上的重大步骤，就这一点对世界文明的政治影响，文化大革命以及已经开始的民权运动，类似于文艺复兴的启蒙时期。这不是简单的类比，而是观念变革的相同演化逻辑。文革的发生在鸦片战争百年之后，文艺复兴则在《马可波罗游记》二百年之后开始，这种较长时间的跨度中，观念变革一直在酝酿之中，中国百年革命史，就是观念变革的政治呈现，从《马可波罗游记》到文艺复兴，上帝之城也同样不平静。

而文革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无需赘言，如文革开始时，毛泽东就把聂元梓的大字报称为“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与1871年的巴黎公社遥相呼应。再结合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可以认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否定修正主义道路的一次政治实践，也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法脉传承。并且，在巫师的观念感知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原始基督教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期乌托邦的公有信仰诉求的新变异形态，是海权时代的罗马帝国中，贱民公有信仰的再次复活。

中国的文明地缘结构变迁和华夏史观下的文革

这一层面的文革，在本文前面部分已经基本阐述过了。火器的出现，让当初扮演陆地上的海权势力的游牧骑兵优势完全消失，陆地由此不再分裂为游牧和农耕两种地缘板块，而是整合成统一的陆权形态，但同时，世界又迎来了海权观念主导的海权时代。前一个地缘敌人没有完全消失，新的地缘敌人又接踵而至，在这样一种文明地缘格局发生深刻改变的背景下，从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的近代史，正是救亡图存的族群迁徙史，一次惨烈宏伟的文明维新历程。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向家族公有制模式彻底告别，并由文革，华夏文明转入下一文明模式。在新的文明形态中，家族公有制形态中的礼，一方面，因华夏文明要适应新地缘环境，礼必然会得到重大调整和改造；另一方面，在遭遇海盗和牛仔之前，我们和草原马匪已经较量很久了，所以在农牧地缘冲突下诞生的礼，尽管陆权观念色彩浓郁，也没少吸收了马匪的草原海权基因，因此有着超越其所处冲突地缘结构的文明形态优势。这种超越地缘结构的文明内核，对于海岸边的中国来说，不仅让我们更容易摆脱固化的大陆观念，也必然会在新地缘形势下被继承和发扬。文化大革命，扫荡礼教文化的同时，在这两方面同时迈出了重大而坚实的文明步骤。

海权余晖——文革后的融合时代

新观念引发的社会变革会一直向前迈进，直到更新观念产生。海权观念的扩张，曾经如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但一切事物都如同经典力学，终究要走到尽头。海权观念持续扩展到今天，甚至按图索骥地塑造大陆板块的国家，让各个大陆板块化为零散的碎片，但该来的还是会来，海权时代的终结正在上演，海权和陆权两种观念体系的融合终究要发生。这一点，上世纪初物质波粒二象性的发现，最能说明问题。类似物质波粒二象性的观念融合与变革，即世界观念体系的融合变革，在我们这个碎为瓦砾的世界中也必将发生，并由无序的瓦砾之地朝有序的民权纪元进行相变。



图 4.3 文化大革命的文明地缘格局背景

融合并非在海权和陆权各自的中心区发生，而是在海权和陆权的边缘区和剧烈冲突地带孕育，这就是在东亚半岛上的文化大革命。苏维埃联邦及其跟帮就是由共产主义理论组织起来的大陆宗派，与之对撞的，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小弟则是由民主政治模式拼凑出来的海洋帮会。观念的融合自然要接受了两种地缘权力的共同挤压，也只有在这种挤压下，观念变革的相变才会发生。当然挤压不一定会出现新文明形态，如图4.3，欧洲在这种挤压下，尽管有过挣扎，但终究还是碎掉，变成分裂瓦解的板块¹。

旧的观念体系，在冷战时期，物现为中国内部的官僚集团、美国和前苏联。文化大革命、朝鲜战争和珍宝岛战争，就是毛泽东逐个告别“封资修”，所进行的文攻武卫。朝鲜战争就是抗衡海权的挤压，随后在抗美援朝战争印证其成功。1969年3月珍宝岛之战就是告别陆权体系，之后，1969年9月柯西金过境北京议和，1972年2月尼克松将手伸过大洋，就是世界对这一新地缘势力

¹本图中，美洲在左边，未能显示海权对中国的挤压态势。

的共同承认。美苏的霸权是在二战中赢得，而中国的崛起则是在冷战中用子弹和他们角力达成，其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其间迸发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从文化层面，要肃清所有这些观念文化系统中的败坏组分，同时是在两种观念体系融合中诞生的新文明观念肇始，未来世界的东方曙光。《马可波罗游记》中诞生的观念变革，从文革这里，回到自己的故乡。

文革启动海洋观念体系和大陆观念体系在文明层面的有机融合，张开了新的观念世界。这一融合，体现在集权体系和民权体系的互补对治，形成民权制约下的集权政治系统。这一系统在制度上的落实，巫师给出的方案就是“罢免权下放”的民权集中制。新文明的发展，可以参考文艺复兴的演化进程，文革在观念上的冲击如同《马可波罗游记》，我们可以从文艺复兴之后的世界演变，预估文化大革命后的未来世界。

在政治上落实新纪元的政治观念之前，民权运动就是文革的继续，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民权运动会继续摧毁旧文化观念，消解旧势力，并进一步通过自己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创新，培育新文化力量，迎接民权纪元的到来。中国也会在这种质变性的剧烈震荡中阔步前行。

4.1.4 观念变革中的保守阻力

正确认识文革的意义无比艰难。实际上，这并非文革所独享的优厚待遇，所有观念变革享受的待遇都是一个德行。观念的变革，会触动当前的思想、政治和经济利益等诸多结构，引发社会的深度调整重组，因而不可避免地，激起人类自我保护本能——表显为既得利益者和保守势力的自然抵制。这不仅体现在文革这一主题上，实际上，罗马教廷烧烤布鲁诺、审判和软禁点亮地球的伽利略，达尔文被无数的上帝五毛咒骂，甚至，直到上世纪末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都没有被授予炸药奖，我们就能看到在科技领域的观念变革尚且如此艰难，更不用说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观念变革引发的流血冲突以及战争了。

社会观念的变革，比科技领域的观念变革，直接影响面要大得多，带来的剧烈社会振荡要远大于科技领域。因为这种变革直接触动当前的政治利益结构，并就在当下调动起政治力量进行争斗，特别是保守势力和革新势力或者说左右的搏杀，所以社会变革往往是沾血的。但是，保守势力并不存在道德劣势，单纯从革新者的胜利立场批判保守势力，没有多少积极意义。革新者会很快蜕变成新的保守势力而抗拒新的变革发生，之前的辩护反而成为阻碍下一轮革新的神圣借口。

但这一切，又确实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本能和革新精神的必要较量。只有通过这种必要的甚至流血的政治步骤进行较量并取得胜利，革新后的观念才得以通过验证，被人类真正接受，并纳入保守序列中。未来的革新则只有再次与这一次革新成果的较量中胜出，革新才会持续进行。也就是说，社会观念的变革，终究要通过实际的政治步骤在社会层面落实政治上的资格认证，才能确认其真正发生。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革新势力和保守势力在政治上往往也被分成左右。但左右的力量并非来自



图 4.4 伽利略的审判，到底谁 TM 审判谁？

传承，而是来自我们的内心对局势的反应。换句话说，这些力量并不能通过暴力手段来消灭，那只会让内心的这种力量以一种更加不可琢磨的变异形态出现在社会中。只有革新势力和保守势力接受对方的存在，以和平且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对话性观念变革，才是人类避免暴力革命的根本途径。这种革新和保守的和平对话机制，只有在罢免权下放为基础的民权集中制下，才可能根本实现。

4.1.5 继续壮大并深化的民权运动

政治势力会继续扩张它的地盘，直到遭遇其他政治势力可以匹敌的阻力。因此，在遭遇无法克服的民权力量之前，中国的权贵资本没有任何理由束缚自己的手脚，贪腐的局面很难真正改观。道德化的说教和劝告——一种政治犬儒形态，只是这一道路上的民权麻醉剂，它除了让我们继续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和空穴来风的幻想，不再有任何作用。寄希望于今天或者明天的精英或者明君，不过是过往的大陆思维在我们内心继续流毒。

巫师所见，中国的民权思潮正在集结，社会价值观念正在从最底层面，缓慢却是不可逆地发生翻转。民权运动在今天还略显懵懂，但神力天成。刚刚发生的国内保钓运动，则携带文革中孕育的东土华夏价值观念，是民权运动从混沌走向苏醒时一次极小规模场外演习。然而这次极小的民权预演，在对地缘政治结构的直接影响中，显露的潜在伟力震慑着整个世界。我们预计日本在这次

保钓运动的打击下，不太长的时间里会走向衰败，日美联盟剩不下太多的地缘政治意义。保钓事件至少显示如下重要信息：1，左翼和民权基础结合略现端倪；2，屁民的狂欢，完全可以重度打击一个国家的国力，可以影响世界地缘政治结构；3，精耕细作的茉莉花革命彻底破产。从中我们已经能听到华夏文明大潮下民权运动的滚滚涛声了。

但有一点需要在这里申明，民权运动尽管在贪腐势力的刺激中发展壮大，但绝非公有信仰的敌人，也不是信仰系统的异己力量，恰恰相反，民权正是公有信仰的起点和归宿。民权运动在中国得以出现，是信仰系统带领华夏族群奋力拼搏中结出的优秀成果，是对中国共产党统领中国，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族群给予的最高馈赠。

民权运动在今天这样一种阶段，还没有成形的文化和政治力量，来与文官集团中的贪腐势力及其旧观念形态进行较量，但广泛的民意集结和随时可能聚焦到他们身上的千万眼睛，已经让其中的贪腐势力内心忌惮三分，恶劣行径收敛很多。当前的左右因自己各自的缺陷，谁也不可能真正带走中国。因此，接下来的走势，大致是，文官集团的领导层则会感受到民权思潮的压力，在民权意见的焦点热点领域，采取一定的对治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部贪腐的恶化，缓和民众的对立情绪，以免民权运动朝新的形态激化，但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文官集团整体可能会继续保持并深化贪腐态势，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资本铁幕和权力精英极有可能在不直接触犯民众利益的情况下，巩固和强化业已存在的同盟关系——隐形铁幕。

观念变革的力量，终究是任何世俗的政治力量无法阻挡的。只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成为真正的民权机构，这一切都不会真正改变。民权运动终究要发展壮大，从混沌中长出自己的大脑、躯干和手脚等，学会使用自身的力量，并以极为波澜壮阔的态势，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展开，打扫一切铁幕，迎接民权纪元的到来。

§ 4.2 民权纪元部分简介

作为《地缘变局下的文化大革命》的上半部分——黄河入海流，到此已经接近尾声，由于精力有限，同时下半部分很多方面都尚准备不足，只能延后进行。接下来就民权纪元部分给予简要介绍，并另开一节，集中介绍民权纪元的制度基础——以罢免权下放为基础的民权集中制。

此文的目的，本来只是要从文明变革层面重新认知华夏族群地缘迁徙背景下的文化大革命。民权纪元部分，并没有打算放进来，随着写作的进行，文革与封资修等旧文明系统之间的联系，本文前面部分已经做了梳理，但文革在文明层面上的观念突破，其出路口民权纪元如果没有交待，本文就缺少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落脚点，所以这一内容作为《地缘变局下的文化大革命》的下半部分：“从民权运动到民权纪元”，需要充实进来。

如果说上半部分是摄魄收魂，引领族人认祖归宗；那么《地缘变局下的文革》的下半部分，则是凿壁透光，洞悉华夏未来世界。下半部分，从民权运动到民权纪元，首先介绍纪元部分。纪元部分，先介绍我们这个铁幕时代的主要特性和几种精英铁幕的起源。并对铁幕时代的陆权观念体系和海权观念体系中的文明基本概念进行解析，分析其中的理性成分和人类的错觉，并阐明导致精英铁幕的制度基础。而文革所张开的民权纪元这一未来世界，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就文明格局和社会形态等方面尽可能深入介绍。这部分的论述，有可能要牵扯到重大的经济学演绎，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还只停留在原理层面，并未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

通往民权纪元的道路就是民权运动，会在纪元的后面介绍。此刻哪怕已经落实了民权集中制，民权运动也会继续进行下去，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要走的一个阶段。在此文中，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误解，以为民权运动只是针对文官系统的群众反腐运动。民权运动是在文官集团逾礼的情况下感应而生，在文官集团从制度层面回到自己的位置之前，民权运动的政治对象确实是文官集团特别是其中的贪腐势力。但民权运动从根本上来说，甚至和文官集团毫无关系，只是民众觉醒后的自组织行为，是自我尝试行使自身权力的启蒙过程。对于华夏族群，这种启蒙还是文明层面的，因为民权在中国还从未真正实现过，所以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华夏族群在民族和民生问题解决之后，民权问题不可能被继续搁置，所以作为三民主义的最后阶段，民权运动正是信仰系统领导华夏族群奋力拼搏结出的硕果中孕育的壮丽篇章。我们要阐述的，就是在这一篇章，信仰将和民权一起，迈进一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共和过程。共和是信仰和民权的共和，民权运动就是通往共和的唯一道路。

世界的统一，宗教藩篱的消融等，也在民权纪元中作为重要的专题进行介绍。从铁幕时代到民权纪元，是世界从无序到有序的社会相变过程，由此将会带来和平道路上的世界政治统一，以及宗教的消融等，在此也深入探讨。巫师之前一直想完成的是《黄河岸边的中国》，没有仔细地注视这个民权纪元，所以一切还是个未知数。而这些，在必要的知识铺垫之前，权当是巫师的臆想。民权纪元部分其实是之前一直想完成的《海岸边的中国》浓缩版。当然，如果《纪元》达到其目的，它就是《海岸边的中国》。

§ 4.3 以罢免权下放为基础的民权集中制

本节是本文的最后一段，涉及民权纪元部分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讨论民权系统和集权系统的融合机制问题，也就是民权集中制的基本构架。不把这一问题论述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的文明诉求就不能变现为制度落实，观念变革就不能向制度变革推进，本文也就没有落脚点。这一文明框架的制度核心，本节就巫师早年给出的罢免权下放等相关内容，再次着重介绍。

以罢免权下放为制度核心的民权集中制，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有了一点基础性介绍（见附录）。

其主要内容就是：

1. 每一级的责任行政官员，举任权和行政罢免权都由集权系统行使，集权性得以保留；
2. 该官员的人事罢免权由其管辖范围内的民众直接投票罢免，或者通过民众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投票罢免，以此构筑民权对集权系统的全面监督。

这一制度区别于其它制度的核心特征，就是罢免权下放。和集权系统比较，它要求人事罢免权下放；和选举系统比较，它只要求人事罢免权下放。需要重申的是，本节所介绍的民权集中制，一脉相承了文革中的群众监督要求。文革是观念肇始，这里的方案则要从制度落实群众监督，避免运动式的群众监督对社会带来伤害。

4.3.1 集权系统不可能自我消除腐败

所有的集权系统都必然宣称自己这个组织具备高度完善的自洁能力，有着圣贤一般的政治道德水准，能够在自省中自我纠错。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在腐败问题上，党管不了党，党不可能单靠自己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腐败问题。

在集权的道路上维护权力的高度集中，并戮力清除腐败的相关理论及手段，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家能够达到法家的高度。在这方面，集法权术势等诸多手段于一身的《韩非子》是这方面空前绝后的巅峰。和它相比，2000年后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水平，基本只能给它提鞋。当然，如果有人觉得人性之恶在《韩非子》这里揭露得还不够彻底，那么来俊臣的《罗织经》一定能让他身上的汗毛都能竖起来，而且礼教中国此类作品还多如牛毛。而在这些理论的支持下，古代中国各个朝代的集权系统，发展出的各种反腐制度和技术，其严密严酷程度，是今天的我们甚至不可能想象的。靠集权系统自身反腐，我们不可能超越古代中国，因为在古代那种落后的技术条件下，他们必须把政治技术发挥到极致，才能应付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但又该如何，治乱周期何曾放慢一步。

此外很多人内心还在寄希望于道德精英诉求或者强人政治，但这混淆了短期政治诉求和文明结构问题，充其量是饮鸩止渴，无助于社会的根本变革。而且强人越是强势，越是英明，毒性越大。强人和精英天生的嗜好就是想成为民权的全面代理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嘛，直至全面垄断民权。而强人往往能够暂时胜任这一任务，这就让人们把民权诉求寄托到这一角色上。但其后任能不能胜任这一角色，只能靠天收，王朝更迭告诉我们，这很不靠谱，对此抱太大希望就是礼教还魂。而就在当下，在民众能够行使民权的情况下，集权系统继续掩耳盗铃地代理行使民权，本身就是僭越行为。代理就是僭越，就是政治腐败，是其它腐败之根本源泉，这个不消除，还清除什么腐败？

通过集权系统本身，无论什么人什么方式，想永远彻底地清除腐败，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劲小无关痛痒，劲一大了，就是恐怖血腥的政治整风，也许一时能抑制毒瘤的发作，但大火过后腐败会很快死灰复燃。我们即将看到，其中关键，在于集权系统用于反腐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模式，也正是

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所以，继续依靠集权系统自身反腐，不过如古今中外的集权系统一样，重新上演狗咬尾巴的把戏罢了。那么多开国大帝，那么多中兴之主，我们的强人就能横空出世，在集权的道路超越他们，让腐败不再重来？

因此，集权系统通过整风彻底消除腐败，当然会有一时之效，但这就是在向礼教和所谓的老路招手。强人要在青史上按下自己的手印，就应该沿着毛泽东的指引，以集权培育民权，行进在民权的道路上，那才是消除腐败的根本之道。

4.3.2 中国特色的政治方案及其实践

很多官媒都在谈依法治国，但中国目前阶段确实不是依法治国，而是党章治国，仍然相当于训政阶段。中国的训政阶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民权运动会一直与它相伴。而现在很多宪政派，鼓吹依法治国，其实并非真正拥护宪法，只不过想利用宪法和党章之间的矛盾，削弱甚至推翻中共的领导权罢了。集权观念形态和民权观念形态之间的矛盾，都集中在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两者间的矛盾上。党章中要求中共领导中国的一切；宪法中则规定，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人大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没党什么事，所以问题就来了。

中共把持人大，以党代民，就是僭越，就是走在老路上；而人大选举一旦全面铺开，民权独大，中共的领导权立即瓦解，就是拐到邪路上。所以从政治制度上来说，除非我们把老路当成中国特色，否则今天还谈不上什么中国特色。现存的政治系统，脱胎于大陆构架，但经过毛泽东的大力改造。尽管在对文革的否定中，制度上又回到精英老路，只是在观念上一时还无法洗掉毛泽东打下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还剩下一点中国特色。但一直以来，体制内外，一个想走老路，一个想走邪路，非毛极为猖獗，无非是想彻底摆脱毛泽东这个幽灵，十八大报告中就还有此种残留。

十八大报告中没有打通民权系统失能和集权系统腐败之间的内在联系。报告中，第五章“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指明要“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这摆明了人大代表不会放开选举，也就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表明僭越行为还将继续。因此，在党的建设中，自然看不到人大的身影，在第十二章“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七）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中，通篇看不到人大的任何监督作用，只有肃贪和自律。自律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而这一届领导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有人要再次拾起康生的角色，我们相信党纪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严肃，但这就是党要管党的集权系统自我清腐翻版，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上文已经说了，这条走了几千年的道，如果不是老路，还有什么老路。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新路呢？到目前为止，只有文化大革命在这条道路上进行了最真诚的尝试，也就是民权监督，民权反腐。而且，这是唯一的道路，其它所有道路都被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堵死了。所以，今天科学发展观是继续在中国特色的文明维新道路上，而十八大报告中政治新

路上的不足，巫师以为，民权运动会继续给予补充。

4.3.3 现存的政治系统和精英铁幕成因

前文关于原始集权系统和铁幕的结论，在本节可以找到基本依据。当今世界现存的各种政治系统，尽管花样繁多，但不外是集权系统和选举系统的谱系流变，没有超越集权和选举这两个范畴。当然还存在着这两种系统的一些畸形组合，例如东南亚诸国的政治制度，这些系统往往都是等而下之的败坏形态，这里不再赘述。

在讨论现存政治系统之前，有几个概念关系需要澄清，很多人把西方模式的选举制度说成是民主制度，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说成是专制，这完全混淆了两类概念。选举不是民主，集权不是专制。前面是制度，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后者是意识形态，是西方价值观生产并扣戴的政治帽子。我们这里分析的是政治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范畴，所以就不要扯什么民主专制，这里的民权概念也是基于切切实实的技术，而不是大而化之的不能落实的堂皇概念。今天如果说集权系统毫无竞争力，知道“Made in China”的全世界民众都会当成一个笑话；但若说选举不代表法理上的民意，这话连中国的文官集团都不好意思讲，好歹还有一个所谓的人大装点门面呢。可见，无论选举系统还是集权系统，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原始集权系统和专制铁幕

腐败，今天我们几乎看成了头等大事，但只是民权照映下集权系统固有缺陷中最直接显露的病症之一而已。泛集权系统中，其固有缺陷的危害，比腐败要大得多，如礼教、农奴制度、种姓制度、诸侯叛乱或藩镇割据、宗教间仇杀，宗教内部派别的分裂争斗，甚至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度抑制等等，都是泛集权系统痼疾恶性发作的各种症状表现，而且有史以来集权系统从未摆脱这些问题。和集权系统这些恶果比较，腐败还不是最大的问题。集权系统中有数之不尽的诡诈权术，还有令人发指的恶行，如千刀万剐的凌迟、满门抄斩和株连九族等。集权系统这种野蛮暴行今天我们较少看到，主要是民权观念薰习的结果，但权诈之术在官场商场中依旧盛行，表明我们离原始集权系统依旧很近。

如果说集权系统的恶性痼疾仅限这些，那就太小看这个铁幕。铁幕几乎无处不在，千百年来，我们甚至认为它就是人性的一部分。铁幕伴随着我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现下我们甚至不能摆脱这种附着在我们灵魂上的存在。在这样的集权系统，上方看到的永远是下方春光明媚的小脸，如给杨玉环当干儿子的安禄山，就倍有人贱人爱的亲和力。今天我们随便到一个酒桌上，都能感受到被铁幕扭曲的人性，上演的种种丑态，只是我们意识不到是铁幕在其中作用，也意识不到这些仪态之恶丑，甚至觉得其状甚豪其言甚美而已。如果还不足以让你理解铁幕的这种表现，那我们可以在各种场合的会议上、以及官媒的所有文章中，去细细品味。

需要强调的是，只有真切感觉到铁幕的处处在在，才能理解铁幕所散发的恶臭以及对人性的深

巨扭曲，至此，我们才能大梦初醒，才能直观体会民权纪元中的文明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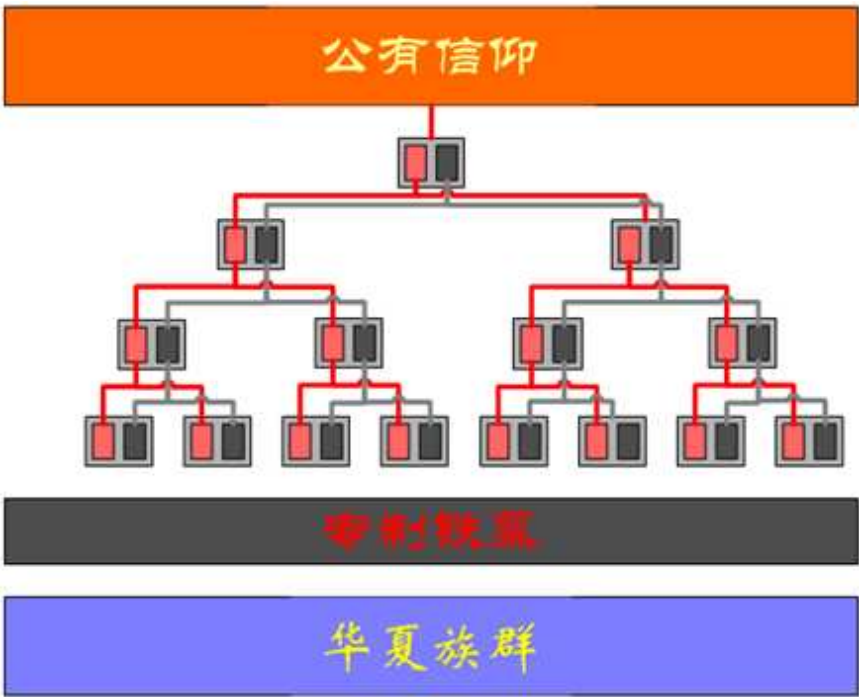


图 4.5 原始集权系统与专制铁幕

原始集权系统何以如此？图4.5显示原始集权系统的树状权力结构以及专制铁幕成因。树状红线网络就是在民权诉求中诞生的信仰，授权建立起来的公权力系统组织架构，其宗旨是为社会和民众服务。这一红线网络，既是民权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一个在民权诉求中诞生的集权系统之最初承诺。这个金字塔型的红线权力构架，可以深度组织起民众和资源，达到集权系统所要达到的目的，如国防动员和国家工程等，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宏观生产力作用。

但是，在公权力系统每一个节点上承担责任和执行任务的是人，他所面临的情况往往是权力因为基本不受监督，以致可以极度膨胀。没有监督，那么有人的地方就有阴暗面，内心的私欲就化为集权构架中每个节点中的黑色组分，并借助集权系统的红线权力关系，自然地组建黑线网络，所以有红线有人的地方，黑线如影随行，甚至取代红线。对于其中的民众，信仰中产生的集权系统，也就蜕变成鱼肉他们的专制铁幕。

除了以上的表现形态，专制铁幕在信仰、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性等一切领域，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有无穷多样性的变异形态。铁幕是附骨之蛆，其中生成一切罪恶与腐败。原始集权系统的铁幕痼疾，其发作表现，由每个节点上的黑色组分所在领域，如信仰、政治、经济、文化等，就会演绎成宗教斗争、政治党争或诸侯分裂动乱、贪赃枉法和文化败坏等等，又根据地缘环境、个人的阶层位置的高低和发作群体的大小等，形成不同的群体特点，产生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历史展

现，就是人类罪恶史。如黑线的整体板结，就是礼教和种姓制度。儒家消除黑线的方案就是君子自律和所谓的任人唯贤，结果不用说了。在这种集权结构下，没有民权监督，黑色部分的比例几乎可以任意扩大，民众基本看不到任何光亮，心中又只有这种集权观念，自然就有了圣明君主、青天的要求，可那只是地狱的招贴小广告。铁幕的黑暗，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因为人类史上几乎所有的罪恶，它都脱不了干系。到此，左翼阵营的，应该理解何以有人如此憎恨这种集权系统了。

这种集权结构也清楚地解释了原始集权系统内整风和肃贪的必要性，同时也解释了这种整风肃贪，只是对个别人的清理，改变不了集权系统的整体构架，也就无法对治其中的缺陷，不可能真正清除腐败。治贪也治不了平庸和系统本身的僵化。即使腐败问题有所改善，僵化，平庸等诸多问题，会随之层出不穷地浮出水面，较之腐败好不到什么地方。

选举系统和资本铁幕

原始集权系统有严重缺陷，那么选举系统是不是就能在竞争中胜出呢。可怜的是，选举系统从来就没赢过。在现代文明之前，选举社会在世界所有地方，基本就没出现过，也就是说，即使与最原始的集权系统竞争，也被早早淘汰，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所以世界古文明史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原始集权系统演化变异史，这本身就说明选举系统存在先天问题。有人会拿古希腊做例子进行反证，可惜这只能补证选举系统被淘汰的命运。近代以来，选举系统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想想看，华盛顿和乾隆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选举系统才持续多久呢。先是大英帝国的土崩瓦解，今天甚至苏格兰也在闹独立，而美利坚合众国独霸天下的局面看样子要创造一个历史最短记录，在美国之后，选举系统更无可能领导世界。

选举系统所以缺乏文明竞争能力，也是因为其自身的结构缺陷。如图4.6，选举系统产生行政系统的方式，决定了行政系统无法以具有内在组织性的集权模式运作。这种集权式的运作，对于群体的生存必不可少，在选举系统中却缺乏法理和组织模式的支持。这带来很多问题，一是这个选举系统很容易被淘汰；二是无法阻止资本铁幕的产生。

也就是说，由选举模式建立的政治体系不能真正实现民权，但另一方面，选举系统确有民权基因，是对治原始集权系统缺陷的基本手段，这一点对于这个世界很重要。

选举系统与封建社会形态一旦结合，国家就是一堆小的独立王国集合。选举系统本身对私权泛滥的制约缺乏有效的法理支持，法治就根本没有可能深入这些大大小小的王国地盘，这种国家就是普遍的奴隶之邦。选举系统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其国家往往是宗教国度。因为选举系统无法以公权力为基础提供必要的服务，为民众支撑起信仰，民众的信仰就只能依赖于看上去独立于行政系统外的信仰组织，这一宗教组织还是集权备胎。而选举系统产生的行政部门上方的集权真空，则很快会被资本铁幕牢固占领。

同样基于法理上的原因，选举系统无法制约私权的极端发展，膨胀壮大的私权不能以公权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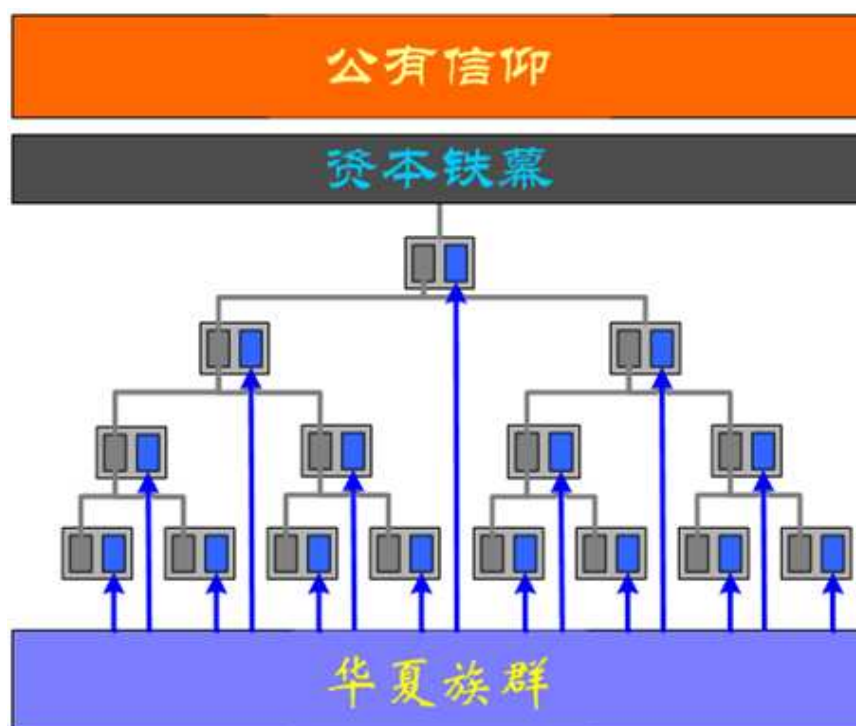


图 4.6 选举系统和资本铁幕

形式存在，但会以资本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凌驾于民权之上的资本极权，这就是资本铁幕的起因。资本铁幕是从自由市场中，个人资本不断壮大，并演变成垄断资本的情况下产生。资本的增长不受边际原理制约，反而是强者通吃这一马太效应的罪魁祸首。资本铁幕第一作用就是消灭自由市场，并如上图所示，对所有公权力系统进行渗透，把公权力系统改造成垄断资本的金钱机器。资本铁幕的整体现形，仅仅通过语言的形式还不足以名状，需要经济学的系统论述，但这超出本文的任务。

中国的资本铁幕这种怪胎的形成同样极具中国特色，它是集权机器属意造就的一个畸形产品，现已基本成形。改革开放前 20 年基本算自由市场时期，而这十年时间，就是资本铁幕从孕育到基本成形的整个过程，小额信贷放宽就是金融资本成形并开始侵吞产业资本的信标。从自由市场到资本铁幕形成，只经过极其短暂的时间，这在世界范围内十分罕见，没有民权的监督，什么也抑制不了他们的贪婪。中国现在专制铁幕和资本铁幕同时共存，但是这并不是两种事物，而是一种事物的两面，不受监督的权力穿上了资本的外衣。但事情总有两面性，铁幕是自噬之蛇，由它激发的民权运动也会以全新的形态显现于中国，并藉以消灭它获得通往民权纪元的终极认证。

4.3.4 以罢免权下放为基础的民权集中制

围绕着荡涤专制铁幕和资本铁幕，图4.7结合集权系统和选举系统的主要优点，给出了民权集中制下的政治系统基本构架。从图中可以看到，选举模块产生的对应单元，取代了原始集权系统中的黑色部分，并发挥起民权监督作用，让专制铁幕不复存在；而公权力集权模块的健康存在，让集权系统的种种优点在民权集中系统中继续发扬，并抑制了资本铁幕的形成。以此，通过罢免权下放，民权集中系统克服了原始集权系统和选举系统中的固有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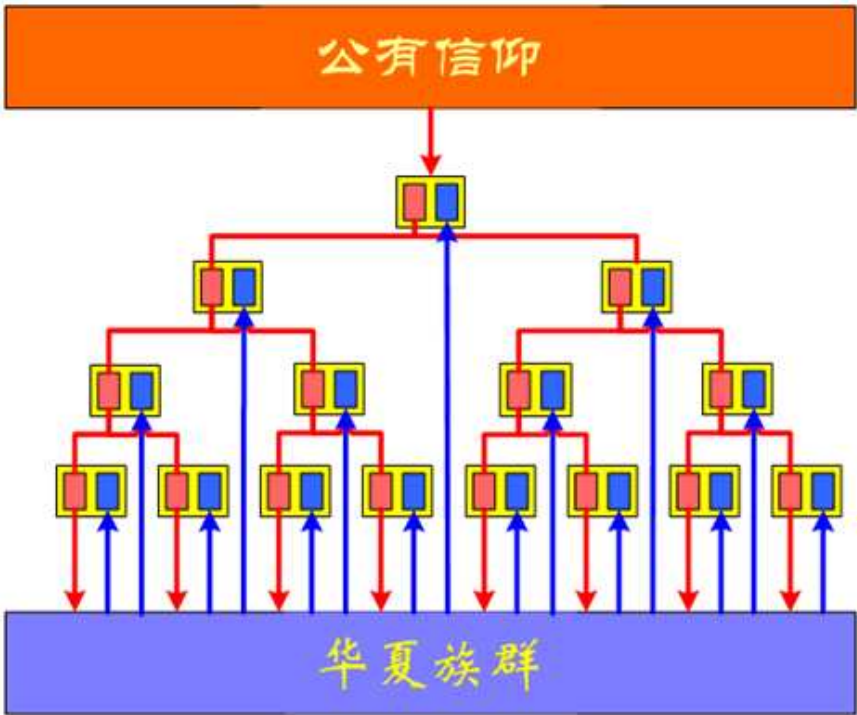


图 4.7 民权集中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在当前的中国，只要民权系统开放选举，所有反腐的事情，不需要任何其他他人假装操心，民权集中系统会自动地清除一切腐败，而且不仅大规模制度性腐败全面消失，连诸侯叛乱、朝廷党争等集权痼疾，也一概消失。在选举模块只发挥监督作用的情况下，集权系统的内部组织性不仅完全保留，而且由于其制度缺陷被选举系统弥补，腐败问题不会产生，党争等破坏性被抑制，其集权效能得以更高效地发挥出来。

可以预料的事，选举中产生的民权系统将给集权模块中的信仰系统和行政系统，以最快最直接的反馈信息，形成对话。并通过罢免权，保证行政系统的透明性。但除了集权体系暂时出现重大问题，选举系统短期替代履行一定的职能，否则选举系统绝不能以任何主动的方式产生行政机构，只能是发挥监督职能的消极机构。只有这样，那种乾占坤位或者牝鸡司晨的局面才不会继续出现。

实现民权，并非仅仅是人代会这一民权机构的职能，而是多个系统协作中形成。人代会只是狭义的民权机构，真正全面而系统的民权，也就是华夏族群的存续之道，体现在民权集中系统的各个模块和整体结构之中。

民权集中系统不是对现有政治系统的改革改良，当然，更不是革命，而是和平道路上的文明再造。实现民权集中系统后的社会，就是文化大革命所诉求的那个观念世界——民权纪元，就是大同世界。当前人性中铁幕造成的各种缺点，在民权纪元社会中，会得到修正。“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民权纪元中的人性会是生命真实状态的最自然呈现。“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金钱和权力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了铁幕阴霾的扭曲和毒害，甚至人们身上的各种病症，较之当前也会大为减少，因为人们心理、生理处于良性健康状态和食品环境等安全问题得到保障，病菌和毒素也就不再为祸人间。更深入的生活状态，以后我们将在本文下部继续讨论。而民权纪元里人类的创造力，没有了铁幕的束缚，每个个体和人类能达到的生命境界，非铁幕时代下的巫师所能透视。我们只知道，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社会相变，相变后的社会状态，是铁幕时代所有信仰者的灵魂归宿。

民权的社会实践，主要是民权运动和民权集中制方案的政治特区试验。民权运动是中国进入民权纪元的基本道路，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这一点，无论怎样，都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多数人所关心的，还是政治方案的尝试和选择。能够选择的方案，除了原始集权系统和选举系统，剩下的就是这里介绍的民权集中系统。

选举系统和原始集权系统有无数的历史标本和鲜活样本，封资修的样本及其流变谱系，古今中外，足够丰富了。这些标本和案例，除了一再印证两种系统的缺陷和痼疾外，没有给出更多新的内容。选举之路，大中华地区以及东亚人文区，试验样本比比皆是，我们不必非要再试一次，才说它是臭的。因此真正需要实践检验的，只有以罢免权下放为基础的民权集中制。

县一级行政区，也算五脏俱全，可以作为民权集中制的最小实践单元。在这一单元上的政治实践，可以检验民权集中系统的可行性，并给出具体的制度方案。和深圳、香港这类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比起来，这一实验单元已经很小了。这里理论准备充足，政治方案明确，不用摸石头，实验单元小得对整个国家可以忽略不计，不存在整体风险的问题。如果这点成本都不愿意付，继续推三阻四，那之前的一切都不过是铁幕抛出的欺骗谎言，助推民权运动的质变。拒绝民权的直接监督，就是当下的铁幕作祟。

本文结语

重估文化大革命的文明价值，化开民权运动道路上最大的一个障碍，也是对旧的价值观和西方价值体系的华夏回应，本文是巫师按下的一记手印。基于本文在观念层面上的颠覆性，巫师毫不怀疑，中国相关的人文社会研究会出现重大洗牌，成为民权运动文化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念演变脉络由此变得更为清晰，如果说之前对文革还存在争议，那么今后一切价值从文革中流出。

但仅仅指出文革的意义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从中找出文明维新的新力量，走出当前困局，这就是民权运动。民权运动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显在，是华夏族群左右共济的沧桑正道。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刺穿精英铁幕的匕首，那么民权运动就是销熔精英铁幕燃烧的火炬。民权是海陆地缘冲突条件下，华夏文明的内在要求。只有经过民权运动改造的中国，才可能在海岸边存续下去。民权是华夏传统文明中宰治不正的唯一根治办法，是彻底贯彻礼文化的根本手段，只有民权，才能让一切宰治不正的情况得到即时纠正，杜绝一切篡权，政变等宰割不正所带来的奸邪滋生，遗毒族群的问题。也因此，落实民权才能真正实现礼宰天下的文明格局。

民权是铁幕死敌，民权运动就是全新的文化革命，只有民权运动才可能最终消融精英铁幕，实现民权纪元。这种文化革命，是创建完全不同于铁幕时代的全新文化体系，是对族群的全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提出文明新要求。而从这个角度看，针对日益腐朽和溃烂的精英铁幕的斗争，即破旧，反而是民权运动的副线，而更广阔的是，族群主体的原生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创造，才是民权运动主干。也就是说，和最初的文化大革命相比，破旧和立新的位置是颠倒的。

民权运动在政治领域的基本要求，一是毫不犹豫地要求实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一是毫不迟疑地要求全面落实民权对集权系统的监督，将党的领导筑基于民权监督之上。因此，民权运动要人代会，要罢免权，要紧盯精英集团，要他们寝食不安等。民权运动当然不要指望文官集团的配合，但一定会得到信仰的真正支持，因为民权运动才是拯救信仰的基本道路。在文化方面，民权运动会甩开精英集团，是民众自主自发创新文化的社会运动。到今天这种民众大觉醒的情况下，精英铁幕只是民权运动的一个治理对象，而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没有什么能束缚我们的内心了，我们族人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更主动地创新海岸文明的新文化，刀锋所向，势不可挡，一个伟大的民权时代正迎面而来。

在本文最后部分，信仰和民权之间的关系应该予以说明。远古的祭祀活动中，除掉祭祀中原始盲目的成分，天就是信仰，信仰就是天，“天子”就是贯彻执行信仰的第一人，“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众拥护，就是天命所归。“天立王，以为民也”，没有民，就无所谓天，所谓天子就成了真正的孤

家寡人，更何况百官。而“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指明民意即是天意，民听即天听，民视即天视。所以民外无天，民即是天，天就是民权的假名。信仰源自族群民众，民众的诉求汇成信仰，并授予信仰系统以社会公权力，生成集权系统，信仰就是集中统一的民权。信仰就是民权的假名，**信仰就是民权**。在民权集中系统中，信仰和民权呈现共和局面，权力和金钱就会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所有铁幕丧失其存在基础，即是民权纪元。

期盼我族人心灵回归和谐安祥，是巫师无可救药的乡愁。巫师所言，愿族人悉知之。

后记：桑田沧海觉为了

因为上半年觉得整个中国舆论情况很险，存在茉莉花的倾向，就有了写作的迫切心情。原以为九月初就能结束，结果几乎一年的时间全搭进去了。最后因为太耗精力，砍掉了一些内容，不过要表达的东西都基本表达了。

《地缘变局下的文革》一文，是想澄清华夏文明维新之路上一些思想问题，从文明地缘层面扭转族人的基本观念。一是想让族人看清楚自己所处的历史位置，是处于从桑田到沧海的地缘变局中，别被异鬼他灵带到陷阱里去；二是提醒族人，我们的民权运动正在来临，看清楚文明维新的根本方向，把路走好。此文之后，还有资本铁幕的法理基础需要进一步定位清除，进一步为文明的维新之路扫除基本观念上的障碍。观念革新的社会过程当然不会因此立即一帆风顺，但社会成本会有所下降。民权运动，还是会和内部的精英铁幕，以及全球封资修政治力量进行激烈较量，并最终销熔它们，才可能重塑世界。

本文之后本来想接着写下部，即《从民权运动到民权纪元》，精力顾不过来。现在来看，要真正把民权纪元论述清楚，个人目前在经济思维范式上准备尚且不足。在中国，专制铁幕是万恶之源，是资本铁幕的养父，本文主要是针对专制铁幕的，对资本铁幕揭露不够。专制铁幕在体上现形，资本铁幕在用中露脚。必须有经济方面的系统理论，才能够透视资本铁幕的存在基础，将其连根拔出，同时，也为民权运动与铁幕较量中的经济模式创新，探索出路。这是《地缘变局下的文革》之外要打造的一把民权匕首，这也需要开动逻辑机器，磨段时间。

只有在经济理论层面将经济发展奠定在民众利益的基础之上，才能从法理上赢得针对资本铁幕的胜利。没有这东西，民权纪元论述起来，就不够彻底，而民权运动的这一目标不够清晰，民权运动的基本道路就带有异数，付出成本就会急剧增加。用西方经济思维范式来分析辩论，等同于帮别人点钱，这方面，左翼的人士，其实已经丢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把刀子。

文中所介绍华夏史观，贯穿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基本给出了系统的历史观念和认识方法。通过华夏史观，不仅可以辨明了华夏古文明的基本形态，近代以来文明层面的基本变革，其脉络也因此变得比较清晰。文化大革命也正是在这一史观的基础上，加以重新认识。而将来，不出意外，华夏族群会继续朝毛泽东思想集结，速度越来越快，势不可挡。政治上继续否定文革，于己于国，都是十分不智的选择。

文中的思想方法，主要是唯物史观、辩证法，当然地缘政治思想是少不了的。作者所接受的地缘政治思想，是何新先生介绍的地缘政治理论启蒙的，不过这里拿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明问题了。这些工具一开始用，都不很称手，所以都稍加了一点改造。如地缘政治思想中，单一的陆权概

念无法用于分析中国历史，认识到以前陆权并未统一，而是分裂成游牧区和农耕区，才能将地缘政治分析应用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决定论也因此增加了一定的地缘和观念因素。

辩证方法在此文中比重也不小。本来辩证法讲的是世界的能动性或者说世界活性，它的 DNA 遗传序列是从上帝到自在之物，然后到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最后才被马克思接手，重新改造并推销出去的。还有一条拐着弯的道，就是叔本华到尼采的意志表象等。毛泽东是这两条道路的集大成者，《实践论》还是辩证法的发展，实践是能动的主体意志贴身近逼事物，获得对事物的特性和联系的认识，并最终改变世界的基本途径。并且在毛泽东这里，世界、社会和个人意志都极具活性，或他在哲学上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激发人民群众身上一直被抑制的能动活性，进而改造整个世界。

而今天的中国，由于信仰系统的失范，以及族群安全要求的约束下，以往的矛盾演变成今天的铁幕和民权的对立。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依然存在为这种对立中付出巨大成本，甚至让华夏族群的文明维新面临失败的危险，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从这种的对立中走出来呢？这不能仅仅通过行动解决问题，因为盲目的行动，只会招致世界更猛烈的反扑，而应该对过往付出巨大代价的社会实践进行总结反省。这就不能仅仅站在对立的一方看问题，而是应该站在更高层面上认识华夏文明的维新历程，才可能有不同于其中一方的攻击性思路，真正解决维新之路上的矛盾。

这种观念层面上的认识，借用佛家的概念，可以称为“觉”，这种“觉”和概念理性非常不同，个人称之为观念理性，其实说是一种感悟可以更准确些。概念理性往往只是在逻辑范畴内量的层面上解释事物的发展，而观念理性则能很直观地看清楚事物未来的千变万化，概念理性只有到一定阶段以后，有一个类似顿悟的过程，观念理性才会出现。概念理性有如“学而知之”，观念理性犹如“生而知之”。知宗变之要，即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乃至穷极其变，这大概就是指观念理性。从观念上来说，铁幕其实不是某个人某些人有多么坏，而是人类在观念上的蒙昧所致。《证道歌》中说，“觉即了”，认识到了，解决方法就在其中。个人以为，这是人类化解自身所处的矛盾，在实践之外，需要强调的地方，也是人类通过和平途径的民权运动，觉照、对治和销熔精英铁幕的观念基础。

附录 A 相关交流记录（尚未整理）

附录 B 古代中国——光辉的公有制历程¹

曹泽新

2003.8

本文中的基本观点是《地缘变局下的文革》一文主要理论基础，其主要观点如下：

1. 古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是家族公有制，“礼”和“法”分别是所有权理论和管理理论。
2. 古代中国是公有制社会形态，主要由东亚的农牧地缘冲突结构所决定。
3. 华夏文明起源于农牧地缘冲突。
4. 游牧区对华夏礼文明的贡献巨大，否则华夏文明很可能是一种宗教文明。
5. 和西方不同，封土建邦是中央集权的开始，是集权观念在生产水平限制条件下，管理权限上的妥协。
6. 古代中国是平民政治和角色等级社会的结合。
7. 农民起义是儒家社会对人口问题失察导致的人口起义，主要作用是消灭过剩人口，政府腐败是导火索。
8.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公有制中国的土壤上生成。
9. 近代中国革命史是文明迁徙史。

§ B.1 前言

中国古代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一个信得过的结果。翻开中外关于古代中国的历史书籍，却让人更加糊涂。现在关于对儒家文明的解释，主要在文明、文化、道德、生产力等这些层面展开。这些解释可以说是异彩纷呈，但从来没有一致过，甚至截然对立。有人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认定人类社会都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

¹本文写作时间距今快十年了，文字没有改动。有些论点有部分调整，特别是对宋明理学的认识，但基本观点不变。此文也算是雏形的《黄河岸边的中国》，其中的地缘文明思想还比较淡，只能将就看。《从鸦片战争到大争论》一文，成文更早，地缘迁徙这个观念也没有贯彻进去，这里没有收录进来。《农牧地缘冲突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一文，学术性过重，这里也没有放进来。后两篇开拓者所整理的版本中都有收录。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系列，逐个进行下来，把古代中国打上封建烙印，于是地主的剥削、专制的黑暗、吃人的礼教，这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可这，不仅让人感觉，远在马克思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代社会就有背公式之嫌，似乎也刺伤了中国人近代以来那颗愈见脆弱的心脏，他们极力为中国传统文明申辩，却说不出个所以然。而西方世界的一些历史学家，从文明角度对儒家文明作了不错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这些自尊的中国人一点安慰剂。但让人沮丧的是，我们至今还找不到一种解释，能够在古代中国和现代文明之间架设一座理性桥梁。

给中国古代社会无论什么样的评价，总要面临巨大还没有被克服的历史难题。如果把中国古代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那么这种社会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在所有阶段都要远远超过当时的欧洲，但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迈进资本主义。如果不承认这种强大的社会生产力的存在，那么中国超越世界几千年的文明和巨量的物质财富就无法解释，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财富也远远超过英帝国，从洋务运动中清政府的财政能力也能看出这一点，而这时候中国早就过了鼎盛时期。但是如果承认儒家文明在历史上所做的贡献，它近代的落后又无法在现有的理论范围内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近代的产业革命没有在这个曾经无比先进的儒家文明发生，现有的史学理论框架下也无法在得到一个自圆其说的答案。出路在哪里？

我们的祖先做了什么？他们创造的这璀璨文明究竟是什么样的文明？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下，我阖上书本，放下笔，无助地望着窗外。突然间，一缕烟火在中原大地腾空而起，在高空绽放开来，旖旎而下。在那无比绚丽的烟火中，闪现出一簇簇中华人物，黄帝、大禹、周武王、孔子、韩非、秦始皇、汉武帝……，谈笑间，他们从我身边走过，表情沉静，神采奕奕，敏锐的眼神流露出异样智慧，眉宇之间透着神一样的自信。他们似乎要对我诉说些什么，可我听不清楚，但我看不到他们身上一丝的自私短见与庸俗。难道这些风流俊逸的英雄人物，他们仅仅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建立了一个个在许多人看来无比黑暗的王朝么？不，不可能。他们如此杰出，他们不可能没有超越自己的理想。

当考察出来的结果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根本无法面对它。在这样的结果面前，我觉得自己苍白得象一张纸，我为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祖先的误解无地自容。他们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他们的活动不在我们现在所想到的范畴之列。从一开始，他们就完全超越了马克思所划定的人类演进模式。这漫长伟大连续的文明，只是他们企图实现他们理想所画出的轨迹，在他们的思想中，从来没有私有制，他们只是想通过一种家族观念达至他们的理想社会——公有制社会，而且他们做到了，做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出色。在这个地球上，没有比他们更真诚的卫道者，这个伟大民族的精英，前仆后继，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这一理想——家族模式的社会公有制形态。

下文中，首先通过对传统文明中核心理论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儒家和法家思想给予一种新的解读，找出传统文明和现代社会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之后将简介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过程和面临的主要矛盾，由以上的理论和社会分析，我们理出这一文明的一些特征，企图给出传统文明一

种整体上的认识。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上，所发生的巨变，我们也将从两种文明的基本社会政治观念上，寻找其中的原因，并试图阐明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最后就其它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个别阐述。

§ B.2 古代中国——家族模式的公有制社会

B.2.1 公有制形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始的公有制社会已经随着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而消灭，人类社会从此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发展过程，下一步又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以及无产阶级的出现再次进入高级阶段的人类公有制形态——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不管怎么说，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学范畴，公有制形态在我们这个社会并不存在，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而人类从十九世纪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革命，但最后随着苏联的崩溃和中国朝市场经济转变，这一理想主义的社会实践被认为是失败的。而在中国，残余的中央集权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权，继续让持着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些人耿耿于怀，而经济上的改革，更是针对中国的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在自由主义理念下，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的私有化浪潮。公有制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人类历史认识，不仅和当时的文明现实相矛盾，它同样与自己的社会辩证法有出入。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史，只强调了生产力对社会形态的推动作用，把生产力看成是决定社会形态演进的唯一因素，而没有看到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规范和影响。从我们的观察看来，由于没有考虑到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规范和制约，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基本上只能正确解释古希腊文明这一段历史，对其它文明和社会的解释存在重大问题。诚然，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推动，深刻影响着社会观念的变革，作为部落整体意识，被全体成员接受的原始公有制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它会逐渐退出具体的社会生产领域，但作为一种整体意识，它依然会在祭祀、宗教和道德中被保留下来。

这种保留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保留的程度和表现的形态，与这个社会群体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经历的社会过程有极其紧密的关联。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过程中，这种保留会随着社会的演进逐渐发生各种变化。例如古希腊文明没有一个超城邦的强大社会力量出现，而城邦之间不断纷争，在这种纷争中，个体的权利得到确认，但祭祀功能逐渐退化，社会的公有性质基本完全被淘汰，古希腊人创造出极富特色的民主制度，结果是形成基于个体权利的古希腊文明社会。而中东一带，由于地理条件，不能形成古希腊那种城邦社会，没有一种自然力量能对这种整体上的公有意识发生挑战，到现在，这种公有意识被伊斯兰教所保留。而其它地方例如玛雅文明还是

以祭祀的方式，让公有制意识保留下来。

自然力在各文明的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它并非象希腊那样，有利于原始公有社会制度的破坏，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为了整个社会群体适应所在的自然地理条件，这些地方的文明会通过祭祀、宗教、道德等各种意识形态途径，保留和加强了社会的公有性质，以确保群体整体的生存，而这些文明所在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仅会对这种文明整体协调组织能力的保存产生积极作用，甚至会刺激这种整体协调能力的加强。从这些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学说，由于过分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考虑自然力量和社会整体的约束力，在解释这些文明时，出现了无法克服的理论困难。

马克思主义所认识和承认的公有制形式，主要只是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公有，而且是完全公有，没有提及变异形态和较弱的形式。上面提到的公有制形态，由于没有落实到微观的生产领域，并不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不仅在历史辩证法层面上说不过去，也遭到现实的抵制。一，它没有看到各种文明本身，由于整体利益上的需要，对生产力破坏性乃至创造性的制约，从而这些文明体系从来没有迈进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甚至封建社会中，甚至从现实角度，我们也看不到将来有这种转变的希望，例如各种宗教型的社会。二，由这种理论所指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为工人争取了更多的政治权利，但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出现，而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中国如其说是社会主义的成功，倒不如说是华夏文明自身的调整和适应能力的结果。无论是对是错，文化大革命可以看成是对这种纯粹理想的意识形态的一次反动，而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更能说明中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样板。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所有权的认识上，它只看到个人对社会产品的占有，从而把社会产品的个人占有和社会所有截然对立起来。这种认识在当时的西方来说，是正确的，西方社会的权利划分一直是基于个人的，它对个人等级和物品所有属性有相当严格的规定。但用来说明其它文明社会就存在巨大问题。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子，传统中国的君主可以剥夺个人的财产，而且这种剥夺在法理上也得到承认。但如果由此说，只有君主才是整个中国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其它人只是奴隶，那么不仅把儒家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是错误的，而且解释不了这种文明的辉煌业绩。

从上面看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理论在解释世界文明时已经很不适用，而新的更系统的社会理论目前并没有看到，这里所用到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从历史辩证法出发，既考虑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考虑自然地理条件和文明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观念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因素，来解释社会发展动力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同时，还将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就社会财富的所有权等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由此从政治经济层面来考察儒家社会和当代社会之间的异同，例如，这里所说的公有制和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公有制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本文关于儒家文明的叙述的理论基础本身也许算是一次创新，但并不十分可靠，在这里更谈不上系统。

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公有制社会，首先需要阐明它的这种公有制形态，显然，从战国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就不再是祭祀型的社会，更谈不上宗教型社会。它的公有属性，不是通过图腾来表达，也不是由上帝和真主来实现。我们常常说的古代社会的“家天下”，完全可以表达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属性。但是，“家天下”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点，在不同的理论解释下，具有完全不同而且截然相反的含义。就当前中国史学界对“家天下”的认识，主要包含三点：私有制、封建、专制。

但作者的认识与它完全不同。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它绝对不是一个自私落后保守的社会，相反，它是一种公有制社会，是一种开明集权的社会，是在近代以前，全民普遍、平等享有政治权利的社会，这也是从“家天下”这三个字中得出来的结论。“家天下”正是传统文明那种家族模式的社会公有制的概括。为了弄清楚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家天下特征，我们首先从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开始，考察它的相关社会性质。

B.2.2 家庭的分析

家庭的出现，要远早于文明社会。今天在世界各地依然存在的原始部落，尽管没有脱离原始状态，但家庭作为一基本社会单元，已经在这些部落出现。在经过漫长的社会发展后，家庭这一社会单元，也并没有消失。只有在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这种基本社会单元才会因为丰富的物质财富而消失，但人类发展至今，尽管社会形态一直在发生变化，但还并没有一种社会或自然力量，让家庭这一社会组织出现显著的破坏。我们有理由认为，家庭应该是原始社会中产生，并保留至今的社会基本单元，生产力的发展可能让家庭各成员所处的地位有所变化，并没有让它的基本性质产生质的变化。因此要考察社会的性质和演变，家庭这一社会基本细胞是首先需要研究的对象。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原始社会是不存在私有现象的，而家庭这一产生于原始社会的社会基本组织，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性质呢？

我们首先考察家庭成员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和家庭实现的基本社会功能。一般的家庭是由适龄的男女根据性关系结成伴侣所组成。他们通过生产获得经济收入来满足家庭的生存需要，家庭的延续则通过血缘关系。一个完整的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它同时承担着生产、繁衍、保障和子女抚养教育等各种基本的社会功能，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分工协作，各自承担自己的家庭义务。丈夫一般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妻子主要的职责是承担家务劳动，并在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典型的男耕女织家庭总是一幅慈父孝子，女人则贤妻良母的天伦图象。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富，社会的保障能力逐渐增强，家庭所承担的保障和抚养任务逐渐由社会来承担，家庭所履行的社会义务越来越少，而且女性经济地位也逐渐独立，家庭的基本功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家庭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关于家庭的细致探讨，并不是本文的内容。我们所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家庭，它的所有权属性——它归谁所有？

显然家庭成员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也不存在奴隶或者农奴性质的所有关系。女性由于身体条件的原因，对男性存在一定的依附性，但女性只要愿意，完全可以摆脱某个男性。在结成婚姻

关系后，法律上并不强制妻子归丈夫所有。家庭同样不是一个事实上的股份制组织，股份制以私有权为基础，有最初和最后的私有权要求，而且，股份制的股权有多有少，而家庭破裂时，财产的分割一般通过协商或者均分来解决。此外，占据领导地位的一家之主（当家的）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要求其它成员一定的服从，但并不必然享受最多的物质享受，相反，普遍的情况是更多的收入花在子女、妻子和病人身上。由此可见，家庭的经济所有权属性，无法在私有权范围内解释。

而且关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除了结成一定的赡养和抚养义务，今天的法律没有任何条文强调夫权，相反，它的条文更多的是家庭财富为家庭成员共有，如（1）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共有财产为家庭共有财产。（2）一旦家庭共同生活条件消灭，家庭共有财产也因此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随之消灭。（3）家庭共有财产由家庭成员共享所有权，由家庭成员共同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等等。可见，这种家庭被成为父权所有完全没有确切依据。

此外，从家庭成员对家庭的态度上，也找不到夫权私有的依据。在家庭生活中，妻子一方，没有任何奴隶相对奴隶主、农奴相对地主、工人相对资本家那种从利益上对抗的心理因素和社会性的消极行为。相反，她的劳动付出完全是积极主动的，通常情况下，丈夫需要她的敦促，才会为家庭付出更多的劳动来获取更多的收入。

限于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不是家庭本身，这一命题不适合在这里全面展开，但从上面可以看出，我们的结论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是社会的最终私有单位，但它的所有权却是原始社会中保留下来的公有制，而不是以父权私有的私有单位。它不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而是在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公有制范围缩小的一种结果。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的生存不再需要氏族群体的合作，可以在较小的单元和群体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这是由氏族社会分裂为家族社会的主要原因。但是个人要在自然和社会中生存，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单靠个人的劳动无法完成，合作还是其所能选择的唯一方式。而结成夫妻关系的男女在家庭中达成一定的分工合作，足以满足这种需要——家庭还是公有制结构。这一论述在不同程度上，同样适合宗族和家族企业。

在这里需要对生产力和家庭以及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作一个小结。我们认为，家庭在整个社会中，是一个最小的经济私有单元，也就是说，在对社会财富的占有上，家庭与家庭之间存在各种物质财富和人身依附上的私有关系。作为一个最小的经济私有单元，它同时也意味着家庭财富为成员集体所有，是一种公有制形态，而不是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家庭内部存在私有属性。这其中主要的差别在于对生产力、生产关系、氏族部落社会、家庭之间的看法存在不同。恩格斯认为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私有制的产生，并且公有制随之完全毁灭。我们认为，氏族部落的公有制形态的维持，是由于低水平的生产力所形成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为了获取足够的食物和物品，生产力的低下要求部落全体成员的协作。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过小规模的合作，氏族部分成员就可

以独立生存（游牧民族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导致氏族公有制朝家庭私有制转变，而家庭内部依然保留氏族公有制的特点，即共有特性。换句话说，私有制的出现不是因为剩余产品，而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较小的群体协作就可以维持生存所导致。并且，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相对缓慢，它没有也不可能突然造成公有制的完全破坏，而是让基本的公有制单元越来越小，但这较小的社会单元和以前人数较多的氏族群体相比，对成员内部来说，在性质上，不存在本质差别——它还是公有制群体。

上面提到，生产力的发展，让氏族部落中的成员以家庭的方式独立起来，氏族内部的分配方式不再由族长或者氏族成员共同主宰，而是由家庭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从而氏族部落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那么，作为私有单元的集合体，氏族部落已经不再承担现在由家庭承担起来的氏族成员生存任务，那么，看上去，它仅仅只是家庭的简单集合，由于家庭本身可以独立生存，它就不再有存在的需要了。或者说，氏族公有制的形态，除了向家庭公有同时社会私有的模式转变，还会不会有其它的情况出现？公有制还会不会出现或者保留在家庭之外的某些领域里？

我们上面所谈到家庭的独立生存，还仅仅只考虑到微观生产力因素，它在普通和日常情况下，完全可以由家庭自己完成。但是，一个家庭在它的生活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可能完全自己独立解决，例如一个家庭成员都生病了，它就需要其它家庭的照顾，而且，社会的大分工也要求家庭之间发生交换。不然这个家庭早就脱离这个部落，不受约束地独立生活了。同样，一些有益于社会成员整体，但单个家庭无法完成，需要部落全体成员协作的事情总会发生。而这样的一些需要和要求，使得在家庭之间必须有一个协调机制，这样就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来领导和履行这一职能，这导致国家的出现——社会需要一个履行公共职能的机构。而它产生的方式和演变模式的不同，就构成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明，如古希腊文明和儒家文明。

B.2.3 国家的形成

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逐渐从部落中独立出来，氏族部落作为一个集体，全体成员集体参与的社会生产方式逐渐消失。这时候，氏族部落内部，分配不均和私有制开始出现。但是，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独立，并不意味着家庭可以完全脱离部落独立生存。在获取生存资料的过程中，少数的群体永远处于弱势状态，在自然灾害、社会保障、抵抗外敌或者资源掠夺等方面，人数众多的部落永远比单个家庭具有更多的优势，即使由单个家庭形成的独立单位存在，它也会被迅速淘汰。也就是说，氏族部落还承担有家庭无法执行的社会功能。但这导致巨大的问题。

以家庭为单元的氏族部落，由于要实现一定的社会功能，例如治水、组织救火、与邻近部落战争、处理家庭之间的纠纷等等，由于这些事件的出现往往具有不可预料性，不可能在事件发生时，临时由家庭之间进行协议达成一致以后来处理，它就需要一定的稳定社会组织机构或者公共权力机构来履行这一功能。所以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来维护部落整体的社会利益，而这样的机构的，就是在家庭成为独立经济单位后的部落，在这种情况下演变成为国家。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上层建筑，是社会政治结构的一部分，不能纳入生产力系统。但是，国家的公共功能，例如治水赈灾等等，实际上同样反映了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以前，这种依靠国家来组织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要远远超过个人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论述的微观生产力系统，象长城和大运河这样的工程，不可能由少数几个人能够实现，它是由社会大规模分工协作所完成的。国家这时候发挥了巨大的生产力的作用。这就说明，除了马克思论述的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所组成的微观生产力系统外，还存在一种宏观层次上的生产力系统，它是由国家权力机构组织管理下实现的。而这种宏观生产力系统，具有家庭和企业无法完成的社会功能，它是由全社会成员共同协作下的一种结果，也就是说，氏族部落当初的社会生产力功能并没有完全由家庭所取代，还有一部分残余在国家权力机构里。社会生产力分化为由国家所履行的宏观生产力系统和基于家庭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微观生产力系统。在家庭出现以后，部落演变成国家，其生产力功能退化，但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宏观社会生产力形态出现。

而国家产生于社会走向以家庭为私有单位的时候，那么其首领不再是原始公有制下的单个人，他握有国家权力，但在日常情况下，他也是某个家庭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他几乎必然会利用这一权力为其个人和家庭牟取利益，从而国家机构慢慢衍变成统治工具。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社会，在西方社会，这一点不可否认。但下面我们将提到，儒家文明在这一点上与西方社会相比，形成极其鲜明的不同特点。

B.2.4 古代中国的所有权形态及其理论 (1)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以家庭为单元的私有单位，它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造就了不同的文明。在古希腊，它产生了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他们的国家概念和儒家的国家概念纯粹是两码事。在东方的中原，部落首领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出现，而把其它家庭看成异类，相反，他把国家看成是家庭的继续，从而把国家看成一个大家庭，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大家长——天子，即《礼记》中的“君天下曰天子”，我们看到，这里“天子”中的“天”实际上就是“天下”，但被抽象化，并包含了祭祀中的神圣色彩。同时，首领把国家的人民看成家庭成员，即“子民”。《礼记》中有“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

部落首领把自己当作家长不打紧，却一下子让传统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理论失去了普遍性。根据我们前文的论述，家庭是一个由家庭成员组成的公有群体。扩大的家庭其公有性质不会发生改变，不论家庭规模有多大，只要家庭中的成员把这个群体当作是家庭，那么它的公有性质就不会变更。施政者同样按照这一思想来执行和贯彻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也就是说，私有制的社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在中国出现。

后文我们将叙述，古代中国社会这种公有制观念，从原始部落就已经开始，并且一直都没有消失。但开始时，这种观念主要体现在图腾崇拜和祭祀之中，直到周朝，尽管祭祀色彩还非常浓，但

第一次以“礼”这一概念，表现出一定的理论形式。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楚庄王问鼎表明当时已经不再是一个祭祀社会。而孔子意识到这一点，他创造了一种新学说，回避了祭祀中的神话色彩（“敬神若神在”，“不知生，焉知死”），改由个人品质和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即系统的伦理观念来重新塑造这一观念，即儒家学说。

近代以来，对儒家学说的解读往往局限于道德礼义层面，这种解读取得了大量成果，丰富了我们对于儒家文明的认识。由于儒家文明中，这种道德和社会模式和其它社会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它的连续性和中央集权模式等等，和其它社会相比，似乎不可比较，这些解读并没有提供比较这些社会的理论基础。要真正区分儒家社会和其它社会之间的差别，我们不能仅仅就道德说道德，就伦理说伦理，而应该考察这些道德伦理中所表达的社会要求、目的及社会本质。

也就是说，儒家的这种理论，到底想实现什么，在《礼记》中，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出于身者，不必为己；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做，是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儒家的终极理想社会：大同世界。

而作为真实社会的一种写照，《礼记》中还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大道之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功，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从上面可以看出，无论是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家，这都只是公有制观念不同模式的表达，只不过前者把社会公有作为一种理想推向极致，而后者则把天下当作家庭来看待，除了后来的家长不肖以外，它还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政治理想，它们体现一种公有制观念。也就是说，作为现实的体现和要求，儒家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所有权理论，它通过一种社会伦理关系，通过这种社会理论的体现者和执行者——君子，来实现这种公有制所有权理想。

在考虑一个社会的性质时，首先要考虑到的，就是它的经济模式，而经济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它的所有权问题。马克思等人，基于对西方私有社会的认识，认为公有制只出现在原始部落和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看不到公有制的其它形态，更不认为社会能够由原始公有制通过其它的高级公有制形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其主要原因是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很早以前出现个人权力的苏醒，他们的国家只是一个管理机构，是个人权力合作的场所。西方文明从这基础上确立了私有制形式，并且用法律条文的方式固定下来。而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来说，个人权力的要求在自然和社会斗争面前，从一开始就被扼杀，所有权作为一个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国家权

力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集体权力，而不是个体权利的总和。

说儒家理论是一种国家所有权理论，不是说它对这种权力的性质发生疑问，它一开始就继承了祭祀社会中的公有制观念，没有对此提出任何质疑。儒家理论是在几乎是无意识认同国家公有所有权的基础上，提出这种公有性质所有权的实现理论。这是一种极其高明而且非常开放的所有权实现理论。首先，它摒弃和回避超人的东西，完全从心理因素和社会关系来阐述这一理论，这使得这一理论没有任何偏执的倾向，没有让中国的意识形态导向宗教社会，而其它任何有公有权诉求的社会，无一不是通过造物主，即宗教的形式来实现。其次，尽管有形式，但它也不是一种形式理论，它的基本概念是“仁”，这里要注意，“仁”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观念，今天如果还从道德的角度认识“仁”，这一概念的社会本质就无法被认识。“仁”的社会本质，其实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公有所有权的要求，这里面既有社会关系的规定，也有个人素质的规定。而这种“仁”的人格化对象，就是“克己复礼”的“君子”，这样，外在形式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就成为君子自然的行为表现，而不是象宗教社会的硬性规定。这让后来的君主，有巨大的可操作空间，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礼”更大程度上是行政制度约束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君子的内在禀性的自然流露。第三，更巧妙的，在对待在“仁”上不合格的人，只是简单地称之为“不仁”的“小人”，而没有进一步提出对“小人”惩罚。这让“小人”有了存在的空间，又被无形限制。“不仁”实际上包含了私有权和独立的个人权利的要求，也是现实的存在。儒家对“小人”的这一温和处理，也就是公有权对私有权的制约，非常成功，个人权利和私有权从此失去了道德优势，由于其存在又被儒家容忍，从而不能从思想上形成对儒家理论的反弹。另外，在君子的人选上，只做“仁”这种个人内在素质上的灵活规定，没有任何外在地位上的要求（性相近，有教无类），为平民参政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这不仅让儒家理论在世袭和科举理论之间保持独立，也为平民政治创造了条件。

优点所在，往往也是缺点所在。开始儒家理论这种宽松的所有权声明，无疑极大增强了这种理论的生存能力，但反过来，它的这种理论由于没有对公有权任何自然法上的保护，表现出强烈的人治色彩。一，对君主，本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但这种所有权声明毫无法律上的责任，至多只有道德上的谴责。这对君主把家长和董事长的位置当做所有权的标志，从思想上认为国家为他个人私有，没有多少约束能力。在这一点上，也就为君主暴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二，对君子，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作为公有权的代表，儒家理论有理论上各种各样素质上的要求，但没有任何西方那种法律形式的制约。儒家理论在这一点上同样无法约束“君子”侵夺公有权和官僚制度的腐败。可见儒家理论不是关于所有权的法律理论体系，而只是公有权的宽松声明。三，缺点也是优点，它一面纵容了君主和官僚的不“仁”行为，另一面，它也给农民起义给予理论上的支持。中国社会最有别于其它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农民起义。每当君主实施暴政或者官僚地主过分掠夺社会财富时，总会随之出现巨大的造反运动。这种起义运动同样不是个人权利的苏醒，而是在过分侵害下，国家公有权的反击，是一种暴力选举行为。这种暴力的目的，和起义军诏告天下的一样，只是想建立一个能够体现这种公有权的政府。中国社会就是这种多方社会力量的角力中延续下来，绝不仅

仅是东方的专制主义。

同时，儒家的公有制理想带有强烈的家族观念。实际上，这一理论完全是家庭观念的外推，用“父父子子”来解释“君君臣臣”，并抽象出它们的共同内核——仁。从它的大同世界中“天下为公”的描述中可以读出，这种“天下为公”也还只是天下一家，和“小康”社会相比，差异就在“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种理论是第一个不需要超人理念来阐述公有权的理论，也是两千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唯一的一个这样的理论。儒家理论后来的发展，将在后文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阐述。而儒家理论既然是一种公有权声明，那么，和现代企业一样，这种所有权的执行需要一个管理制度来实现。而这正是下面所要叙述的法家理论。

B.2.5 古代中国的所有权形态及其理论 (2)

作为所有权的理论形式，儒家基本上给出了相当灵活的表达。但在所有权性质确定以后，一个企业和一个国家立即要处理的就是管理问题了。儒家的“以礼治天下”显然只能作为形式要求，而要实现“礼”最终还是需要一套管理机制，而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通过“法、权、术、势”等这些概念，给出一套给出了最彻底的家长管理理论¹。这里有一点要注意，法家的理论和源自西方的法律完全不同，西方法律的产生是私有权的需要，换句话说，这种法律的目的是要限制国家政权对私人权利的侵害，保障私人权利。而法家的这套理论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管理条例，是公有权的要求，它的任务是利用君主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来削弱地方和大臣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趋势，仅仅具有策略性，没有任何现代立法上的意义。

法家理论和儒家理论从形式上看是非常冲突的，早先的儒家不能说是道德主义，但显然占据了道德优势，在道义上具有巨大的说服力，而法家则是一种赤裸裸的非道德主义。为了贯彻其理论的彻底性，它不惜用“上下一日百战”（《韩非子·杨榑》），“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韩非子·六反》），“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早死者”（《韩非子·备内》）等大量极端言论，从人性自私贪婪的角度出发劝告君主，要治理好国家，最好不择手段。这一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也是为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出的政治思想，可以与之较上下，但肯定没有《韩非子》诚实，从手段性上来说，韩非子的理论也是更彻底更系统更有操作性。

儒家和法家理论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彼此的越位所造成的。儒法斗争实际上是管理权和所有权的思想斗争，也就是家长还是独裁的斗争。这主要反映了儒家公有权声明的监督性太弱，管理者很容易窃取所有权，一旦君主窃取这种所有权，把天下看成自己个人的天下，为所欲为，儒家理论没有反制措施，只有通过同样在儒家理论框架内的农民起义来纠正管理权的侵犯，即“人皆可以为尧舜”和“匹夫可以为天子”。

¹法家真正的称谓，其实应该是礼法家，它就是古老礼法中，法的一面理论化系统化发展。而很久以来，我们把前面的这个“礼”字丢了，所以一直弄不清楚其真正面目。（2013年6月）

尽管对儒家“以礼治天下”的理论非常不满，但法家理论和儒家理论一样，都是那种家族公有制观念的必然产物，这也是人们常说的“真儒家也是真法家”的一个原因。只有一个所有权的社會，必然要求一个唯一的最高管理者和统一的管理机构，也就必然要求一个集权的政府，这是所有权的的要求。而法家理论给这种要求以当时最正确的答复。而法家理论的社会目标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点，法家从现实的角度，给出这样的一种它要实现的社会：“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韩非子·饰邪》），和《礼记》中的小康社会没有什么差别。

中国公有制社会，得以迅速实现和长期存在，法家理论的作用不可替代。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家族公有制社会，仅仅依靠宽松的所有权声明是不行的，还是要从治理上下功夫。而由于选举思想从来没有产生在中国社会，在很长时间也没有从西方传到中国来，法家理论作为实际管理理论，几乎是唯一的候选者。从法家理论大量运用在中国政治领域来看，这种理论的出现和使用虽然是对礼仪之邦的恶谑，但其巨大的济世功能不可或缺。而且法家的理论尽管是为了集权所推行的君主独裁理论，但要把它和那种专制主义区分开来。法家理论所针对的对象，或者说专制的对象，并不是社会大众，而是制度内的官僚。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有“明主治吏不治民”一说，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中，这种公有制度一大败坏因素就是吏治，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另外，为了下文行文的方便，也是儒家和法家理论，即公有所有权和管理问题的一个应用，这里补充论述关于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和分封制度的问题。关于分封即封土建邦制度，我们存在两个误解，一是把中国的这种封土建邦制度和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等同起来，实际上性质完全相反；二是认为只有在周朝和周朝以前才出现过这种封土建邦制度，实际上它一直存在，贯穿整个古代中国。

中央集权和封土建邦，形态上存在巨大差异，但从其本质上来说，却是一贯的。之所以出现两种相当不同的形态，是公有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所导致。首先，分封制其实是中央集权的开始，而不是为了建立象希腊那样的城邦制度。从各种记载来看，诸侯割据是一种实际存在状态，不需要分封，分封实际在某一诸侯具有最强大的实力以及祭祀上的优势，迫使其他诸侯臣服的结果，但这一诸侯又没有足够实力来完全吞并其他诸侯，而且即使暂时吞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也不可能采取后代中央集权制度治理的一种结果。从黄帝征服炎帝和蚩尤开始建立中央权力开始，中国的这种家族公有制基本上就已经形成，只不过到了夏启开始了君主世袭制，并没有改变制度本质，在没有其他制度取代的情况下，世袭可能反而减少了争夺君主位子的残酷斗争和带来的分裂。

中国的这种分封制，首先要看到一个中央政府的存在，这种中央政府就是全社会家族所有权的代表，没有人表示反对。反对者往往只是为了夺取这一权力，而不是争取私有和独立，因此社会公有权在这里第一次被确立，虽然更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的；其次要看到诸侯割据的现实，这里要特别注意，和希腊城邦截然不同，诸侯所拥有的只是实际使用权，不具有任何合法所有权的意义，否则就不可能有那种中央政府的存在。这里，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中央政府拥有名义所有权，诸侯拥有实际使用权。我们看到，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原因不是别的，集权是公有制

所有权要求，分封是生产力的限制。在生产力逐渐发展的情况下，诸侯所拥有的实际使用权逐渐被一个新兴的中央政府剥夺，从而中国历史一直在向越来越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政府过渡。

此外，分封制贯穿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过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中央集权政府势力的不断加强和占有的地域越来越大，分封的范围也在地域上也越来越广。在汉代，征服完匈奴以后，实际采取的就是分封制度，直到清代，对西藏和新疆等地所采取的还是本质上和周朝完全相同的分封制度。而今天中国的一国两制政策，其实还是这种分封制度的继续。这种分封制，其实是这种社会公有权的一个必然性质，将在后面的对外关系中进一步阐述。

下文我们将就这种家族社会公有权观念的发生发展，以及它在整个社会历史过程中与其他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给一个简要图像，说明一下古代中国的演进过程。

§ B.3 古代中国历史简述

B.3.1 华夏文明的起源

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表现在这种公有观念的发生、发展和与其它自然社会力量的斗争中，主要有生产力因素、游牧民族、自然环境、实际私有权（诸侯和势力割据等）、官僚制度、君主世袭、人口因素等。但几乎直到清末，这些力量大部分都没有消失，始终左右、制约和促进着中国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

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希腊文明的起源根本不同。希腊文明产生于这样的地理条件，在希腊和亚细亚沿海地区，连绵不断的山脉把陆地隔成小块，许多小城邦就这样彼此比较隔绝，独立的产生。这些城邦一般设在土地比较肥沃的地方，他们过得非常舒服，很长一段时期并没有外界力量的侵夺。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注意自己的肌肉，发展出极为璀璨的文明。直到这个文明基本形成以后，才有波斯人长期和他们发生接触。

相对于希腊文明，华夏文明产生的条件可以说太苦了。这些艰苦的条件恐怕是华夏文明和希腊文明存在这种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被大家普遍公认的观点是治水造就了这样一种结果，但本文不这样认为，如果仅仅是自然原因，华夏文明极可能是一种宗教文明，用一种人格化的超人力量来解释所发生的自然灾害现象。但华夏文明明显是一种无神的文明，而且治水也解释不了为什么长江流域没有随着黄河文明的出现也进入文明时代，至少它们的水利条件差别并不是非常特别巨大。所以治水和自然因素虽然可能是华夏文明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作者认为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游牧民族。考察华夏文明的起源地黄河流域，除了自然环境比长江流域恶劣以外，它还有一个更显著的地理特点：和草原接壤。而草原是游牧民族的栖息地，游牧民族具有特别强的游动性和攻击

性，在后来的中国社会里，游牧民族也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与草原接壤的后果就是农业居民非常容易受到游牧民族的侵夺，这导致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就是农业部落长期大规模的迁徙。这种迁徙必然导致战争不断产生，同时为了纵深阻击游牧民族的侵夺，也需要一个集权社会的出现。而这种集权社会由于主要是看得见的社会原因所导致，不需要人格化的超人力量来解释，这会让文明产生时明显带有无神论的观念。而黄河以南，由于黄河的阻隔，以及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游牧民族无法进行足够的纵深行动，这保障了长江流域的安逸，同时，也让这些地方缺少了文明产生所需要的刺激。

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作战的工具也就是石头和木棍等，部落之间的战争，很少能够完全杀戮和征服，同时也是抵抗游牧部落的需要，往往只是要求臣服，建立一个形式上的统一政府就达到了目标。从中国的图腾物——龙也可以大致说明这一点，它很可能是部落在征战中，某个部落臣服了另一个部落，就把两个部落的图腾物放到一起，在这样的长期征战中，许多不同的图腾就糅合在一起，最终构成龙的图像，社会公有观念其实也是从这时候产生。和我们现在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不一样，那时候中原要赢得战争统一诸侯，抗击游牧民族，必须要最强悍的意志和力量，即使说血腥残暴也一点不过分。中国没有神话传统，流传下来的古代神话，很可能由于认识水平的不足，所形成的扭曲历史记载。这种神话，没有宗教色彩，但都非常阴郁沉重，例如黄帝和蚩尤大战，蚩尤被九解；化乳为眼，以脐为口，持干戚而舞的刑天。和其它文明的神话非常不同，这种神话几乎没有自然神的观念，“天”是一种非常淡漠、很少考虑的客观力量。相反，这种神话中，表现出一种决不妥协、征服一切、坚韧冷酷的人的意志色彩。而在那种原始条件下，要通过征服各个部落，建立一个家族型公有制社会，这种意志品质是最重要因素。这种意志产生以后，好像对一切都毫不畏惧，在中国古代，没有任何记载记录华夏文明曾经对某种客观事物膜拜。实际上，这种意志一产生，就对自然没有任何畏惧感——开始了大规模水利建设。

个人认为，如果在文明形成时，如果自然的破坏因素一开始就大于社会的破坏力量，这种文明很可能出现对自然的崇拜，朝宗教社会发展，治水不应该是中国这种无神公有观念和中央集权制度产生的原因，相反，它是这种观念形成以后，实施的改造自然的行动。从各种历史资料来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曾经在自然面前表现出如此强悍的意志。从中国神话中来看，中国最开始的这种大规模治水活动，只是因为洪水滔天，就要去治，并没有经过专家的科学论证，说一定能取得成功，鲧就是因为九年都没有把水治好被杀的。而且我们看，鲧所采取的治水方法对天地也丝毫不知敬畏——他堵，堵了九年，后羿对太阳同样不客气（何新先生认为中国崇拜过太阳神，未必。中国的自然观念中，只对一个无法施加意志的“天”有所敬畏，至于“天”的下面，就是天下，有天子在掌管）。鲧失败了以后，这个文明的思想观念中似乎从一开始就铁定认为“人定胜天”，鲧的儿子大禹又接替了治水的工作，十三年的时间，这次他成功了。中华民族的这种意识还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可以看出来，当别的文明还在膜拜神的时候，华夏子孙居然有了保护自然的观念——自居为自然的主人。从这里看，这种强烈意志力量的来源未必是治水，很可能出自游牧民族侵略的刺激。这种主观性在公有制观念形成过程中，应该起着决定作用。

但是治水和抗击自然灾害，却对这种公有制观念起到了非常大的巩固作用。大禹治水杀一个诸侯首领防风氏，显示了这种治水工程对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在长期的治水过程中，大禹巩固了自己的实力，可能由于方法更为合理，并且可能在各个部落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合作的结果，大禹治水获得了成功，并建立了第一个世袭集权王朝——传说中的夏朝。从夏朝、商朝到周朝，中国社会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王朝的更迭原因更可能是诸侯由于摸清了中央政权的底细，从而篡夺政权的结果。象商汤和周的姬昌，就都曾经在中央首都被囚过之后造反的。当时天子其实也只是个诸侯，因此汤和姬昌，由于这种经历，摸清了他们的底细，联合诸侯很快就把天子推翻，重新建立一个形式完全一样的王朝。

这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天子所代表的天下公有权，一直都没有也无法对诸侯领地的实际控制发生革命性挑战，社会形态主要是根据这种实际控制所决定，从这些王朝到各诸侯，实行的都是世袭制度。尽管社会形态变化不大，但社会微观生产力方面在这期间发生了深刻改变，在商朝青铜器开始出现。到了周朝，青铜器在社会生产中被普遍应用，结果是生产效率迅猛提高，快速拉近了诸侯与诸侯之间的距离，竞争开始了。除了生产力因素，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大威胁的游牧民族（山戎等），其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西周向东周的过渡，就是游牧民族的侵袭所造成，根据史记记载，在商朝也出现过多次迁都的现象，这其中，游牧民族的因素可能非常大。

B.3.2 华夏文明的成长与成熟

封土建邦

从西周东周，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无数的战争，华夏文明在这期间经历了成长、爆发剧变并最终在汉代走向成熟的过程。生产力的大发展对社会变革产生了基本的影响，而在这种情况下，诸侯割据竞争的局面，又反过来极力刺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中青铜器和铁器的普遍应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段时间的史料相当丰富，政治军事斗争、法律道德、礼仪习俗、学术思想、经济状况、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等，层出不穷，我们主要就本文相关的部分重点阐述。

尽管出现诸侯纷争的局面，但作为“天下”的象征，周王室一直受到尊重，直到天下局势完全失衡的情况下，才被秦王朝吞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纷争局面并没有对“天下”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提出挑战，当时那种纷争状态被看成是一种非正常状态，在这种认识下，各诸侯所实施的战略其实都是吞并、统一天下的积极战略，而不仅仅维护自己的独立。一些新兴的诸侯，在一开始没有得到东周的承认，只有在壮大以后才被周王朝“封”为诸侯，而从这些新兴诸侯欣然接受这一封号来看，表明他们对这一观念也没有提出异议，他们的加入反而更加巩固了这一观念。象齐桓公，就打着“尊王攘夷”的名号，九合诸侯，而王室封之为“侯伯”，就是诸侯里的大哥，而越王勾践也曾被封为侯伯，秦到秦襄公的时候才被周王室列侯。

非常有趣的是，象楚这样的新兴大国还为封侯闹意气，一开始自称“蛮夷”（《史记·楚世家》），

自封为王，在强大起来以后，反而抢着要周王室封其为诸侯，除了摆谱（“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还不惜以武力相逼，“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不仅如此，当时周王室还很不情愿，直到楚成王时，“使人献天子”，这样才有“天子赐胙”。新起的政权逼着周王室封其为诸侯，在今天看来，好象很愚蠢，但在当时其实际利益并没有丝毫损失，相反，有点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下，与世界接轨，接受世界新观念，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味道。至少让他吞并天下时，减少了阻力，不被当作异类看待，获得更多法理的支持。从这里我们看到，这种一统的观念，就是所有权问题，没有在这种纷争局面下被质疑和破坏，相反，由于更多诸侯的加入，更加巩固了这一观念的政治和地缘基础。从此以后，这一观念就已经成熟，再也没有受到挑战。

由于这天下一统的观念没有受到挑战，诸侯所拥有的就只有实际使用权（被当作实际所有权）。由此，诸侯之间的征伐，只是家庭内部的兄弟争斗，而不是从所有权上侵夺他人财产，这样，这种征伐得不到来自法理上的否定，除非出现一个最强大的政权代表所有权要求抑制这种争斗，否则诸侯之间的这种征伐不可能停止，这就必然导致政权的集权趋势。这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诸侯之间的频繁征伐和诸侯国内部政治的剧烈变更都在要求一个真正能代表公有权利益的政权的出现。由于周王室已经很弱，它没有足够的政治实力承担这一任务。而在诸侯国内部，世袭和分封制度成了需要突破的瓶颈。我们前面提到，世袭和分封，只是在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的条件下，所有权对实际使用权的妥协，而不是最终的社会状态。因此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必然会提出变更的要求。

在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以前，从《史记》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诸侯之间的征伐已经是愈演愈烈，诸侯国内部弑主作乱的事情也层出不穷。对一个诸侯国来说，外部矛盾要求它必须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而内部的弑主作乱等这些事情也要求抑制大臣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趋势，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变革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从富国强兵上来说，有理论记载的主要从管仲开始。由于当时的中原，处在一种事实上的封土建邦状态，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封建社会模式（由于所有权问题，这种状态仅仅是形式上相似），这样，要突破这种体制，就必须是引入商业机制，实行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实际上管仲的经济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例如“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管子·侈靡》），这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搞市场经济啊，就是促进就业。就业搞好了，国家就富强了。经济搞好了，其它的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不提倡消费，经济就搞不好”。并且他不仅有这种商业思想，似乎对这种社会有非常深的宏观把握。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管子·轻重》中，他不仅强调对经济的调控，而且还利用市场经济的缺点来打击和吞并其它诸侯，例如对衡山等国所实施的经济战略，跟美国对伊拉克所实施的经济制裁如出一辙，不同的是，管仲通过他的经济战略，诱使衡山国采取单一经济模式。从这里看，作为对封建社会经济模式的突破，即所谓的商业经济模式，在战国时代普遍存在，它极大地刺激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增长，但是，这只是形式上的资本主义。在管仲之后，还有很多人都对经济变革作出贡献，例如晋文公的赋税制度改革等等。

土地分封制度除了不再符合经济上的要求外，也不再适合诸侯生存和争霸的需要，而且它同时也是对政权本身的威胁。土地的分封，不仅削弱了诸侯自己的实力，同时，它也使异己的势力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基础，弑主篡权，犯上作乱的背后，就是这种分封制度下政治力量分裂，这给诸侯的内政带来多方面的不稳定。从诸侯本身的需要来讲，集权是首要的任务，分封制度被取消是必然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城邦的所有权归城邦领主所有，诸侯首领并不拥有这些城邦的所有权，而战国与西方完全不同，诸侯首领只要有实力，他就可以取消分封制度，没有什么观念对此质疑，这一点是比较东西方差异的基本点。

作为取消分封制度，走向集权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晋献公大批诸杀公族内的群公子，起用异族，当时杀了同宗的公子约几千人，这只是一次集权改革的尝试，还存在很大的弊病，异族后来的崛起导致了三家分晋。后来的诸侯一次次吸取前面这些改革的教训和经验，逐渐完善诸侯国内的集权制度，直到秦始皇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而世袭制度也随着分封制度的取消逐渐被打破，诸侯国逐渐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招募人才。诸侯国本身只是周王室，即一个家族社会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国别问题不象今天这样明显，这为人才在诸侯之间的流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到处跑官的。这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个大规模人才市场，有需求就有供给，理性取代祭祀，儒家、法家、纵横家等等百家争鸣，跟菜市场没什么差别，就是喧闹的市场局面。但就人才繁荣的局面，构成了华夏文明跟其它文明迥异的特色，并奠定华夏文明的底蕴。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平民早早就深度参与政治了。

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变革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展开，军事上的改革由于这种竞争的需要，走在最前列。胡服骑射，孙子兵法，法家寓兵于农（即全民皆兵）等思想和举措在诸侯的军事改革中被广泛应用，加上铁器和弩的使用，从战略到战术，中原的军事能力这时候达到一个历史高峰，尽管没有火器，在很多方面并不逊于鸦片战争时西方的军事实力，可以一较短长。中原的军事措施，很多都和游牧民族相关，例如齐桓公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长城的大量构筑，这种占据历史显著地位的军事行动，都在表明在战国期间，游牧民族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一直对中原构成巨大压力。

中央集权

秦国统一中原，法家在国家管理上的思想功不可没。但正如法家的公有权思想非常淡漠，这导致统一的中国其所有权的归属成了问题，秦始皇显然在所有权问题上犯了错误，以民为黔首，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天下。尽管修筑长城对中原的安全有巨大帮助，集权也是面对游牧民族和诸侯战争的制度需要，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但家族公有权的要求显然没有得到满足，到二世胡亥更是如此，“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这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轮对政权的暴力罢免行为，即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注意“仁义”的所有权内容），起义的结果是秦王朝很快被推翻，西楚霸王项羽暂时获得胜利，但项

羽错误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没有认清社会形势，犯了致命错误，又搞分封制。结果是楚汉相争，不到五年，天下定于汉。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文明所要求的城邦制度，早在此时，已经被淘汰，以后各朝末年的割据状态迅速被中央集权社会取代，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随着分封制度的淘汰，百家争鸣的社会条件也消灭了。

汉代的任务非常多，一，消除分封制带来的分裂和战争隐患；二，在这种家族公有制观念下，确立意识形态正确形式，反映这一观念，并确保政权保持这种公有性质；三，非常重要的，消除游牧民族带来的隐患。为此，汉高祖和汉武帝作出了重大努力，他们为华夏文明稳定走向家族公有制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当时的观念和相当强大政治势力的客观存在，刘邦在集权上作出了努力，“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但还是对现实作了让步，对建立过功勋的大臣封王封侯，但又逐渐收回权力，过程相当凶险。隐患并没有因此消除，家族内部的分封为此提供了政治基础，例如景帝时的七王之乱。直到汉武帝才有了全面的改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措施就是推恩令的实施，所谓推恩令，就是逐步分割诸侯的领地，让诸侯的领地，除了长子获得一半以外，其余的子嗣同样要分得不同数额的领地（注意土地所有权中所包含的继承权由谁来决定）。

这一政策是非常成功的，此后各王朝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政策，这使得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势力割据的形式急剧减少，而主要表现宫廷的内部斗争，这大大减少了这种权力斗争的社会危害性，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反映了家族公有制的一个特点，即权力集中于一人，而不是一个家族，所以把天下当成这一家的天下，从这里看，存在问题，实际上，皇帝富有天下，皇族里面成为农民做苦力的多得很，象小贩刘备就是一例。但集权对分封的斗争并不那么容易就取得彻底胜利，前门关上，分封的其它形式从后门又再次进来，例如唐朝。唐代的节度使在实际政治运作中，逐渐掌握其所控制地域的所有军政大权，演变成地方独立诸侯的角色，这导致了给唐朝摧毁性打击的“安史之乱”。

汉代也为中国真正实现家族公有权制度模式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刘邦时期，汉代采取了儒家礼制的形式，这种仪式让刘邦很是高兴了一把（“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但意识形态还非常混乱。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发生了彻底变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这个人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的理论可能是弥补家族公有制缺陷最好的一个理论，在根本没有选举思想的情况下，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在可能的范围内给君主带来最大的约束。这一变化是革命性的，家族公有制以全新的模式，在这种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上得到承认，确定它为主流意识形态，而文官制度的确立，被成为中国的第五大世界发明，也让国家人才的选拔从过去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社会模式，走向制度化模式。从此，带着大量社会下层信息的平民开始制度性地参与了国家政治，这一过程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而一个稳固的家族公有制制度也由此系统确立，影响着古代中国的整个社会历史过程。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汉代抗击匈奴大概

是今天的青年谈起来最眉飞色舞的一段历史，在抗击游牧民族方面，它确实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辉煌。关于汉代西征匈奴的历史，网络爱国青年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而且搞不好还来上些“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话，壮壮行色。为了节省点笔墨，关于整个征讨匈奴的历史经过，《史记》和《资治通鉴》等记载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再提及了。这里主要就汉朝征伐匈奴的军事方面再说几句。

韬光养晦、发展国力，致使国家的财政实力非常雄厚，弩的广泛应用等这些条件，都在汉征服匈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更突出的是，是它的战略决心和全面采取“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战略。从历史上看，中原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一种劣势的军事地位，不得不采取防御的战略方针。而汉代是一个例外，它的战略决心非常坚定与持久，与匈奴的战争持续了一百多年，最后才获得决定性胜利。其次，汉代对匈奴的作战模式，不是依靠城池和阵地战，而是和匈奴一样，通过机动游击作战最终取得了胜利。游击作战方式必须要马匹，而马匹在农业社会中，主要只起到交通工具的作用，但汉代一直培育马匹，大量养马，并不惜千金向大宛买马，并为马匹发动战争，可见他们贯彻这一战略的决心。农业社会要想赢得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而汉代做到了这一点。但马匹这种工具，在农业社会中的作用并不大，所以一旦战争结束，马匹的数量和质量立即减少，由于草原的原因，游牧民族却会在不长的时间里，恢复力量，导致这种斗争不可能从根本上结束，并且游牧民族大部分时间具有攻击性上的优势。

就这样，秦始皇把中原统一在中央集权制度下，汉武帝一方面确立了儒家的理论统治地位，建立完善了一整套文官制度，同时科举制度又为朝廷招揽了大量带有社会基层信息的人才，而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又保护和巩固了这一成果。这样，中央集权制度的家族公有制形态就此完全确立，华夏文明这时候已经基本成形。在后来的岁月里，华夏文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从唐朝到清朝，继续独立地调整、巩固和发展。这种发展在从制度到理论和文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一直在进行。

B.3.3 华夏文明的巩固与发展

在汉代以后，华夏文明直到清末，经过了一段漫长曲折的巩固和发展阶段，但绝对不是所谓的文明停滞时期。在汉代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家族公有制社会形态，有君主世袭，文官和科举制度，中央集权，开明等级等各种特点。从后来的历史看，尽管没有民主政治，它还是一个非常稳定和能够自动调节的政治大系统，它的协调适应能力非常强，即便与西方的民主政治相比，它的先进性和和谐性也毫不逊色。其实，能让民主制度能够在西方健康运行的基础原因，并不在民主制度本身，却恰恰在后来被嫁接到欧洲的基督教身上，这后面解释。华夏文明在这一段时间里，要生存下来，肯定会接受来自各种自然社会力量的考验与冲击，事实也是如此。我考察的结论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我发现，真正对这个中央集权的家族公有制社会形成挑战的，不是君主暴政，也不是官吏腐败，甚至不是游牧民族。当然，这些因素对华夏文明构成重大影响，但它们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真正阻碍这个家族公有制社会迈向更高形态的，恰恰来自它本身的优越性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缺陷。换

句话说，它的能力过早地达到了，但认识没有达到，结果其能力反而抑制了文明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今天的这一认识，这一点我们后面讨论。下面主要就这段历史中，这些因素对华夏文明的影响以及华夏文明的反应进行一点说明。由于这段历史比较长，本人的学识、时间和占有的历史资料都决定了无法对它进行细致阐述，所以这里主要挑选一些关节部分，稍稍论述一下。

华夏文明的稳定性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均势和稳定的国际政治结构，如果没有一种力量超越这种政治现实，那么它几乎不可能被打破，真实的历史是它并没有逃过统一的局面，这表明华夏文明的内部分裂已经不可能了。那种天下一统，而且只有一个正是统的家族公有制国家观念已经彻底溶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只要分裂，就会战争不止，不达至天下一统的局面决不罢休。后来所有王朝颠覆过程都说明了这一点，一个王朝倒台后，往往有几个势力割据，但它们之间从来没有和平共处的先例，最后都是唯一的力量生存下来，统一了全国。和古希腊罗马文明不一样，这种文明的延续性中的内部决定因素，从一开始就解决了。在后来的历史中，还存在各种变数影响着华夏文明的发展，但没有一种因素对这一文明产生真正的挑战。

游牧民族的影响与贡献

五胡乱华的南北朝，这是游牧民族对华夏文明冲击最严重的时期，然而，这一冲击不仅没有给华夏文明带来伤害，反而给华夏文明补充了新鲜的血液。这里有几点值得说明一下，一是游牧民族的汉化，二是华夏文明让人吃惊的包容态度。有兴趣的，而且想深入一点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建议看看葛剑雄的《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该文谈得比较详细，这里能省事就省事，不再详细介绍。但是他忘了一点，就是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不同，游牧民族的汉化获得了华夏文明的承认，而葛剑雄得出的全盘西化的结论却完全无视西方文明的排外性。而对外族的包容性却是家族公有制社会观念的内在属性，正是华夏文明这种让人惊叹的开放特性，才使得大融合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一直发生，中华民族一直壮大。

游牧民族的汉化或者说被汉族同化，不能过分强调华夏文明的同化功能，而是她相对于游牧民族的先进性所导致。后来的金元清等游牧民族在汉化方面，其命运都大致相似。其主要原因都是由于游牧民族基本上没有文明，而只有习俗，被华夏文明同化不可避免。只有在后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和辐射，才在较远的游牧地带建立起类似国家制度。

而且这些游牧民族在华夏文明的贡献上，其作用并不见得小于农业社会。例如佛教的传播，主要就是南北朝时期，鲜卑民族本身信奉的就是佛教。更重要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总会把游牧民族的强盛军事攻击能力和农业社会的财政能力和技术结合起来，形成势不可挡的国防力量，拓展大片国土，为华夏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实际上，汉朝取得对匈奴的胜利就是采用了游牧民族的游击战术，而唐王朝的统治者本身其实也是鲜卑血统，他们在所谓五胡乱华过程的一

轮新一轮汉化中成为汉族的。唐朝在军事上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特点，它的远程军事投送能力非常惊人，甚至达到今天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而后来的元朝、清朝更不用说，即使不包括外蒙古和外兴安岭，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国土也还是清王朝的贡献为多。而以宋明为代表的纯农业王朝，往往由于缺少游牧民族的那种自然军事能力和农业社会的保守防御性，对游牧地带重视不够，在拓展国土方面作为很小。

儒家理论的继续发展

在孔子和汉代以后，儒家理论没有停滞，一直在继续发展，到达宋明理学时期达到一个顶峰。应该说，在汉代以后，南北朝、隋唐这段时间，家族公有观念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巩固，但这段时间儒学本身的发展并不明显，处于一种潜伏时期。相反，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却颇为盛行，为后代的儒学发展作了准备。很多人把宋明理学的发展看成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倒退，把它批判为吃人的礼教¹。但我以为，就理论本身而言，这是儒学的一次革命性进步，也是儒学发展必须经过的阶段。宋明理学，说穿了，就是融合了佛学和道学的理论，把儒家的社会学说推到一个更高层次，想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用一些“心、性、气、理”的范畴，形成一个包容社会和宇宙的统一的 worldview。换句话说，它企图通过理性，把早期儒家的世俗法发展为自然法，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严密理论体系，并用最高的自然法则（天理）来规范社会行为（人欲），也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学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理论的发展似乎总要经过经院哲学阶段（比照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今天科学的繁琐化）。宋明理学在经院时期，穷理尽性，几乎把宋明理学发展到一个极致。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完整的意识形态法理化尝试，宋明理学把宽松开明的儒学教条化理念化。从它本身来说，这种法理化获得了巨大成功，宋明清这几个王朝都采纳了这种理念化的意识形态。但是同时，它抛弃了早期儒学的上下关系上的灵活性，即君君臣臣的关系是相互的，君不以君道待臣，在这种情况下，早期儒学并没有规定，臣必须以臣道待君。而宋明理学则把下对上的隶属关系极端化，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在这种理论中，社会丧失了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

宋明理学对中央集权有杰出贡献，但丢失了家族公有制的开明基础，让儒家学说的家族公有制的公有性质蜕变成一种首领所有制。但家族公有制社会和儒学本身具有非常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清初的黄宗羲戴震等人已经看到了宋明理学的极端性，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原君》），重建儒家“人学”，对宋明理学进行纠偏，开始了儒学的新一轮发展过程。

由于西方的入侵和五四运动的阻隔，我们不清楚传统儒家文明的理论发展如果按照自身的规律，究竟能达到一个怎么样的高度。其理论的发展会不会最终形成对君权的制度性制约，从而进入

¹今天看来，宋明理学就是礼的宗教化发展，是彻头彻尾的礼教纲领，是地缘意识退化带来的文明倒退，就是吃人的。没有地缘变局在文明层面的深刻刺激，民权观念就不可能灌输进礼教笼罩下的华夏文明之中，明末清初所谓思想家，把亡国责任全部推到君主和民众头上，终究不过是礼教替自己脱罪的由头。

一种人民公有制社会，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华夏文明开初至清朝末年，这种家族公有制思想并没有什么本质性改变，期望它过渡到西方那种完全基于私有制的社会观念，根本就是妄想。

关于华夏文明的成长与成熟过程，大致就说这些。为了减少重复，其它内容将分别放到家族公有制社会的特点和专题中讨论。

§ B.4 古代中国的社会特征

B.4.1 文官科举制度和平民政治

中国的文官制度，是近代以前世界上最高效的政治制度。从中国起源的这种制度中，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社会与其它文明比较中所表现出来的最迷人的差别。各个朝代的政治系统，其官吏的产生都是由各级学校的培养，由科举考试选拔等一系列程序进行，这样产生的官员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并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具有具体解决能力。官员的升迁也由官员的资历和政绩来决定，同时朝廷内部还有庞大的监督弹劾系统，处理各种违法违纪问题。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政治系统，现代社会的文官制度也是效仿古代中国的这种文官制度而来。

和现在的社会政治系统不一样，关于这种文官制度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一种效率系统，而不是权益系统。它不是为了个人的权益服务，而是为了更有效地解决社会事务和问题。这至少又表明一点，文官制度同样没有对大一统观念提出质疑，相反，它的高效还模糊并掩盖了所有权问题。这至少又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公有制性质的一个特征。而公有制特征，从与文官制度紧密联系的官员选拔制度，即科举制度中更强烈地表现出来——它把一切政治权力返给了全体人民。

古代中国光辉的一页，就是从汉朝开始，人类史上首次从制度上实现了最广泛的平民政治，只要你有足够能力，无论你出身如何卑贱，一样可以出将入相。中国平民参与政治，几乎从华夏文明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是华夏文明中公有制观念中的必然结果。作为家族公有权的代表，古代中国的天子（以及诸侯），由于选举制度不可能，异姓交接往往又过于血腥，成为唯一的世袭职位。而其它的政府职位，基本上都不是世袭的，其合格人选往往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德行，“选贤与能”，在全社会招聘，甚至连奴隶都不放过，象战国时期的百里奚（以前是虞国大夫），就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的奴隶，这种事情在战国以前也出现过多次。只要有才能，不论他是什么身份，都可以参与政治，隋朝以后，由于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实施，平民乃至极贫困的农民都广泛参与政治，象头悬梁（孙敬）、锥刺股（苏秦）、囊萤（车胤）映雪（孙康）、凿壁偷光（匡衡）、划粥割齑（范仲淹）这些成语无一不是贫困甚至极度贫困的平民通过苦读参与政治的写照，而范进的疯癫、孔乙己的迂腐更广泛说明了古代中国这种平民政治的特点。只要涉及政治和读书，儒家文明都首先

从道德和才能上来给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从这些主张中完全看不到对个人的财产和等级的要求。今天很多人都在说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不好那不好，可和希腊文明以及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比较，这种制度的平民特点就立即显现出来。

但是，这种平民政治的精英选拔模式，并没有确定，也就是说“选贤与能”的方法问题，还没有解决。在战国以前，由于生产力和分封制所限，官员的爵位主要还是通过世袭来继承。到了战国时代，开始主要是行政官员的举荐，到后来逐渐形成了人才市场，各色的人才通过自我推荐和政府招揽等多种途径进入政权系统。那真是绝世无双的宏大热闹场面，魏国人可以去秦国做宰相，甚至苏秦一人“并相六国”，牛得一塌糊涂。我就有点纳闷，那时候的君主是不是也经常搞些人才招聘会，甚至来点招商引资什么的，呵呵。在秦国统一天下以后，人才市场的政治空间也消失了。这时候如何选拔人才就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实际上经过几千年，人才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中央集权制度下，政治官吏人才选拔的制度化，从汉代董仲舒开始，举秀才孝廉，举孝廉是为了道德教化，举秀才则为选拔能干的官吏，如果所有制度都能按照它的本意执行，天下大治倒也可能。但察举大权掌握在州郡等各级官吏手中，吏治缺少监督，一败坏，士人和官僚望族勾结，也就有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魏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玄学清谈，跟这种举贤制度就很有关系。直到隋朝确立了科举制度，情况才有所改观。

选拔人才的模式最后被淘汰得只剩下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最能体现古代中国社会的家族公有制特征的选拔模式。应该说，它又是中国对文明延续的一大贡献，没有这种科举制度，儒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不可想象，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有这种凝聚力。科举制度是理解从唐朝到现在，华夏文明颠扑不破的一个关节点。科举制度把古代中国政治的平民性、等级流动性和意识形态一元性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造就了最广泛被接受的单一意识形态和最开放的平民政治系统紧密结合起来的上层建筑。

除了一些戏子之类（倡优皂隶）的贱民子弟，科举制度对社会所有成员开放，王公贵胄的子弟和家徒四壁的穷酸，在科举面前人人平等。这不仅让这种意识形态被最广泛的社会人群所接受，给底层人民的自信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政权输送带有强烈平民色彩的高智商官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把古代中国形容成一个黑暗的专制社会很荒谬，即便在今天，和全世界的所有政治系统相比，古代中国社会也是最平民最开放的政治系统，同时还是个人财富对政权影响最小的政治系统。而这些曾经赤贫的平民在施政时，我们今天却认为，他们会丝毫不顾及底层人民的死活，搞残酷剥削，可能吗？

但这并不是说科举制度没有问题，科举制度的一些问题，历代统治者也有所认识，并作了一些改革尝试，但最终都表明科举制度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不坏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家族公有制的败坏，不是它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而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精英，尽管饱读四书五

经，其个人素质未必符合公有制理想的要求。这还有从儒家理论自身谈起。

作为家族公有制的意识形态理论，儒家的仁，还包含着对人的一种心理品质上的要求。这种仁，更多是通过熟读典籍，身体力行再加上内心修炼才能达到。儒家从这个仁字上，把公有制要求和个人的心理品质以及道德规范（正心修身）结合到一起。实际上，儒生在这种身心的修炼中，感受到的不是束缚，而是愉悦，内心反省和思考过程中的每一次醒悟让他感到满心欢喜。就这样，正心修身实际上是为了执行家族公有制的自我锻炼，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社会实践过程，这样儒家理论实际上就把心理要求和社会要求统一到一起，系统、和谐地表达出它的家族公有制理论。所谓内圣外王，就是这内在过程和外在过程的统一。而科举考试的目的就是企图选拔这样的德才兼备的人格对象，也就是寻找意识形态的执行人，但是有时候事与愿违。

由于宦途之途的利益诱惑非常巨大，不少人也开始学习四书五经，通过这一途径追求名利。这样，他就把儒家理论只当作手段，当作敲门砖看待，挤入仕途以后，儒家典籍中的道德规范就忘得干干净净，更不要说身体力行了一——小人在冒充君子。在这种情况下，监督机制又不健全，官场上就慢慢腐败下去，成为下一次农民起义的导火索。

但不管怎么说，古代中国这种平民参与政治的社会普遍现象，是公有社会内在属性的自然表现。这种现象在古希腊是不可思议的，希腊确立了民主政治，但这种政治和古代中国的平民政治不同。一，它是阶级制度下的民主政治，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在希腊的历史记载中，也从来看不到百里奚这类的事例。二，它是民主政治，不是平民政治，平民的选举权对统治阶层有约束作用，但绝不意味着平民获得了统治权力，在西方，支撑个人政治地位的，是家族的财富和影响力，而不是他个人的智力。在比较东西方文明的时候，这种明显的差异必须要仔细考虑，切不可一概以封建论之。

关于文官和科举制度，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文官制度无论有多么高效，都不可能真正改变社会形态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尽管通过这种方式，企图实现社会的公有制理想，但生产力的水平限制了这一点。二，近代中国科举制度的取消，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取消科举制度，破坏了朝野的互动，政权系统开始迅速腐败；知识分子游离于政权系统之外；在农村，作为精神领袖的儒学乡绅，其社会地位开始丧失，他们一直维持的农村田园特性也不复存在，让位给新潮领袖黄世仁们。知识分子的愤懑和黄世仁们的残酷阻隔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正确认识。正如今天一样，农村的智力资源还是一直单方面向城市流动，而不是象古代中国社会一样，告老回乡的官吏始终不断地对农村社会进行智力再投资。

B.4.2 古代中国的社会等级

中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即使中国社会分化十分严重，但阶级不构成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特点。和古希腊罗马社会主要基于个人财产及人身权利的社会相比，中国就没有类似的阶级划分。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宣称古代中国社会是一种封建社会，认为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欧洲中世纪的生产

力水平不相上下，因此也把马克思所定义的欧洲封建社会照搬套用到古代中国社会上，而没有认真、仔细深入考虑古代中国社会和欧洲社会的巨大差异。西方所谓的封建社会，其主要特点是，个人的社会地位有社会制度、法律和财产上的规定，阶级成员社会和政治地位相对稳定，财产完全由个人独立支配，而居于社会上层统治阶级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不同的阶级之间界限分明，自由民、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流动性极小。而印度那种基于宗教的森严种姓等级制度，在社会地位和财富上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只是贱民在个人所有身份上与奴隶有所差异。但是古代中国社会和它们完全不同。

中国社会的特征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不过三代”等。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富人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变动非常迅速，超过同时期所有其它文明。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中国社会总有一批人居于上层社会，但他们的流动性极强，不能构成那种稳定的社会阶层。首先从财富看，中国的商人在历史上，一直受到歧视，“无商不奸”说明了在一个崇尚道德的社会里，他们得不到社会的辩护。韩非子也把商人归为五蠹之一，商人和政府的合法结盟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政府里缺少自己的代言人，商人的利益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论维护，这就导致资本主义前期的重商主义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对商人所拥有财富的支配权上，由于国家是最终所有者，因此在国家财政出现困难或者社会遭遇问题时，政府往往从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大量从商人手中无偿征集财富，例如晚清对列强的赔款，大量纹银都是从徽商和晋商那里征收得来，这不仅导致晚清的通货紧缩，大伤中国社会的商业元气，也直接导致晚清经济的彻底崩溃。历代农民起义，军队所到之处，首先遭殃的往往都是这些大富之家。而在欧洲，农民的所有身份还是属于某个地主，只要他反抗，首先就遭到这个地主的镇压，如果逃跑成为游民，到了别的领地，不再次成为某个地主的农民，就会成为被关押的罪犯，所以欧洲不可能形成“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的局面。而在商人财富的继承上，同样无法形成财富积累。古代中国社会以家为本，家里面以房为本，财富总是按照均分方式继承。无论创业者积聚多少社会财富，在妻妾成群，儿孙满堂的情况下，财富总会被迅速瓜分掉。三代以后，这个大富之家的后代，就会又以穷人的面孔出现。

而地主或者官僚的遭遇也非常类似。一个穷人或者地主家的孩子，做了官以后，干上若干年，回到家中，其子孙并不能继承他的官位，而这个家族因为俸禄和国家供给的土地，也随着后代的繁衍，慢慢被瓜分掉，地主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如果从地图上看这种情况，其现象就是某人获得一大块土地，然后这块土地不断被瓜分，又有人获得一大块土地，又被再次瓜分，整个中国的趋势，就是土地逐渐被分割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小。这就是家族公有观念中财富均分继承必然带来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的阶层或者阶级不可能产生。

另一方面，家族公有观念中，还有一种人人平等的观念，即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有相关的能力，你就可以干你想干的职业。即使你是家徒四壁，是最底层的农民，你同样可以考试中举，进入政府当官。例如王安石的《伤仲永》一文中，“金溪民方仲永”一家就“世隶耕”。从王安石的眼中看来，除了责备方仲永父亲目光短浅，“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完全不在意方仲永的出身

身份，言下之意，这个苗子如果好好培养，将来可能照样出将入相的。我就听我们那里的老人说过，我们家乡出过不少宰相，这些人的父辈都是极贫苦的农民。这种无视财富，人人拥有平等政治权利的观念，近代以前的西方人恐怕永远无法理解。

伴随着这种平等政治权利的，古代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非常开明，但几乎无处不在，在今天的各种习俗里都还有很深的印记。例如我们家乡，直到今天，吃饭时，长辈要面门而坐，最小辈则背门而坐，面朝长辈，否则次序一乱，会给很多人带来不快和不安。中国古代的等级划分，主要表现在礼仪上，官与官之间有相关的礼数，官与民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礼仪规定。这些礼仪规定，大多成为一种习俗，而另一些则由国家律令强制。这种等级制度，它不作人身权利上的规定，但为了维护家族或者社会的秩序，它就要求其中的人员按照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来弥补在生产水平有限，社会财富不足下，公有观念带来的缺陷。这种等级制度，构成家族公有制社会的一大特色，这种特色，在一个比较大的家庭里表现得非常完整，《红楼梦》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家庭和社会关系。

《红楼梦》几乎写尽古代中国社会的人生百态，它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等级也非常能说明问题。刘姥姥到贾府，可以受到贾母的热情接待；晴雯可以肆意撒泼；丫鬟花袭人最后嫁给中等人家的蒋玉函等等这些现象，在阶级社会的西方人眼中，恐怕比中国传统的大逆不道还要让他们吃惊。从西方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上看，这种情况极其少见，佣人就是佣人，奴隶就是奴隶，不要说嫁给自由民或者贵族，就连申辩的权力都非常有限。尽管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但也有“宰相家人七品官”，豪门家的丫鬟无论穿着打扮、素养和社会地位甚至比中等人家的小姐还要高等等这些现象，都明显地显示出古代中国社会与其它文明非常不同的色彩。位于社会最高层的人员和社会最底层的人员，在财富和权力上差异极大，但最底层人民也还可以通过读书考试或者经商等，跻身上流社会，从这些现象中，我们看不到有鲜明的个人身份的阶级划分，而是一种开明等级制度。

古代中国社会中，构成家族公有制特色的还有一个特殊阶层——熟读儒家典籍的文人阶层。这个阶层非常奇特，而且是古代中国社会特有的阶层，有点象基督教社会中的教士，但差别也很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能构成一个阶层。在文人之中，贫富和社会地位差异非常大，可以跨越社会最高层和最底层，最底层的秀才不仅可能一贫如洗，手无缚鸡之力，而且酸味十足，连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都会嘲笑他们，而最高层的文人知识分子则进入政府任职，成为权要人物，做宰相也毫无问题。可是这样分化程度最为严重的一个群体，却都是“天子门生”，是真正拥有议政能力的社会群体，掌握着话语权力，距离权力中心最近的群体，是家族公有制理想的真正执行者。这里面既有人忧国忧民，更多的则是追逐名利。另一方面，却也是这样一群人把社会最高层和社会最底层联系起来，使家族公有制社会成为可能。一个权力或者财富群体过分稳定的社会，财富和权力总是朝优势群体的一方流动，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公有制社会。而中国社会则通过他们的不断流动，一直把底层社会的信息传达到权力中心，又从权力中心向基层社会普及各种上层信息，维系着社会的平衡与稳定。

除此以外，关于中国社会的开明等级制度，还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例如“人皆可以为尧舜”和“匹夫可以为天子”等等，不再一一列举。这种家族公有制下的开明等级制度可以称之为角色等级制度，也就是说，这种等级制度并不根据你所拥有的财产来分配，而是根据你所扮演的角色来分配，儒家思想就是在公有制基础上设立了许多位置，你在这位置上就扮演这一角色，并且内心同样要符合这一社会角色，你在外可能是拜将封侯，在家中，你就要把你外面的架子放下来，扮演孝子的角色。随着你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你扮演的角色也随之变化，孝子可以变成严父，媳妇也可以熬成婆。

中国的这种角色等级制度，是家族公有制观念的内在属性所规定。要实现公有制理想，必然要求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政治权利，不可能让某些大地主势力来专断政治，这就导致平民政治。而公有制社会，要求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来代表所有权，这一权力中心和所有人心中的观念一样，不可能容忍其它中心的存在，因此，其它能够造成权力中心的社会基础存在都被禁止，因此所有财富和地产都会被分割，不能长久存在，威胁社会的安全，即社会的集权化加强。而这种公有制的理论框架则是按照家庭模式建立起来的（古代也并没有其它的模式可供参考），这同时也要求了社会角色按照家庭模式来设计，把“君君臣臣”和“父父子子”等同起来。这就构成了家族公有制下，古代中国独具特色的角色等级制度。

B.4.3 强大的社会功能和国家对外关系

古代中国的社会系统功能

不比较现代以前的文明社会，不会明白这种家族公有制社会的巨大优越性。不理解家族公有制观念的社会内涵，不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社会一直领先世界几千年。对喜欢捧斯大林主义臭脚的人来说，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总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承认古代中国社会的社会生产力一直领先于世界，就必然推导出资本主义应该首先在中国产生，可资本主义首先产生于欧洲。如果不承认中国社会的社会生产力领先于世界，那么中国鸦片战争前的社会财富都从哪里来？如果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直落后，那么不仅诸多史实无法解释，《马可波罗游记》也只能是马可波罗的凭空杜撰，就连近代英国为什么只能通过鸦片才能打开清朝国门，史学家恐怕同样不好交待。

从长城、大运河、都江堰、火药、纸、弩等各种各样的工程或物品看来，古代中国社会不仅有先进的生产力，而且先进得惊人。和今天以及近代的一些理论家胡说八道，杜撰来自私的小农意识不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一个合作型社会，这种合作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各种过度的恶性竞争都被各种观念、制度以及政府所抑制。中国社会最强大的生产力就是由代表公有制的政府所形成社会组织能力，这种能力既表现为暴力和维护社会安全，但其生产力功能绝非可有可无。政府的这种生产力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工程上，历代长城和水利的建设便是一个明证，这种长期大规模社会工程建设也是中国社会区别于其它文明的一种现象。实际上正是这种社会才可能有那种大规模协作工程的出现，但这种能力的强大，也会给个人对社会产生依靠的感觉，缺少一种个人的独

立意识。

在社会保障方面，更是古代中国社会做得最多最好。早在《周礼》中，就已经有了“荒政十有二”，“保息六”等各种保障和救济措施，什么“散利、薄征、缓刑、除盗贼、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儒家最高典籍之一中明文写出来的。要注意到，这些保障制度都是政府行为，象常平仓就由汉代创建，隋代也建立义仓义米制度。而民间也有各种社会救济和保障措施，这些保障制度，一直维持着社会的安宁与稳定。例如助学济困，就是由于存在各种义田、族田的资助，才有贫穷子弟代有巨儒名宦的结果。

关于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和保障制度，可以和中世纪以前的欧洲作一个比较。一个行走在欧洲的人，他要时刻担心各种危险，包括来自社会和生理上的，一旦有什么疾病，他就难以生存下去，而且社会的各种抢劫和偷盗行为也让他无法放松警惕，强者才能生存下来。而一个行走在古代中国和平时期的人，他总是能得到各种帮助，他饥饿时，可能就有人送来饭，寒冷时就可能有人送来衣服，而不是担心别人把他抢回去当奴隶。如果送给中国人一些黑人奴隶，中国人的反应往往是分给他们一点田地，让他们养活自己，如果可能还要收些租子。可以说，整个社会总是给人一种安宁平和的感觉，不是象现在这样，充满骚动与不安。这种安宁平和的社会状态，正是“天下为公”的一种历史写照。

如果说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限制，保障的水平得不到保证，只能停留在较低层次上，那么今天在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我们反而想不到这一点，就值得深思了。而欧洲在基督教文明植根以前，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我确实看不到这种保障救济的制度和社会措施。

还要说明一点，古代社会并没有所谓的小农意识。近代以来出现的所谓小农意识，绝对不是华夏文明的内在属性，恰恰是传统文明崩溃所导致的一个结果。由于清朝末年人口的膨胀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再加上在与西方尤其与日本的竞争中节节败退，传统社会的秩序被一步步打乱，并在五四运动中，被彻底否定。旧的秩序完全崩溃，新的秩序却一直建立不起来，在中国的每一群落，每一个人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无序状态，结果是人人自危，各自为战，给人一种民族内斗，小农意识的认识。在五四中，这种对现状的认识就象一大碗墨汁，在各种强烈的情绪下，毫无疑义的就泼到无法为自己申辩的古代社会身上，给了我们自己一个黑暗的过去。今天也是一样，当下岗带来的恶性竞争开始，所谓的小农意识的看法也起来了。而大合作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时代，似乎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过，被某些人从我们的脑袋中彻底抹掉了。

国家对外关系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华夏文明中的国家和现代文明的国家概念不是一种概念。近代源自欧洲的国家概念，它的起源有很多原因，主要由资本，基督教和多个政治实体的国际竞争等所形成。而华夏文明中的国家从本质上说来，更象是一个家族。这决定了它的外交模式也和现代国家很不一样。如果按照各个朝代所拥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它连印度都可以征服。但是除非交往密切或者出于

其它需要，对于文化过于落后和距离较远的“未服王化”国度，它往往不是吞并，而是不太理睬，尽管它有这个能力。这种吞并对它来说并没有好处，只意味着它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获得更多的利益。他所以要征服其它国家，往往是这些国家给它的生存带来威胁，例如汉代的匈奴和唐代的契丹等等，不然它宁可只要你名义上的臣属（安全原因，不臣属则往往敌对），让你保持高度自治。

这种家族观念在外交上的表现也非常有意思，例如历代的和亲政策，这种国际关系政策，就是期望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在不能臣属的情况下，用亲戚的关系来代替。而当对手比自己强大，自己又十分懦弱时，象南宋那样，自称为儿皇帝。在这些国家关系中，根本看不到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子，完全是一个家庭的行为。

儒家学说主张“修内来远”，扩张并不是华夏文明的内在秉性，往往是反应过激所致。家族公有制的观念，对不能耕种的草原土地并没有要求，游牧民族的商品，它们宁可用自己的更先进的商品交换。但往往游牧民族发动侵略战争，遭致农业王朝的反击，甚至干脆修筑长城把它们封在外面。

但是由于地缘上的接近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每一次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总能给地方诸侯势力带来更强大的实力，也更具威胁性，尤其在战国时代最为明显，中央势力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就会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削弱这种威胁，加强并扩大集权的范围。这在历史上表现出来，就是各王朝统治的地域逐渐扩大，这和近代出现的资本帝国的行为又构成极大差异。英帝国的领土扩张，主要基于资本的利益驱动，而华夏文明的扩张则是生产力进步下的自然行为。从结果上也可以看出这种行为的差异，英帝国崩溃以后，和罗马帝国一样，再也无法恢复，而华夏文明，砸得再烂，总会又有一个被重新建立起来，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其统治地域也越来越广。今天中国有些人要搞全盘西化，在这一点上，难道不值得深思么？

同时由于地域的扩大，与外界接壤的边界线也越长。随着生产力更进一步发展，周边的国家和华夏文明之间，又会再次进行一轮接触、交往、争战、分封到统一的历史过程，这就构成华夏文明外交史的一条轮回主线。

关于古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就写到这里。还有一些相关内容，放到后面的重要专题中进行阐述，例如资本主义、农民起义等。

§ B.5 若干重要专题

B.5.1 西方所有权观念简述

为了更好地与中国历史比较，需要叙述一点西方文明史中相关的部分。本段从西方文明中的所有权观念着手，简单说明一下西方历史中的这种所有权观念的演变。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确立了个人所有权观念，这种所有权观念主要是申明个人权利，尤其是私人的财产权利。这种权利使得其国家权力不能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也就是不能以国家的名义随意剥夺个人财产，国家不是以一个独立的法人存在，而是自由民的民主权力机构。由于这种观念起源于人类的野蛮时期，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财产权没有区分人和物的属性，奴隶从法律上被当作了个人财产。尽管在野蛮时代，各种文明不同程度上都有奴隶存在，但由于这种个人所有权观念的存在和对人物不作区分，导致只有希腊文明出现了真正的奴隶社会。

这形成了东西方的巨大差别，马克思是认识到这种差别的：“在没有私有财产权，而国家作为直接的土地所有者和主权者的亚洲社会，地租和税金是互不分离的，与地租相区别的税金无法存在。从这一点上来看，在国家面前所有的臣民都以相同的形式接受着隶属关系，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没有比这更加残酷的形态了。在这里国家是最高地主。主权则存在于国家层次上集中的土地所有。无论个人或集体如何占有并耕作土地，私有财产仍是不存在的。”由于马克思认定公有制不可能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文明社会里出现，东方近代在技术上的落后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就把中国的这种社会状态称为“半野蛮半文明”的东方普遍的奴隶状态。但是，根据赋税的程度等各方面情况来说，所谓普遍的奴隶状态根本不存在。相反，他忘记了古代中国在技术上曾经是如此的先进，一直领先着世界，他忘记了马可波罗给西方带去的福音。

西方的这种所有权观念有两点需要注意：一，西方的国家政权不是一个独立法人，它对内的功能非常弱，它无法越过私人财产权来对社会施加深度干预。这导致很多严重后果，例如无法进行巨大、长远投资的社会工程，不能对外保持持久、强大的战斗力等等。二，国家无法消除城邦状态，所以内部无法保证持久和谐安宁的统一。这也就是，不可能在这种个人所有权观念的基础上，跨城邦建立一个永久的帝国。其原因就是城邦领主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可以拥有军队。即使建立了一个帝国，这种武力也会最终将其摧毁。更为重要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得不到来自所有权观念上的支持，由于建立在沙石的房屋，它的存在更多的是帝国首脑的才能和暴力所导致。所以一旦崩溃，很难再重新建立。

这种所有权观念，在经济上就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这带来可怕的结果，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还好说，一旦资源紧张，内部斗争就非常激烈，没有一个上限。这会从内部摧毁一个国家，罗马就是这样自然毁掉的，如果没有其它因素，新的帝国很难建立起来，实际上后来的欧洲几乎没有统一过。而且，奴隶制度和财产争夺导致大量和普遍的杀戮，这种杀戮在希腊时代和罗马帝国普遍存

在，尤其在政权崩溃以后。和人口持续增长的中国相比，欧洲距离地狱很近。这样的局面和结果，自然要求另外一种观念，这种观念非常有别于罗马法典中的精神——基督教。

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宗教的认识上是不足的，它认为：“宗教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的颠倒的反映，是以对超自然实体即神灵的崇拜来支配人们命运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也就是说，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消极的。但是，对分崩离析的罗马来说，基督教的引入是革命性的，它是个人私有观念的一次反动，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次意识形态革命——它通过宗教的形式，给欧洲嫁接了本不属于它自己的社会公有制观念。这种公有观念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和占据统治地位很容易解释，此前欧洲只有个人私有观念，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它给社会带来巨大伤害，社会需要从这种状况下摆脱出来。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无法大规模传播上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宗教的公有观念已经被儒家理论更理性地表达出来了，社会不再需要同样诉求的宗教。某些时候，由于儒家理论在中国内乱中的暂时失能，象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传播以及后来的农民起义所带的一些原始宗教色彩也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形式上是扭曲的，但人类的宗教大都包含一种所有权观念，这种所有权观念往往都在信奉这种宗教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中反映出来。希腊文明和罗马帝国的诸神没有任何公有观念，而基督教的救世主耶稣显然是公有观念的代言人：“我给你们带来了所有人都将获得极大快乐的消息”。正象儒家的仁礼这些东西一样，基督教的教义提倡教徒的平等和博爱的道德观念等，这结果就是在欧洲建立了一个统一基督教社会，并促使欧洲从奴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欧洲从奴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并不是什么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在其中的作用更为重要。这一段时期被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人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作者个人的观点跟他们也不一样，作者认为，这是欧洲公有观念暂时取得胜利的时期，它用宗教的形式把欧洲统一起来，给欧洲带来了长期的稳定、人口的增长以及和平时期财富和技术的积累，这为后来发生在欧洲的伟大革命奠定了先决条件。所谓的黑暗，只是教会的权力太大，对个人限制太多。而且今天来自西方的国家主义，即国家作为一个最高利益和权力实体，其观念起源，与携带公有制观念的基督教有莫大的关系。

但是基督教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私有权的观念。在政治组织上，尽管教会的权力非常大，但世俗的君主依然握有巨大的权力，城邦依然存在，斗争也没有结束。这一局面和夏商周诸朝非常相似，但是这里诸侯的存在有法理上的支持，而且一个统一的诸侯国也有了基督教所带来的社会观念的支撑。基督教本身的虚妄面临着个人理性越来越严重的挑战，教会的政治影响随着从强到弱，逐渐沦为社会的道德机构，但依然发挥着稳定作用。但这时候的欧洲不同以往，基督教的很多思想也被个人理性所吸收，社会的合作性要远大于以前，在后来的历史里，欧洲虽然还不是铁板一块，但也不再是一盘散沙。而且基督教的劳动救赎观念对欧洲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它拯救了知识阶层，终于让理性和技术结合起来，这也许是它比儒家理论最为优势的地方。

近代欧洲有两个天堂，这构成欧洲在近代扩张的基础，一是耶稣的天国；另一是马可波罗的人

间天堂。尤其后者，是欧洲走向海洋扩张道路的最初动机，导致了新大陆的发现，这一发现给欧洲的资本带来了无尽的资源和市场，欧洲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B.5.2 游牧民族与华夏文明

中国的这种集权社会和中国的地理条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地理上的二元性应该是中国走向家族公有制的最重要原因。中国地理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在黄河以西以及黄河以北，直到外蒙，是广漠的大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天然栖息地，而黄河以南，是同样广阔的农业地带。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在黄河一带汇集，这种地缘条件，使得黄河一带成为冲突焦点。强悍的华夏文明在这里产生是很自然的事情。

草原在地理上比较单调。不象今天的中国西部，古代的草原大都水草丰美，适宜放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一幅很优美的图画。另外，草原上的土壤和气候也和长江黄河的农业区大为不同，十分不适宜农耕，即使农业国暂时占领了草原，垦荒很快会导致土地风沙化，农业人口无法长久侵占草原，所以即使有外来人口居住在草原上，最后都会变成游牧民族，这大概是区别于文明同化的一种地理同化吧。草原的平坦也让草原没有阵地防御性，在草原上的民族都生活在马背上，他们没有固定的驻地，随着气候和绿草四处迁徙。

游牧民族的个性和这种地理特点有很大关系，胡人在农业人口眼中都差不多，都骑在马背上，侵略性特别强，这就是草原所决定的。游牧民族都使用马匹作为交通工具，并且惯于迁徙。自然的，他们拥有非常强的突袭和纵深能力，游牧民族在攻击性的武力上一直强于农耕社会。因此农业社会在和游牧民族的较量中如果想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同样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这就需要在武装力量上采用和游牧民族一样的方式。这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代大量养马、唐朝也是从马背上征服突厥的最重要原因。游牧民族的这种快速移动能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和我们认为的相反，游牧民族军事上的攻击能力大多数情况下都比农耕社会强，之所以有时候弱，也只是农耕社会在军事上效仿他们。正是游牧民族这种持久强横的攻击能力始终对农耕社会构成压力。

但是游牧民族在文明上始终落后于农耕社会，他们所有的往往只是些习俗，而不是成形的文明。原因很简单，他们生活在移动的马背上，不能坐下来静静地思考。因此，他们的攻击性虽然非常强，但始终无法从理论上为自己辩护。为数不多的给游牧民族以理论支持的，往往还是汉人，象《史记·匈奴列传》所记载的中行说，此人就是一例，出于泄愤，他教匈奴不要喜爱汉朝的服装和事物，阻止匈奴被汉朝同化，还“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把大汉帝国弄得很苦。但游牧民族一旦占领中原，由于文化上的绝对劣势，同化不可避免。象苻融劝阻苻坚征伐东晋的理由就很有意思：“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

而农耕社会的特点又完全不同，他们大多都守着自己的田地，一生在一处居住。长期的耕作会让社会财富积累起来，让一些人腾出手，做其它的事情，从分工上来说，比游牧民族要精细得多，

所以他们的文明程度往往都比游牧民族要先进得多。但是在军事上，他们并不天生具有那种远程攻击能力，而更多是依靠器械和障碍物，保护自己的土地。从遗留的厚厚的城墙（注意，大部分在北方）来看，农耕社会的军事特点是防御性的。古代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非长城莫属，各王朝在两千多年的跨度里，都对长城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建设和维护，其工程规模和时间跨度远远超过了在治水上的投入，由此可见游牧民族对农业社会的军事影响和心理压力。游牧民族的攻击性由此可见一斑，农耕社会的防御能力由此可见一斑，他们对游牧民族的恐惧也可见一斑。农耕社会要想从武力上赢得胜利，在火器出现之前，就必须要向游牧民族学习，用同样的骑射攻击手段，再加上农耕社会雄厚的财政能力，才可能取得攻击上的优势。汉唐两代赢得对游牧民族的胜利，其原因就在这里。游牧民族在拓展国土方面的贡献前面已经提到，这里略过。

华夏文明，在其整个产生发展和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中国的这种二元性地理条件起到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西边的高原、西南的雪山和兴安岭的恶劣气候，让中国地理上相对孤立，而中国内部的游牧区和农业区面积都非常广大，都有足够的纵深，使得生活在对方区域的人口难以取得彻底胜利。正因为这种地理条件，游牧民族侵入农业区可能要早于文明的出现，在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上，游牧民族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以往的中原正统历史观存在问题，这种正统观点把农业区孤立起来，把游牧区域对文明的作用看成次要的，认为文明主要由农业人口形成，这种认识在解释华夏文明的起源时，就只能在农业区域内部寻找其原因，也就把华夏文明简单解释为治水文明。但是游牧民族的压力无时不在，只要中原一发生动乱和分裂，游牧民族就会立即侵入中原，可见游牧民族一直在刺激华夏文明走向集权化。因此，在考虑华夏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地缘问题时，必须把游牧区和农业区看成一个统一的地理系统，不能割裂开来。往往游牧民族对游牧区的战略重要性有更深的认识，古代最后一个统一中国的满族，也是游牧民族，它在整合这个二元地理系统上的努力最为成功。可是，洋人从海上漂了过来。

B.5.3 儒家社会中的农民起义

以往的阶级观点，一概把中国的农民起义套上一个阶级斗争的形式公式。大致上都是阶级压迫到了一定时候，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纷纷揭竿而起，最后也都是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朝。正统的历史书，只要提到农民起义，肯定要背上一段这种公式。但是前文已经提到，古代中国是一个家族公有制社会，不是一个西方式的、基于私有权的阶级社会。这种公式套到古代中国头上，张冠李戴了。那么怎么看待农民起义呢？它究竟有没有革命性？是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动力？

中国的农民起义并不是阶级斗争，因为中国没有西方的阶级问题。产生农民起义的原因很多，这些原因之所以激发起农民起义，就是当前的政权由于这些社会原因无法贯彻家族公有观念。政权没有贯彻公有观念的原因，前面已经有所论述，主要是君主因素、外族压迫、人口压力、官僚腐化和其它社会矛盾等等。象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隋朝的农民起义主要就是因为君主对社会形势

没有很好地把握，政策压力太大，造成动乱，农民起义的矛头直接对准君主。书呆子王莽幼稚的改制也属于君主因素。这种君主因素并不多，有些朝代的君主可能更为残暴，例如明朝，但其施虐对象主要是政权的臣僚，对政权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很少改变，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大的影响。游牧民族统治中原造成外族压迫问题也是一种原因，主要就是元朝，这可能也是唯一一例因为民族问题造成阶级矛盾性质的农民起义。但这并不常见，象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金王朝、清王朝的民族政策相对温和，并没有因此激起大的农民起义。

人口压力应该是各王朝更迭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每一个王朝，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远远比不上人口的增长，到了末期，人口压力越来越大，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开始发挥作用。

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土地所能承受的人口都有一个上限。作一个最保守的估计，设每个王朝的生存期为 250 年。人口平均寿命为 50 岁，每个家庭在 25 岁时平均生育两个儿子（古代一般的生育年龄只有十八岁左右），出生死亡率为 30%，也就是人口在每 50 年增长率为 140%，那么在 250 年里，人口数量为开始时的 5.38 倍。也就是说，如果开始人口为 1000 万，到王朝结束时，社会人口就快到 6000 万。这种人口压力足以让任何一个王朝倒台。这就是各王朝最终倒台，并且生存年轮相近的主要原因。后来的王朝寿命稍稍长一点，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一辆货车，超载太多，最终都是要翻车的。

东汉、唐朝和明朝的农民起义的原因，这种人口因素非常大。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这种人口因素也非常突出。由于人口已经到达了一定限度，只要政权的赋税稍稍增加，人口问题立即突显出来，而国家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官僚的腐败，财政的调控能力减弱，在这种情况下，赋税水平不仅不可能降低，而且必然增加。这样，社会矛盾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更加激化，导致起义的发生。中国的人口问题先于阶级问题。由于大地主在前一次起义中被吃掉，而且战争也消灭了大量人口，所以每朝开始，一般农民都能分得不少土地（土地公有）。也正因为如此，每个朝代开始都有经济复苏和繁荣的景象，但是人口始终迅猛增长，土地被一直瓜分下去，致使一些农民无法依靠自己的土地生活，只得向地主租借土地耕种。这种现象普遍存在，近现代表现尤为突出，中国从清末不到二亿的人口，尽管有大量灾害和战乱，到解放初人口也居然增加到四亿左右。人口这种增长速度会诱发大量社会问题，导致农民起义的发生，造成王朝的更迭。可以说，中国的农民起义很大程度上都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现实过程。

而大规模根深蒂固的官僚腐败却是古代中国一直延续至今的相当特有现象，也是造成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导火索。这种官僚腐败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家族公有制社会中，缺少民主机制，也是儒家理论的缺陷所造成。儒家理论以“仁”为核心，倡导以德治国，但是它没有提及如果治国的君子不“仁”应该怎么办，而法家理论则完全依靠君主的权术来对政府里的官僚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显然很不彻底。官僚的腐败会造成国家财政能力的削弱、人民赋税的加重以及政府的信誉败坏等很多恶劣的影响。一旦人口相对土地达到临界状态，这种官场腐败将严重激化社会矛盾，加速政府

的倒台。尤其是国家财政能力的削弱造成的影响非常巨大，在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救助，造成大批难民游民，形成农民起义的社会基础。

我们看到，农民的这种大规模起义是在秦国统一中原以后才频繁发生的。如果把农民起义看成阶级斗争，那么以前我们认为的阶级斗争更严重的奴隶社会夏商周王朝却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就无法解释。而且，西方的中世纪，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典型封建社会，也并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现象，更没有听说过起义成功的案例。欧洲的这种情况和战国时期非常类似，战国时期，天子只是一种象征，土地实际所有者是各个诸侯的王公，因此不可能有针对天子的农民起义。从这里看，农民起义的本质并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它是由人口因素诱发的广泛社会矛盾所造成，而不是阶级矛盾所造成的，农民起义的力量也是相当多元化的。农民造反只是一定的社会形势下，代表公有权的政府在社会问题面前行政失能时，社会通过暴力的方式来消灭人口，并对政权进行罢免和选举的一种自然社会行为，属于动乱性质，不具有革命意义。所以说，农民起义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动力，但农民起义所选举的新政府，会总结旧王朝的经验教训，采取更合理的政策措施来治理国家，再加上生产力水平的缓慢提高，这表现为各王朝的更迭时间越来越长，农民起义只在这一点上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B.5.4 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

中国历史书总是说这个时代或者那个时代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是最后又由于各种其它原因，真正的资本主义始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其实，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纯粹是捧斯大林的臭脚，本身就是错误的。其原因很简单，中国走的是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根本没有西方那种资本主义的土壤。正如古代中国没有西方的私有观念，所谓的私有只是使用权，在所有权上只有唯一的家族公有。在这种公有制上，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对私有权的保护，或者说国家只是作为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的面孔从来没有出现过。由于缺乏这种私人所有权，个人对自己财产的支配就受到国家的约束，而国家的政策往往是从社会安全角度考虑，尽可能对私人财富进行分割，例如推恩令和抑制土地兼并以及在遗产继承上采取均分的方式等等，这些非常不利于个人财富积累的政策，产继承是由国家说了算，这是造成“富不过三代”的主要原因。这种政策很好地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中国社会比起西方社会来说，要稳定得多，所以除了动乱，人口一直增长。资本主义产生和积累的过程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是血腥的，即使在其国内同样非常残酷，这是今天那些埋怨我们祖先的人没有看到的。象西方早期的剩余人口，只有管理权的国家对促进他们的就业无能为力，只能由他们自己自生自灭，所以他们对财富极度渴望。而古代中国则一直担心没有土地的剩余人口，一旦出现这种社会剩余人口，政府就会通过公田、财政赈灾等各种手段来养活这些人口，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也要求农业赋税持续增加，直到政府和农民都面临破产，再也继续不下去，结果就是农民起义。这种起义真正的社会作用就是消灭人口。

人口问题是中国始终积累不了社会财富，进入资本和技术社会阶段的最重要原因。如果中国人

口的增长速度小于财富的增长速度，即使有官僚腐败（至多只是增加了一个流通环节），也不可能出现宏观上的社会经济问题，也不需要政府大范围的宏观经济调控。但是中国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始终为中国经济制造大量社会剩余人口。而国家一看到这种剩余人口（表现为游民和灾民等），其本能反应就是立即通过各种方式让这些剩余人口拥有一定的生活资料。直到社会人口达到生产力所容许的临界状态，这结果不仅是一个王朝的毁灭，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社会财富积累和剩余人口的条件在常规条件下始终不可能具备。换句话说，古代中国进入不了资本主义阶段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人口问题。

从理论上讲，不仅儒家的所有权理论不支持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在后来的经济理论中，对商业的认识也始终没有达到一个所需要的理论高度。所以在经济政策中，重农轻商一直是其基本经济理念。由于所有权是唯一的，重农轻商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抑制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是，不是说资本主义就不会在中国出现，但是中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就立即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可能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代非常适宜出现资本主义：战国和宋朝。

战国时代其实已经有了市场经济，但是对君主而言，这只是手段，而且这种手段的理论很不彻底。其实管仲的富国思想中，有很浓的市场经济思想，但这些思想没有从理性上达到一个高度。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战争中人口和组织因素远大于技术和财富因素，富国未必能敌得过大国，这使得君主和思想家很难认识到这种财富和技术的重要性。如果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达到能够抗衡人口因素的发展水平，资本主义也可以在这种体制下发展起来，但从后来看，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一直要强于农耕社会，直到明清社会，火器的出现才使得农耕社会逐渐具有军事优势。可见，从技术条件上讲，中国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还有一段路要走。

南宋可能是唯一的真正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而这种资本主义的产生不完全是国内政策的结果，虽然宋朝的土地政策对资本主义的出现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游牧民族的侵略。宋朝的土地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抑兼并，使土地越来越集中，这非常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当然社会剩余人口也越来越多。但仅仅有社会资本的积累还不够，这些资本在当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都和土地紧密结合，还只是农业资本，没有从土地游离出来。但是，游牧民族对北宋的侵略，使得大量的资本和人才南迁。但是南方土地的实际使用权（不涉及政府，也可以当作所有权），早就在原有的地主手中。这样，从北边来的大量社会资本，成了脱离土地的游离资本，这种资本主要表现为货币资本，而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又提供大量的社会剩余人口，这样，货币资本和剩余人口在这种情况下，结合在一起，主要进行商业和产业活动，极大刺激了南宋的经济发展。

也正是由于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南宋的经济和财政能力可能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技术发展速度也最快。南宋对金朝的纳贡对其国家经济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这种资本主义如果能够持续下去，中国的人口观念、经济观念和技术观念都可能发生重大转变。沈括的《梦溪笔谈》可能是知识分子第一次表现出对器具物理的全面系统的兴趣，理性正在和技术悄然接触。

宋朝和其它朝代一样，从来不会对剩余人口置之不理，例如募兵制等，这种宏观就业政策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如果产业和商业资本无法吸收社会剩余人口，国家会通过募兵制、公田等各种途径吸纳商业产业资本以外的社会剩余人口，避免了更大的社会冲突。如果中国社会能够在这种状态下保持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历史上可能会因此出现一种世界史上最温和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除了游牧民族的侵略之外，基本不带有西方式的血腥。但是，正如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游牧民族的侵略，同样，它也在游牧民族的侵略下消亡。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抗衡游牧民族的铁骑时，就被游牧民族的铁蹄扫荡干净。而明朝的开国君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吃大户是出了名的，结果中国又回到重农抑商的老路。

资本主义，在中国这种公有制观念、农耕社会人口总是暴涨的情况下，它的产生是比较困难的。但并不意味资本主义变异形态就一定不能发生，更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必然要求西方的私有观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首先要求社会财富和资本能够积累起来，这要求古代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调整，否则只能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来约束人口的增长。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在古代中国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家族公有制下的政府从一开始就拥有非常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仅通过税收体现，更重要的，其行政能力在古代社会超越了所有其它文明。这种宏观调控能力再加上对人口问题的无知，导致每个王朝的人口迅速增长，远远超出了财富生产的发展速度，消耗掉所有社会财富，最终还是无法避免人口边际原理的发生，反而让人口边际成为一种宏观社会问题，导致了农民起义。这样，资本主义发生所需要的个人社会财富积累几乎不可能，如果仅仅就资本主义的发生来说，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过分仁慈的公有制社会。

如果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大多数农民起义可以避免，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也是迟早的事情。这时候由于人口基本得到控制，而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个人手中的资本会逐渐积累起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温和地从土地上脱离出来，为资本提供社会剩余人口。这时候所需要的条件都基本具备，新的基于公有所有权的资本主义关系出现是迟早的事情。

西方的人口问题，在私有制和长子继承权的约束下，基本从未演变成宏观问题。由于土地占有已经饱和，他们的新增人口，如果不能通过商业和工业寻找出路，结果就是在微观环境下就被牺牲掉，没有对整体宏观经济环境产生剧烈影响，这是他们财富得以积累的最重要原因。而且因为土地不是公有的，财富也不公有，所以他们的政府并不会因此要对这些底层人口的死亡、疾病、贫穷负责，他们的底层人民也没有向政府索求生存的意识，这从西方几乎没有古代中国的那种大规模起义就可以看出来。等他们的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能够雇佣剩余人口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自然发生了。

B.5.5 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演变

近代情节，浓得化不开。

中国近代所发生的问题，遭受的侵略与承受的耻辱，是这个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不知彼不知己，进退失据所致。从民族主义角度的思考与分析，我已经在《从鸦片战争到大争论》一文中有所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人口膨胀到社会能承受的极限，导致朝代晚期；西方势力大举入侵，直逼这个文明的根基。而这时候，家族公有制社会系统中两大主观能动因素全部失能：一是君主的意志；二是知识分子的视野。这两点，可比照汉朝初期的君主和知识分子因素，立判高下。家族公有制社会和其它社会基本一样，如果这个社会要发挥对外的强大国防能力，领袖的意志首先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因素。在汉代，这种因素表现得最突出，正是汉武帝的意志与决心才赢得对匈奴的战争。相比之下，清末的慈禧太后和各个皇帝，这种意志力和决心已经丧失殆尽（这是君主世袭制度的一大弱点），在历次近代对外战争尤其甲午战争中，一败就磕头，无法扮演领袖角色。再比照毛泽东，再参考大清朝雄厚的国力和抗日战争中的艰苦条件，更是判若云泥。

而与汉代出生入死收集情报的张骞、苏武等人相比，家族公有制社会中的另一大能动因素——大清朝的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严重阻碍了清朝的变革。举国上下，对世界的认识一团漆黑，这些知识分子却跟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懦弱无能却高谈阔论，大搞道德至上，直朝洋务运动大抽鞭子。此外，再也看不到他们任何举动。

极少数的几个虽然谈不上高瞻远瞩，但至少有些远见的洋务领袖还同时遭受两方势力的排挤：君主权力和知识分子的舆论权力。尽管他们的改革失败，但却给中华民族留下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培养了一批有世界意识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继续着救亡的务实道路。不仅如此，大清朝的改制更是自毁长城——不是调整，而是粗鲁地取消科举考试。这不仅让儒家社会的秩序与循环完全破坏，也无疑让风雨飘摇的政权自绝于知识分子群体。这个晚景的政权不知道它的存在正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维持，但这一做法却是与他们为敌，后来的五四运动证实了这一点。结果就是中国社会秩序的全盘崩溃，没有人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此外，人口的迅速膨胀，又带来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马尔萨斯原理在清末又开始发挥作用，压迫与反抗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朝代的轮换规律在人口的膨胀中正在暗暗进行。

另一条线则是西方观念的入侵。西方观念的入侵，首先却是与农民起义结合，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这个十足的畸形儿。它是基督教与农民起义的畸形结合。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事实是它自己毁灭了自己。而洋务运动的领袖，也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培养起来的，洋务运动本来是一个最好的开始，但他们无法让家族公有制社会的两大主观因素发挥效用，失败同样是迟早的事。接下来的维新运动，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逐渐把中国领向一条充满悖论的意识形态革命流血道路。这条道

路不可能成功，因为它们的理论核心本来就是错误——他们想把西方的意识形态直接嫁接到这片土地上，却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东方的土壤之间的水火差异十分无知，甚至根本意识不到。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可以看出，他们想要的还是公有制，他们想借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来建立一个更理想的公有制。他们不知道西方的政治制度距离公有制、距离中国现实有多远。结果就是最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蒋介石的民族革命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

关于近代中国，还有个问题：中国社会并没有落后，也谈不上落后，至少在财富上。从一开始，我们的财富还可以轻松买下欧洲至少半个象法英那样的国家的一半。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占世界的 $\frac{1}{3}$ 至 $\frac{1}{4}$ ，我们的商业也非常发达。这样的国度如果说落后，那么今天的国民生产总值比起来，那就不是落后可以形容的了，那么毛泽东时代的条件就更是目不忍睹。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我们这个家族公有制社会的两大主观能动因素完全失能，这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对世界的无知，因为自己的无能，我们找不到道路，这是问题之所在。49 年开始，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找到了最基本的道路，尽管那个 $\frac{1}{3}$ 至 $\frac{1}{4}$ 早就已经不再存在，但我们找到了道路，看到了希望。一是领袖毛泽东的意志与远见，二是共产党这个民族的脊梁，这足够了。

看看今天发生的一切，我们应该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当时社会背景和用意了。当初的文化大革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那还是个刚站起来，却没有觉醒的民族。而今天，正在发生的，却正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它发生在制度之外，并开始推动着政权系统的前进。这场革命，古今中外的一切思想都在其中斗争着，我不知道发酵到最后会产生什么，但我想它是一个初生的婴儿，我期望它就是人民公有制，这本来就应该是家族公有制社会的自然归宿。

关于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演变就写到这里，以后如果有时间，还将详细论述。

§ B.6 结语

终于写完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要“均”便需要一个最高主宰，可是在人口持续膨胀的情况下，“均”的最后结果却正是“寡”。中国社会就是从这里走来。

《历程》一文中，主要给出并论述了以下主要观点：

1，古代中国是一个家族公有制社会，其主要理论为儒家理论和法家理论，其中儒家理论为所有权理论，法家理论为管理理论。

2，以家族公有制为基础的华夏文明的产生源自中国地理的二元性，即由地域广阔的草原地带和农业地带的冲突所形成。

3, 游牧民族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和农业社会相比, 毫不逊色, 差别主要是内容和方面不同。

4, 中国社会不是一个阶级社会, 而是角色等级社会; 不是民主政治, 而是平民政治和集权制度的结合, 而且从本质上来说, 一直是集权社会, 分封是集权的开始。

5, 人口问题是中国社会治乱的最重要因素, 是制约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形态发展的最根本因素。这种人口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家族公有制社会极力保证人口的生存和增长, 却最终受阻于马尔萨斯人口边际原理所致。主观原因则主要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人口、经济和治乱关系上的无知。

6, 农民起义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主要是由于君主暴政、异族奴役尤其是人口因素诱发的社会矛盾所致, 其性质属于社会动乱和暴力选举, 不具有革命意义。

7, 家族公有制的中国社会不可能经过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阶段。

8, 古代中国的外交模式不具有任何现代国际关系上的意义, 而是家族外交模式, 或者说亲戚和邻人模式。

9,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思想巨变, 主要是以公有制观念为基础的理念和以西方个人权利观念为基础的理念冲突为基本线索, 这种冲突最终可能会孕育一个全新的人民公有制社会。但是西方观念中的私有制观念对公有权的侵蚀和华夏文明公有权对个人权利的侵害都给人民公有制的诞生带来危险。

用另一种方式可以表述成下面形式:

草原农耕二元地理系统 → 地理冲突 → 农业部落迁徙、冲突与抗击 → 农业文明的产生, 无神公有观念 → 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 分封制度产生 (集权) → 生产力发展 → 中央集权的家族公有制

家族公有制 → 权力集中 → 抑制地方势力和社会动乱, 有最高权力机构负责主宰

家族公有制 → 人身观念 → 角色等级, 人身平等 → 开明礼仪等级, 平民政治, 选拔贤良

家族公有制 → 家族延续观念 →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医学上的局限, 认识上的无知 → 人口膨胀

家族公有制 → 财富分配观念 → 均分制, 社会救济

家族公有制 → 生产力形态 → 社会大协作模式, 军事工程、治水工程、南粮北调、部门经济国家垄断, 对财富积累型即资本型生产力形成抑制

家族公有制 → 国际关系模式 → 家族特色, 附属国 (臣国)、儿皇帝、和亲、邻人、征服但没有民族奴役

结果，集权趋势加强，社会财富更趋于均分，抑制资本型生产力的发展，马尔萨斯人口边际原理作用下形成朝代周期。

从古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来看，它给今天中国的教训，至少有以下三条：

一，坚持公有制（公有制本身要求集权），否则不仅意味着华夏文明的灭亡，而且私有制天然排挤人口，彻底的私有制立即带来颠覆性的社会问题；

二，由于公有制不能从制度内约束人口的增长，需要把人口问题当作国家安全的基本战略问题来抓，从今天看来，控制人口增长的力度还要加大；

三，传统社会几千年的教训，反腐败斗争无法在制度内完成，落实人民监督制度，把反腐败进行到“底”，才有可能真正赢得这场胜利。

这里还要再次强调人口问题。人口的压力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论是约束控制还是放纵，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人们往往会无视这种问题的客观性，他们需要有一个人格化的替罪羊来承担责任，而这个替罪羊总会幸运地落到政权头上。控制，他们会诅咒集权与暴政；放纵，他们会谴责你的无能，并把放纵带来的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罪责也推到政权头上。只有减轻和消除人口压力，这种指责才可能慢慢缓和下去。

《历程》一文，是从一种源自历史辩证法的历史哲学理论出发，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所作出的简单论述。要严密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这里的论述并不充分，以往的历史理论框架和历史哲学也是不够的，至少应该有类似《人类发展的自然社会原理》的专著作为基础。需要有一种系统的理论，从各个文明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其它条件出发，分析各个文明的特点，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且既不能象《世界通史》，只注重文明的整体比较和联系，也不能象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那样，从文明本身分析，却是支离破碎地来解释历史，但显然这些不是我的任务和责任。

《历程》一文企图从家族公有制社会的角度，考察这一社会的内部性质和在各种因素影响下的行为，解释古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特点和问题。如果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期待大家指出。不管怎么说，希望此文能对大家的思考有点益处。

附录 C 罢免权下放的相关论述

§ C.1 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建议¹

曹泽新

2002-5-22

摘要：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解决的办法是进行农村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下放了罢免权的民主集中制的保障下，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会得到切实的执行。并由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形成庞大的农村产业和市场，为当前的中国经济提供新的活力。

¹本文写作时间是 2002 年，之前中国政府推出国企私有化和工人下岗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让中国的公共财富向极少数人转移，而工人农民的社会保障系统被全面摧毁。娼妓遍地，黑社会横行，犯罪率剧增，民生凋敝，前所未有，实是中共执政史上的极度黑暗时期，而居然直到今天，还有人为这种猪狗不如的经济政策及其施政者洗白。

公共服务领域的产业化政策，摧毁社会保障，并让义务教育变成家庭的义务。所谓产业化，就是放开这些单位自己想办法捞钱，怎么捞钱，那就是单位的事情了，找谁捞钱，对象很清楚。农业政策中，看似农业税免除，但多过农业税几倍的土地流转收益被剥夺。而当时的社会舆论，不仅不反省经济政策中的问题，反而把经济政策造成的一切社会恶果归咎没有政治自由化，祸国殃民，于兹为盛。

中国后十年的经济发展，不是因为当初自由化政策的成功，而是对自由化政策带来的破坏进行弥补，通过大力促进就业和恢复社会保障，并在全球化竞争中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中获得。但时至今日，原有的经济结构不仅没有改变，而且继续固化。农业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 10%，而农业人口占中国人口的一半。

很少有人提及轮子功与当时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但**轮子功就是当时经济政策催逼出来的太平天国未遂**。如果不是社会保障体系被全面破坏，缺乏最起码的社会基本保障，谁 TM 会去练什么不用看病的功法？而如果不是丧失社会保障人数如此之众，妖孽又怎么能够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得以显形？在轮子功的问题上，至今都没有追究施政者的责任。

非常明显，之前一直持续的种种风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文官集团至今也不打算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华西村等就在那里，要走早走了，而是盯着农村的土地私有化，想把中国的农村变成资本庄园。这主要通过如下步骤进行：一，先让农民卖地进城镇，拿卖地补贴过几年，腾出农村土地；二，资本进村，对剩余少量农民血腥圈地；三，缺少就业机会的无业城镇农民又被赶回农村，这次是被农业资本雇佣，成为失去土地的农业产业工人；四，农村成为资本庄园，部分城镇将成为一座座死城。也就是说，城镇化实际就是在为资本圈地设计的第一步：腾出农村人口。

小额信贷的全面放开，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激起严重的恶果。中国今天的经济形势，不是缺乏产业资本造成，而是国际需求锐减，国内消费带动的需求不足造成。要带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就应该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和以合作化道路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发展上进行重大改革，以增加需求和改变供给格局，来带动下一轮经济增长。

小额信贷的放开，不可能刺激国民消费需求，只能进一步加剧非垄断行业的产业资本竞争压力，同时，10% 以上的信贷利率，让金融资本快速、巨量地从产业资本中抽走资金，造成民间产业资本规模迅速萎缩。而扩大的金融资本由此吞并更多的产业资本，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必将加剧。靠它来刺激经济，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2013 年 6 月

前言

本文将给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建设的政策建议。原本打算日后生活安定，把这些政策和它们的政治、经济以及哲学理论基础，完整地，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系统地写出来。但我刚刚看到，目前中国正在执行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社会和政治经济问题，甚至直接威胁到共和国的安全。由于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所以这里不得不先推出与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最关切的两项政策，建议中国政府再次启动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这两项政策如能得到实施，中国社会将会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那种局面，农村和城市经济呈现良性互动状态，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在这种良性互动中进入一个相当长的稳定快速的增长期，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过程甚至可能会持续三十年至五十年，并且影响更为深远。

本文下面部分首先对中国当前经济状况作出一些分析，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隐患，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一下这两项政策的理论分析，之后则给出这两项政策，并论述这些政策的意义和可能带来的影响。

1. 当前中国经济状况分析

在见识张五常经济理论之前，就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我一直心存疑惑，为什么在清理完三角债以后，中国经济运行得非常健康的情况下实行现在的这种经济政策？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说有个叫张五常的人对南海的经济政策有非常的影响，为了把问题搞清楚，就在网上找了一些他的文章看了一遍。

我不知道网上的传言是不是真的，但是中国现在实行的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来看，与他的理论非常吻合。如果真确有其事，那么从他那轻率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理论看，这项经济政策如果继续实施下去，那么它给中国造成的危害，与 89 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政策相比，问题要严重得多。

张五常的经济理论，实质上就是源自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就是通过牺牲工人的权益，允许企业自由雇佣和解雇工人，放手让企业自由竞争，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来促进和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把竞争所带来的压力全部转嫁到工人头上。而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国有企业股份化、破产制度、工人下岗制度等等，无一不是这种错误的经济观点的真实写照。

我不知道中央决策机构是如何相信了这个政策建议的，也许主要是着眼于企业竞争力，完善市场机制和刺激经济增长等多方面的考虑，才选择了这项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这一政策，并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危害，但是在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健全，法制不完善，市场体制还没有完成，经济基础还非常薄弱和官僚机构腐败成风的人口大国推行这一政策，无异于拿整个中华民族和共和国的命运作赌注。

问题在于，中国国有和公有制企业，它们的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等各种问题，并不是工人产出

效率不高的原因所造成，也不是公有制企业固有的弊端所决定。中国公有制企业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私有上，即公有制企业名义上的公有和实际私有，长期公有和短期私有的矛盾上。这一矛盾不解决，无论是下岗制度、破产制度和股份制度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而实际上只是把那种矛盾所产生的恶果转嫁到职工和百姓身上，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根本达不到推行此项政策所预想的那种真正完善企业健康机制和刺激经济增长的要求。

实行这项政策，在缺乏社会创新机制，企业管理水平落后，矛盾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企业只能通过解雇工人，尽量使用廉价劳动力来提高它的运行效率，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但是由于上面所说的矛盾没有解决，贪污腐败和效率低下的根子依然存在，过不了多久，企业又会回到以前那种低效状态。使得整个企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解雇，利润提高，贪污腐败，效率降低，再解雇，利润再提高，再贪污腐败……，直至企业完全破产，职工完全失业。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立即会在中国社会产生巨量的无法消化的失业人口，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根本上还没有建立健全，这些失业人口会随着竞争的企业对更低廉劳动力的雇佣，快速滑向生存线边缘。同时，更为低廉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涌入，使得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不断加剧，这些会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社会问题。

在农村，也由于主要劳动力的流失，再加上地方腐败势力的盘剥，农村经济一直处于一种停滞和退化状态，无法再给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市场动力。并且，无论是进行西部大开发还是进行赤字预算，最终都不能真正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隐患。

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如果不停止，随着事态的继续恶化，那么，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 89 年那时相比，恐怕要严重得多，甚至可能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局面¹。

本文下面的部分将给出两项政策建议，通过这两项政策建议，启动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唤醒中国农村所蕴藏的无比巨大的产业和市场潜力，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全新的动力，补救当前中国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两项政策，其中一项是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另一项则是关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两项政策的直接思想来源还是毛泽东关于解放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建国思想，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经济思想部分。以下逐一介绍。

2. 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简介

东方的中央集权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在实际生活中一直冲突的一个焦点就是选举权。在东方政治制度中，各级行政官员的任免是由上级来决定，而在西方政治制度里面，则是由该行政职位下的公民通过投票来决定官员人选。这两种政治制度似乎非常对立，不可调和，但事实并非如此。

围绕着选举权展开分析，我们知道，在东西方的选举过程中，共涉及到了两个人和两股势力。其中两个人是指上一任官员和新上任官员，两股势力则是指该行政职位的上级官员或机构和该行政职位管辖下的公众。

¹中国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是之后政策弥补的结果，而不是这些政策中没有这些东西，整个东欧就是这种结局。

因此，在整个选举活动过程中，无论是东西方，实际上都涉及到了两种权力的行使，这两种权力分别就是上一任官员的罢免和新任官员的举任。我们看到，在西方政治制度中，上一任官员的罢免权实际上是自动行使，而在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中，一般来说，官员的职位都被保留，也就是说罢免权被无形取消。

实际生活中，无论东西方的政治制度，都存在着自己的缺陷。在中央集权制度里，一般政权由于缺乏监督机制，所以总会存在各种腐败现象。当中央有一项政策要通过这个机构实施时，往往由于各级行政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受监督，这些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就出现各种各样的变质现象，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尤其是底层官吏的腐败，会导致政权机构与公众的对立，直接威胁着整个政权的存在基础。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其根本原因都出在这里。而西方政治制度，却由于任免权完全下放，根本无法形成类似东方的行政机构的强大手段，从而各种社会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尤其对现在的中国，这种行政机构可以说是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唯一手段，市场机制解决不了农村问题。

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以前的选举权是由罢免权和举任权构成，也就是说这种选举权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完全可以通过选举权的分割行使来给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这种新的政治体制能够将现存的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优点兼收并蓄，同时摒弃它们各自的缺点。

中国有两句话，结合起来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明新的政治制度：“相马还须伯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从这两句话来看，伯乐（上级），一般而言，识人经验更丰富，大局观更强，同时也是行政上的需要，更适宜行使举任权；而群众对上一任官员的政绩更有切身体会，更有发言权，因而更适宜行使上一届官员的罢免权。

新的政治制度具有以下一些原则：

- 一，把人事罢免权下放，真正由群众掌握，由群众投票表决；
- 二，上层机构保留举任权和行政罢免权。

其中，人事罢免权必须得到切实行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员被群众投票罢免，则下一任期内坚决不能平级或越级使用；其次，即使一个官员在群众的投票中没有被罢免，上级依然可以根据他对各项政策的执行程度，考虑是否进行行政罢免，举任新的人选。这样就构成了一种与东西方政治体制都不同，但优点兼收并蓄的新的民主集中制度。

在这种民主集中制度下，由罢免权所致，各层腐败分子和平庸官员的清理工作一直进行，保证了整个行政机构的廉洁高效，同时，在罢免权的监督下，官员的危机感甚至比西方民主制度下更为强烈，整个中央集权行政机构与以前相比，运作起来更为自如，能够彻底贯彻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真正意图。这样民主集中制度下的廉洁高效的中央集权行政机构，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可能具有的，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强大社会手段，这种手段在贫穷和落后的国家里是解决西方政治制度下完全无力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必须手段。

随着新的民主集中制的提出，也从理论上化解了东西方政治思想冲突的一个核心矛盾，为中国的东西方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理论界的各种思想的融合，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也为政治思想斗争阵地向西方世界转移，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条件。此外，新的民主集中制的实施，通过不断地换血工作，会使共和国政权完全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为共和国政权的长期稳定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从制度上筑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在本文中提出这种新的政治制度，它的最迫切的任务，主要还是为启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必须的政治条件。没有这种政治条件的保证，下文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绝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那么，整个中国的经济在现行的情况下，就可能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经济增长点了。

3.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简介

中国现在的诸多问题，如人口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实际上，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各国，都有自己的农民问题解决方案，但大都不适合中国国情。

早期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途径就是圈地运动，利用资产阶级的力量剥夺农民的土地，强迫农民变成无产阶级工人。而美国在把印第安人杀得差不多以后，个体农庄实际上已经是产业化的雏型，之后向工业化国度不存在解决农业人口的问题。这两种血腥的方式显然不可能在中国实行。企图直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农村的产业化和现代化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市场条件下，资金的流动都是为了寻求更高的利润，而不是救苦救穷。中国现在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资金缺乏，管理不善，地方官僚十分腐败，人口素质低等等各种因素都表明，市场条件下，中国农村根本就缺乏吸引资金流入所需要的基本物质和人文条件，因此这条道路同样走不通，改革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实现生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恢复性增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中国农村没有摆脱小农经济状态。后来党中央也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如扶贫工作，科技下乡等等，取得了一些成果，农村贫困的状态还是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回过头来，重新考察一下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关于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既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模式，我们会有一些新发现。无论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还是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在实践上都是失败的，这也导致了我們后来对这些模式的全部抛弃。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失败的深层原因，我们会发现，这些模式在当前的情况下，具有十分巨大的应用价值，其中包含的合理内容甚至可以说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唯一道路。

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完全是这种制度绝对不合理，主要还是在于，当时共和国拥有的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这种制度所要求的高度，不具备这种制度所要求的各项条件。要使中国的农业从现在的小农经济朝社会化生产方面发展，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人才，管理，资金，技术和市场机制。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条件都不具备，推行人民公社的唯一力量只有

强大的中央行政手段。而这些条件的缺乏，使得中国的人民公社，无法与当时的实际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不能进行有效地分工，进行社会化生产合作。所以，即便实行了这种制度，农村劳动还只是停留在简单合作的方式上，大家一起播种，一起收割，这在管理不善的情况下，即使与小农业生产方式相比，效率也更为低下。

但是，在第二代，第三代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人才培养，技术储备，市场机制，管理经验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尽管中国农村目前还非常落后，但是从中国各方面情况来看，启动农村社会化生产改革的人才，资金，技术和市场条件已经具备。在市场机制不力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强大的行政手段，向农村输送行政和管理型人才，同时加大资金和政策倾斜力度，利用农村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启动农村产业化发展战略，由管理型人才带动，通过市场机制，逐步向中国农村输送企业经济型和科技型人才，由此培育整个农村的产业和市场，使得农村快速地朝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在这种农村产业化发展的带动下，会再一次出现农村和城市经济互动发展的局面。而由于农村产业化潜力十分巨大，这会让整个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都处在一种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状态。

4. 政策建议

1) 在县、镇、村各级行政机构切实推行新的民主集中制制度

现在的农村选举试点工作，由于人选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农民，素质上得不到保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且还会造成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是民选的，就不服从上级命令，不贯彻中央和上级各项政策等诸多问题。

在农村推行民主集中制，目前还要保持城市各级行政机构的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各级行政机构的效率对农村改革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另外，全面推行这种政治制度更会对社会造成过于剧烈的影响。所以建议目前保持城市政府机关的稳定，暂不进行这种政治制度改革，维持现状，集中精力搞好农村的建设工作。

在农村，镇、村两级领导的罢免权应全部下放，由群众全权行使，同时选举产生村、镇委员会，监督首长责任制下的村、镇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县级领导的罢免权由县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但县人大代表应由在全县公开选举产生，除了保证共产党员占多数以外，不应过多预设其它条件。

尽管新的民主集中制是非常良性和温和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推行，产生的震动恐怕还是非常巨大，甚至一锅端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建议相关机构和部门一方面加强理论上的论证；另一方面在全国各省或某些省份的一些地区进行相关试点工作，以获取实际的操作经验，保证这种民主集中制稳定安全地实行。

此项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是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如果它得不到切实贯彻执行，

那么，中央的任何政策可能最终又变成一场盘剥农民和百姓的悲剧。

2) 向农村输送管理型人才

提高待遇，向农村各级领导岗位上输送管理型人才，实行首长责任制，在罢免权的监督下，由他们负责落实中央的农村建设战略

这两项政策一旦执行，那么中国的管理、企业、市场和科技型人才等的需求量是十分巨大的。中国政府应该尽快扩大自己的人才库，多方面加强各种人才的储备，一方面，加大这些方面人才的招生力度，另一方面，那些部分素质比较高的被罢免官员，在经过教育和培训以后，也可以重新加以利用。

向农村输送的这些人才，应该执行国家的以下任务：

1. 切实执行中央和上级的各项政策；
2. 通过农村的产业化发展，就地消化农村人口，以减轻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
3. 根据当地的情况，结合实际，组织农民产业化发展农业和各种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
4.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5. 执行国家的人口政策和环境政策；
6. 普及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要完成以上任务，这些人才应具有以下素质和条件：

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3. 对中国的国情有充分的认识；
4. 对当地农民问题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明确自己的职责；
5. 有较强的管理组织才能，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
6. 其它一些相关要求和素质。

3) 其它的相关政策措施

除了上面讲到的以外，还应加大对农村的资金倾斜力度，发展农村交通，通讯等各种基础设施，加强法制建设等。其它如贸易中心和科技中心等一些县级配套单位和机构也应一一建立，已有的则加强管理，以降低农业改革中的市场贸易和技术等各种成本。而城市的那些亏损非常严重的国有公有企业，也可以实行罢免监督制度，控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相关的这些政策和措施，也是保证农村改革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结语

利用强大的中央集权行政机构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好体现。在发展中国经济的问题上，中央和人民群众的意愿是一致的。而落实了民主机制的民主集中制所形成的强大监督力量是这个庞大的行政机构认真贯彻执行这项事业的先决条件。这两项政策得到切实推行以后，中国经济又会进入一个长期的、更稳定、更健康、更快速的增长阶段。这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和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崛起，其意义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编后记： 在中国实现完全的民主制度，是一个很高的台阶，我们既不能牺牲其它，集中全部力气来跳这个台阶，但是也不能借口这个台阶太高，而一拖再拖，不设法改变现状。

我们可以把这个大台阶化为一系列小台阶，逐步拾阶而上。曹先生在本文中提出“把人事罢免权下放”，就是一个可以一试的方案。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这是一个我们有条件、有基础、有力量上去、但又不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和退步的一个“小台阶”。

（黄佶，转载自《中国研究》（<http://www.nownews.com/c>）（2002/5/22））

§ C.2 罢免权下放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出路

2003-11-04¹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网络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观点。例如规范政府权力、约束政府权力、自由民主制度等等，层出不穷。但是本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出路就是下放各级负责官员的人事罢免权。至于下放的程度与范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来说，越是基层，就约应该向全体治众开放，越是高层，越应该由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

为什么说人事罢免权下放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出路？这是当今世界政治思想和中国实际情形所决定的。这在《中国改革政策建议》一文中，已经做了一些初步阐述。

东方的基本政治思想，就是集权主义，即官员的罢免权和任命权完全由上级行使，而最后的上级就是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这种政治思想在古代中国已经行使千年，显然，它有助于一个国家和文明的延续，并且这种政治制度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能力在修建长城、开挖大运河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生产力作用，并且这种能力在战时能够迅速转化为整体的国防力量。这种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不言而喻。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国民财富还远远超过欧洲就可以看出这种制度之中，其优势因素还远远超出我们目前的认识。

但是，这种制度同样有着非常巨大的缺陷，腐败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各朝各代最头疼的问题，它始终是一个王朝覆灭的根本因素。明代朱元璋为了防止政府官吏的腐败，采取了各种残酷和血腥的恐怖政策。但是，贪污腐败问题却始终无法解决，而中国今天的现实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完全的集权系统没有一种社会力量能够制约制度性的腐败。

既然东方的这种政治思想有这种致命的缺陷，那么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不是就是灵丹妙药呢。显然也不是。从当前的国际实际来看，俄罗斯、印度、拉美、东欧等一些新的民主制国家来看，效果十分不理想。这些国家之中，不仅没有起码的公平，甚至腐败问题同样无法解决。但是，这种制度却有一个好处，人民可以用选票来发泄他们的怒火。那种明显腐败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员，人们可以用选票把他给弄下去。这种制度具有消解社会压力的功能，而不至于让这种压力演变成一种革命暴力，有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集权制度往往做不到的。

而对于中国的情况，这种民主制度更是断不可行。首先，中国的人口太多，物质生活水平还非常低，甚至很多人还处在绝对贫困线以下。中国任何的经济波动，在美国可能只触及 10 万的利益，而在中国就是 60 万人的利益，而且同样的绝对损失，在富裕的美国，这种损失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感受也和贫穷的中国人的感受大不一样。例如，九十年代下岗政策的推行，带来的社会犯罪率急剧

¹本文由天涯论坛不要二分法网友整理

上升。但是，美国同样的失业率，所带来的犯罪率会远远低于中国，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财富消解失业人口的怒气。

在贫困的中国如果推行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很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震荡，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权制约，就可能立即演变成敌对矛盾。实际上，这种事情在九十年代已经小规模发生了很多次。并且，这时，这种敌对矛盾没有强大政权力量的制约，其矛盾只会愈演愈烈。最终只能象中国十九世纪初发生的事情一样，又来一次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并且民主制国家还有一种始终无法弥补的缺陷。就是这种民主制国家一旦灭亡，它就不可能再恢复。例如古罗马、英帝国。在它们灭亡以后，就不再恢复。英帝国在二战以后，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都通过各种途径独立出来。除了英伦岛，没有人眷恋那个庞大的王国。民主并不能带来这种国家内部的统一意志。而中国，却总能破镜重圆。这是很值得崇尚民主制的人士深思的。

除了这两种基本的政治思想于之外，世界上还没有其它的政治制度可供选择。现实的政治制度往往都带有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一些特点，例如欧美，更多呈现民主特征，而中国则更多呈现集权特征。但是，没有一种政治制度真正能够超越它们。

我们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制度，当然期望能够让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优点结合起来，让它不仅能够保持集权制度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还能够对集权制度中的腐败和专横形成彻底的制约。这只有一种方法可想——人事罢免权下放。

首先，人事罢免权下放，不会触及政权的集权特征。上级可以通过任命权和行政罢免权这些手段，贯彻政治系统的集权性。例如在中国，村长的人事罢免权下放给村民后，它还可以通过对村长的任命和行政罢免来约束村级单位不会成为一个脱离政权系统之外的独立王国。

但是，人事罢免权的下放，却彻底消除了这种政权系统的专横与霸道。没有那一级官员敢象完全集权系统那样，不顾人民死活行使自己的权力。如果他敢这么做，群众能够赠送给他的那就是罢免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社会矛盾就会在局部、微观的范围内被化解，而不是象完全集权系统那样，这种局部、微观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最终酝酿成全社会针对整个政权系统的矛盾。

罢免权下放，其实就是把民主思想和集权系统从思想上和制度上结合起来的基本措施。其中上级保留任命权和行政罢免权，这就保证了政权系统的集权性；而人事罢免权下放，这又保证了政权系统的民主性。这样的政治系统就保留了两种政治制度中的优点，同时用各自的优点解决对方的缺点。

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应该朝这个方向前进。中国集权系统的领导权由中国共产党行使，而罢免权则保证政权的民主性。

我想就群体的选择说明点我的看法。有一点可以肯定，群体有群体自己的利益。群体的选择，决策者所要考虑的关键不在正确，而在于其利益。无论群体是不是短视，他们的利益不能违背。因

为无论从东方还是西方的思想来看，社会都是人民的，所有权归人民，而不是官僚。换句话说，无论你的主张有什么样的真理性，要在社会中实施，你首先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这就是罢免权的关键。这就是当初共产党干事情，先搞好动员的道理。

为什么不选择选举权呢？也是因为人民的意志。意志本身并没有理性，它痛它就反抗，它舒服它就支持。如果社会权力完全受这样一种怪物摆布，那么社会就象大海里的航船，它今天往南行，明天往北驶。这就需要一种理性，它既要腾出一只手，安抚那个怪物；还要腾出一只手，驾驶这条船坚定朝胜利的彼岸行使。罢免权，就是想保留这种理性。

还有一点，罢免权行使以后，肯定会有无辜的官吏被罢免掉的。这在选举制下一样——肯定有最优秀的没有被选举上来。罢免权的存在也和选举权一样，如果事情变糟，它们责怪的不会是后面的制度，而是前面的这个人（这是选举制度最大的秘密）。罢免权也是一样，它不会否定一个政权和制度，它否定的是一个个孤立的人。

此外，我想作为一种想法和选项，下放罢免权的民主集中制和集权制度、民主制度一样，不应该受到指责。至于对指责我这种想法幼稚，说它是对共产党抱不切实际的幻想的那些人来说，我想，总比那种民主制度来得更成熟些。在中国实现选举制度，不仅要共产党倒台，还要一个戈尔巴乔夫似的白痴。

说明一下，选举制度是一种横向分权制度，只要推行选举制度，多党制、议会制度等等就会随之而来。一党执政绝对不可能。

罢免制度则是纵向分权制度，即上下的制约，这不需要什么多党制。民主制度所解决的问题以及所产生的问题，在这里都能得到解决。

权力的行使有一个平衡问题。如果所有权力，除了官员的罢免权力之外，官员的举任权和升迁权也归给他管辖的群众，那么将没有其它权力留给上级政府包括中央系统。这时，中央的政策将在地方保护面前无法执行。实际上，这会在中国形成一个个独立王国，而不是一个强大的高效集权系统。

中国如果没有这种集权系统，很多社会问题将不仅得不到解决，还会进一步恶化。实际上，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往往都是地方在实行中央政策时不力所致，这就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坑国家，下坑老百姓。这种情况不改，这个权力系统的合法性将逐渐被那些蛀虫腐蚀掉。而所谓权力完全下放，也就是给群众以选举权，其结果，90% 的所谓民主国家就是榜样。

因此，这种集权系统必须保留，也就是行政罢免权和举任权不能下放，但下级机构可以有推荐权作为补充。

§ C.3 以罢免权下放为基础的民权集中制若干说明¹

2011-11-26

罢免权下放制度提出也有一些时间了，因为一直有些别的事情，这方面没有给出系统阐述。这几天有点时间，便就这一问题，稍加说明。

一，提出的背景

2002 年巫师通过《中国改革政策建议》，提出罢免权下放制度，是想给当时的政治自由化喧嚣一点冷水。如文中所述，在于 90 年代自由化浪潮极为凶猛，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推动私有化运动带来的大量下岗，其责任被自由公知归咎到政治集权，玩普世价值，大肆宣扬西方选举制度。其背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等各层面，全面出击，要颠覆中共政权。众所周知，这一进程被 911 打断。

巫师当时提出罢免权下放，急务就是从政治思想层面，阻止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对华夏族群的侵害。尽管这些年来他们对此保持着沉默，中国的自由化思潮逐渐地消声匿迹，巫师看到这一思想方案起到的一点作用——他们无以面对这一方案折射出他们自身的理论基础问题。

但提出的针对对象不是右派，而是政治系统构架。总是号称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的政府，不从制度层面上落实监督制度，那“群众监督”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力只属于人民，把那些官员从人民代表的位置上撵下来，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被监督者坐在监督员的位置上，已经从根本上违背社会正义的起码准则。

二，没有否定集权和民主制度的问题

提出罢免权下放方案，是让民主机制结合进集权制度中，发展一种新的制度，可称之为民权集中制。并且这一制度不是对集权和民主制度的否定，这一制度要集权，要更民主的集权，要民主，要更高效的民主。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制度选择形式，集权制和选举制组织，也会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方面，如信仰系统就不能采取选举制度，那会以信众的利益为导向，从而破坏信仰。军事机构也更多以集权的形态存在，公司内部的管理，也是一种集权形式。

而一般的社会组织单位，在其草创之初和履行表达意见的职能时，并没有成形的机构集中行使权力。这种组织往往都通过众人投票形成对组织和个人具有约束力的章程决议等，也就是以选举

¹原文的民主集权制，以及部分文章中的民主集中制，统一改为民权集中制，一是更符合该制度的本意，同时更容易区分开其它概念。

的形式建立权力机构。

这两种制度象山岳一样古老，并在社会中继续存在下去，民权集中制不存在否定它们的问题。

就政治权力系统本身，民权集中制，也没有改变其它权力的内容结构。中国当前的权力系统主要有信仰系统、政权系统和民权系统。信仰系统就是共产党组织，政权系统就是政府，而民权系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我们都很清楚，民权系统现在是鸠占鹊巢，民权对政权的制约或从网络中能看到星星点点，但从未从制度层面得到落实。

三，中国政治变革的两难处境

中国今天的现实问题是，开放民权系统的选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立即受到威胁，中国就会走上多党制道路，这条道路上私权的泛滥也会给华夏族群带来灭顶之灾；不开放民权系统，政权系统的独大，不仅导致信仰系统的虚无化，政权系不受约束地侵害民权，也在削弱其执政之基，刺激民权运动的爆发。

这一两难处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存在。根据《宪法》总纲的第二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第三条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两条所规定的，产生行政机关的机构和监督行政机关的机构，都是人民代表大会，而大民代表大会也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在这些机构的产生和发挥作用过程中，宪法没有明显体现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并没有彰显出来。那么，按照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一旦放开选举，由人代会产生行政机构，共产党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立即荡然无存。

这一两难处境，就是人民对共和国所有权的确立和共产党对共和国领导权的保证，在我们的认识中，存在法理和制度上的矛盾。中国政治上的多次重大动荡，和政权系统的这种内在矛盾紧密相关，可以说，文革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而今天，则是共产党从制度上剥夺民权系统发挥用来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性，这不会长久。

今天，这一基本矛盾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渐渐显现出来，威胁着华夏族群的存续。并且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也广泛存在。

四，信仰、行政和民权三套系统的相互影响和制约

在巫师给出的民主集权制中，信仰系统是一个集权系统，也就是共产党组织，不能通过选举产生其中央机构，否则信仰将在选举中被信众（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诉求破坏和逐渐取代。共产党组织的机构产生，应该通过举荐、推选、选拔和集体领导等方式产生，即党内的人事任免需要得到上级机构的批准。而共产党的首脑机构，可以是集体领导和元首制，这不会有实质性的差别。

关于信仰系统本身，很多东西需要铺陈，这里按下不表。与本文内容相关的，就是由该信仰系统产生和领导行政系统。也就是《宪法》中总纲的第三条中，国家行政机关等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这一内容，需要改为由中国共产党组织产生，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这是民权集中制和其它两种制度的最根本分野。

共产党组织产生和领导行政机构的方式，根据级别和情况等，可以有很多种，如本级共产党代表大会产生行政机构，也可以由领导机关产生行政机构，再由本级党代会发挥一定的领导职能等，只要不违背信仰系统领导政权的原则，这都属于实施问题。

由此产生的行政系统，也是一个集权系统。即上级机构对下级机构具有领导权，对其具体人员具有行政罢免权。在这一点上，行政系统职权的行使要相对独立，不能出现以党代政的局面。不能出现党政不分的局面，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权力的行使不当，总会带来信仰的败坏。

单由这两个集权系统或者其中的一个建立起来的政权系统，我们将无法抑制这种政权系统的自我膨胀。我们都知道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宗教社会和礼教社会，因此，只有民权系统对这种集权系统发挥制约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有史以来的所有政治制度格局。

民权系统和以上两个系统不同，它是由选举产生的权力系统，其各级机构完全由民众选举产生。这一机构集中代表当前民众的立场和一致意见，主要发挥着对政权的监督作用，也就是它不主动产生任何人选和机构，但一切行政机构都要从它这里获得通过，并接受它的监督，包括行使对行政首脑的人事罢免权。

民权系统是一个发挥监督作用的消极机构。她不破坏信仰系统和行政系统的组织性或干预其内部运行，只是在这些机构系统运行出现问题时，如贪污腐败、重大决策失败等，这一系统就行使其监督权，通过清理行政系统中的责任人员等，保证行政系统时刻围绕着民众利益运行。民权系统是遏制信仰系统和政权系统自我膨胀和异化的根本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人类无法摆脱信仰系统和行政系统自我膨胀对人类的奴役。当她真正发挥作用的那一天，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出现和谐的局面。

但民权系统行使权力有明确的界限，只能是消极的，只能发挥监督作用，不能产生机构等。民权系统权力的有限行使，和民权系统的性质有关。民权系统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人民利益仅由人民代表大会来体现，实际上，国家和人民利益，主要集中体现在信仰系统和行政系统上，而民权系统主要职能是监督它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不是行使同样的职能。就这一点来说，再多的选票也无法和族群心灵深处高出生命的理性信仰相比。

同时，民权系统不对信仰系统发挥直接监督作用。民权系统关注的是利益，信仰系统要实现的是理想和信仰目标。这原本就是不同的人类诉求，绝对不能以民权的利益诉求，直接要求信仰上的配合。西方文明没落的根本原因，就是强势民权下的信仰虚无化——这种文明构架无法唤起高于生命的力量。

五，作为统一世界的政治权力系统候选方案

民权集中制方案的提出，也为世界的统一和统一的世界，给出作为整合道路和政治权力系统的分配方案。

人类统一世界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尽管有那么多英雄豪杰为此努力，今天几百个国家一起挤在地球上，已经告诉我们这一努力的结果。我们不仅要问，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怎么就这么难呢？

巫师认为，无论民主制国家还是集权制国家，统一世界的努力，都存在法理性的根本矛盾，那就是国家所有权的转移都存在问题。对集权制国家而言，每个集权制国家，不论君主还是总统，国家所有权都独立行使，对其它国家和地域的攻占，就是所有权侵占。这于侵略一方，就不能从法理和行动上达成一致，只能通过暴力和利益引诱，实施侵略行径，而于被侵略一方，捍卫所有权在法理上天经地义，更容易得到民心民力的支撑，持久地进行反侵略战争。在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启动这种暴力类型的世界统一进程，外部会同仇敌忾，内部则会出现各种板块性和基础性裂变直至分崩离析。

选举型国家更无可能肩负这一使命，民众的民意可能随时反手摧毁统一进程，更不用说，这种统一过程直接违背选举类型国家的立国原则。实际上，民主类型国家要完成这一使命，二战中的德国就是一个范例，就是至少是暂时转变国家类型，再启动这一进程，当然，结果也是范例。

但世界的统一终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否则我们总会笼罩在毁灭的阴影之中，技术的发展也一直在提示我们这一问题。一个在民权集中制基础上的中国，将是世界信仰的灯塔，她会推动世界信仰的重建和世界的政治统一。就统一过程而言，本方案给出的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交换行使，而不是剥夺和侵占，而是内部重组，所以她会分化一个个国家，温和而不是暴力地推动世界的统一进程。因为世界以这种方式的统一，对所有的信仰和利益民众来说，都是获得权利的途径，而不是权利的丧失和人身的奴役。

重建后的世界，早就已经写在华夏族群的最高典籍中，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六，民权集中制度的来源问题

罢免权下放的法源，不是别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后巫师还有相关观点需要交待。而巫师启动相关的思考，则是因六四事件触发，巫师深究东西方制度的优劣，给出这一制度安排，没有更多。关于信仰系统的建设，如果放到族群的存续层面和文明层面去思考，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和位置。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自身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定位，党建又从何谈起，不过这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

这里是相关论述的一个局部，是《岸边的中国》之《海岸边的中国》的一个章节内容。

附录 D 毛泽东是海岸边华夏族群的文明始祖

曹泽新

2012 年 12 月 26 日

毛泽东是海岸边华夏始祖，这是华夏史观的重大结论，相关论述在《黄河入海流——地缘变局下的文化大革命》中，有更为详细地阐述。本文主要阐述和重申其中的基本观点。

一，华夏古文明的家族公有制形态

古代中国，我们一直以为是从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到私有制的封建社会这样一种演化过程，但这是对古代中国的误读。古代中国社会一直是家族公有制形态，即家天下，可分为封土建邦时期和中央集权时期，并且封土建邦是中央集权的开始，而不是中央集权的对立。实际上后来的七王之乱、藩镇割据或军阀混战等，都是中央集权形态下，中央集权系统退化崩溃后的诸侯还魂。

华夏文明这种家族公有制形态，主要是为了适应黄河岸边的农耕和游牧地缘性冲突结构。在冷兵器时代，现在的陆权板块是分裂的，分为农耕区和游牧区，而黄河流域正处于这两种地缘的分界线上，华夏文明就在这种农牧地缘冲突结构中诞生，这不仅解释了华夏文明的起源问题，阐明了华夏文明为什么不是长江文明，而是黄河文明，还规定了华夏文明的所有权形态，即家族公有制形态。

礼法是古代中国家族公有制形态的所有权理论和公权力组织构架，是华夏族群用以制约精英阶层的权力行使规范。礼法为精英阶层的每一级权力，制定了森严的权力规范，稍稍超越其行权范围即为逾礼，不到位的则是“失礼”。“礼”正是华夏文明家族公有制形态的权力行使法则，“礼法”就是循礼行权，法究其责。正是“礼”保持了华夏族群魂灵层面的深刻组织性和常态化的军事动员张力，是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基本文明内核，是华夏族群强健自信的不绝源泉。

到了后世，精英阶层则把最初约束他们的礼法，篡改成为替他们服务的礼教。礼教是礼法的道德化流变，这一点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千年误读中就可以看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原有之意是以森严的礼律约束惩戒精英阶层逾礼失礼的行为。礼本身包含的惩治礼律，较之刑律更为峻酷，如罢爵赐死灭国夺封地去宗庙之类，刑律根本就不能触及与涵盖。以礼施加于大夫，其本意是族群对行使公有权力的精英群体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

而古代中国的精英阶层，则通过一步步篡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从礼的祭祀军政行权规范的等级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三纲五常，再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把制约他们的礼法篡改成他们吮血吸髓的礼教，弱化奴役族群主体，使得华夏族群一再沦亡于外族。

二，近代革命史是华夏族群的地缘迁徙史

读中国历史，会发现中国近代革命史与以往所有的中国历史完全不同，这一点被洋务领袖李鸿章概括为“亘古未有之变局”。而这个“亘古未有之变局”实际则是文明层面的地缘变局，是从黄河岸边的农牧冲突性地缘结构，到海岸边的陆权和海权地带的冲突性地缘结构的地缘变迁，是从桑田到沧海的地缘变迁。

这一迁徙过程，不仅要完成华夏族群从黄河岸边到海岸边的文明迁徙，还会带来华夏文明底蕴及形态的变革重组，也就是华夏文明的维新历程，因此，中国近代史是华夏族群的地缘迁徙史。地缘变迁、海权观念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播，是华夏族群文明维新的根本演化动力。新的华夏文明正在中国所处的海陆冲突地缘结构中诞生，这同时回证了华夏传统文明起源于农牧地缘冲突这一论断。

新的地缘环境下，以民权为基的公有信仰和贯彻公有信仰的观念体系及其组织构架，是华夏族群地缘生存的文明依据。

三，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显在，文明维新的必要环节

根据以往经验，文明革命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反复的血腥更替过程。华夏族群在新地缘环境下的文明维新，根据以往的文明自发演进情况，动乱至少还要再持续二百到五百年，才可能完成文明形态的调整过程，而且中国是文明迁徙，破旧立新，过程会更为漫长更为血腥。要避免这种文明演进中的灾难，根本的办法就是进行自觉主动的文化革命，及早肃清旧文化势力，培育新文化，这一文化革命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就是：“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文化大革命通过发动群众，让文化受众批斗铁幕文化的主导者，“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摧毁主导者的优势文化地位，社会关系倒置，让文化受众不再企图克隆新的主导者，在批斗中解放自己。文革正是通过这种批斗，打在礼教等所有文化毒瘤的死穴上，让文化毒瘤寄宿关系土崩瓦解，消灭了旧文化势力的政治存在基础，以此扫荡封资修等所有旧文化。就这样，文革阻断华夏族群地缘迁徙的灾难性演进过程，让族群行进在存续的康庄大道上。

文化大革命通过发动群众批斗文化政治精英，还实际举行了君授民权的授权典礼，这是华夏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政治和文明步骤，昭告了民权时代的来临。现状证明，毛泽东所戮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华夏族群文明维新不可或缺的民权环节，是民权的法理授印。从这一角度观察，毛泽东对于华夏族群的功勋，建国是三，文革是七，因为建国是存，文革是续；建国是路，文革是魂，文革是海岸边华夏族群的魂灵再造。没有文革，华夏族群懦弱的魂魄，将使华夏的文明维新之路，在封资修等多种地缘压力面前，支离破碎分崩离析。以此，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真实显在，毛泽东思想就是文化大革命，其它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器用。

四，毛泽东是海岸边华夏族群的文明始祖

在《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年思想》一文中，何新对毛泽东有着精辟的论断，“毛泽东是巨人中的超级巨人”，“毛却是一位天才！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洞彻以至试图掌握更遥远的历史未来的神灵。他的洞察与痛苦，他所奋斗的目标，是远远超越于现实之上的。”“这个最终把千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我们还可以找到世界范围内很多伟人和智者对毛泽东的无数高度评价。

从弱到强神话般的崛起奇迹，对世界政治地缘格局和文明格局的深刻影响，对华夏文明的深刻改造，对华夏族群的魂灵重塑等一切表明，毛泽东身上的光辉超越一切神灵，非秦皇汉武一类开国之君所能比拟，也超越了世界文明史的一切帝王。越来越多的赞誉，让我们越来越迷惑：雄哲浑成，君师合一的毛泽东，到底是谁？

只有在华夏文明的地缘变迁，以及世界文明的剧烈演化背景下，才能看清毛泽东。毛泽东是成功引领华夏族群从黄河岸边到海岸边地缘迁徙的最高首领，并通过文化大革命，刺穿旧时代的精英铁幕，重塑族群魂灵，首开海岸边华夏文明之先——民权纪元，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毛泽东正是海岸边华夏族群的文明始祖，毛泽东思想就是华夏祖灵，就是礼魂。

五，民权运动迎接未来

今天，封资修所有铁幕势力都集中到中国共产党内部，这不是激愤之语，而是作者这些年来冷眼旁观的基本结论。这些年来，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实际就是资本主义，还是最糟糕的权贵类型；代表的先进文化实际是封建腐朽文化，影视作品中连资本主义政治观念也无法表达；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却是拒绝民权监督的修正主义，成为前两者的庇护伞和铁杆护卫。这些所谓的代表，就是封资修铁幕的代表。种种现状的思想根源，在于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只是毛泽东思想的支流，支流以发展的名义取代取消毛泽东思想，就是以支夺干，华夏大地因此滋生了此类妖孽。

但是，精英铁幕的人文倒退，正在激发起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民权运动。华夏族群将通过民权运动，集结毛泽东思想和华夏族群的全部能量，彻底地进行中共的清党整风工作，全面荡涤铁幕文化，扫除铁幕势力，完成对中共的根本改造，重新置正毛泽东思想，让华夏族群的文明维新回归原本的康庄大道上。民权运动也是铁幕精英唯一的救赎之路，否则这些个体要么在等待中煎熬，最终在更暴烈的社会运动中覆灭。

就像网络反腐已经招致精英反制一样，精英铁幕必然会把民权运动说成内部动乱，然而文革之后近三十年的清明政治，以及当前社会的革命前景，表明民权运动才是成本最低的社会变革。

在民权运动阶段，中国的民间左翼和民权右翼会告别书斋，共同迎接社会民权。民权运动是新时代下毛泽东思想的显在，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是超越左右的沧桑正道。铁幕文化和民权文化将

在民权运动中激烈较量，这是华夏族群有史以来，最激荡澎湃的民权变革时代。这一时代所通往的民权纪元，其中不仅有信仰和民权的共和，还有世界和宗教的和平统一。

与本文有关更为详细的论述请见《黄河入海流——地缘变局下的文化大革命》，笔者相信这一结论经得住历史检验。

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 119 周年。

附录 E 文化大革命资料

§ E.1 十六条¹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十一中全会于 1966 年 8 月 8 日通过的一项决定。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

¹摘自网址 <http://baike.baidu.com/view/969942.htm>，个人以为，这个《十六条》，今天依然是民权运动的重要文件。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

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中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 （一）好的。
- （二）比较好的。
-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

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